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新四军征战实录



## 序幕

公元 1941 年。

在历史的长河中，这又是一个艰难的岁月。日本侵略军的铁蹄野蛮地践踏了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平、津失守，华北危急，八路军第 115 师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 5 师团某部 1000 余人，取得了全国抗战以来第一个歼灭战的胜利，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然而，日军长驱直入，南口战役失败，淞沪会战失败，日军在南京屠杀 90 天，30 万苦难的同胞被杀戮、被活埋、被烧死。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相继失利，广州陷落，蒋介石不得不相继离开南京、武汉，在重庆经营他的独裁朝廷。

就在千百万同胞被野蛮的日本侵略者屠杀，大片国土被日军侵占的抗日战争第 4 个年头，华夏大地又发生了一件亲者痛、仇者快的重大事件。

1 月 17 日。大江南北寒气袭人。国民革命军第 3 战区司令长官、被称为国民政府中央军“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心中却别有一番滋味。他连续接了几个电话，脸上浮出几丝得意的奸笑，开始细细品尝泡上不久的那杯龙井茶。

忽然，顾祝同猛地搁下茶杯，急走几步，去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顾祝同似笑非笑，一番话却关系到在江南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一支主力军的生死存亡。顾祝同称：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图谋不轨，已非一日。本月初自泾县潜向南移，竟于 4 日明目进攻我前方抗日阵地，危害民族，为虎作伥，丧心病狂，我前方被袭部队，对此不测之变，若不忍痛反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以自卫，而且整个抗日之国策亦被其破坏无余，……新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该军军长叶挺于当地擒获，副军长项英潜逃不获。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持华中抗战的人民军队，顾祝同怎么称其“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图谋不轨”呢？

那一天，当广大抗日将士在为民族生存的战场上同日本侵略军浴血奋战时，山城重庆却别有一番忙碌。

夜色深沉，浓云若盖。一阵呼啸的北风吹过。忽然传来了国民党中央通信社发布的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通令和发言人的谈话，他们公开诬蔑新四军是“叛军”，悍然宣布撤销新四军的番号，声称要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

顾祝同听了几句，就站起来，得意洋洋地踱着方步。他不想再听了，他向蒋介石请示时，确信这一事件正在向他们预谋的那样发展。现在，顾祝同开始考虑庆功了，他要为血腥屠杀新四军的国民党官兵庆功。他在想，上官云相要给予奖励，第 32 集团军要奖励，第 25 军……他的思绪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断。

顾祝同遇到了严厉的对手。

周恩来在重庆，叶剑英也在重庆。

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就在嘉陵江西岸的重庆市化龙桥红岩村。

周恩来得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的诬蔑新四军“叛变”的通令和发言人谈话以后，义愤填膺，立刻打电话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何应钦，责问何应钦。

何应钦对着话筒，一时说不上来。他心中有鬼，有十个、百个鬼。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此时此刻，一向说话和气的周恩来再也无法按捺心中怒火，他痛斥何应钦：“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叶剑英获悉国民党反动当局发布通令，诬蔑新四军叛乱时，非常气愤，立即向何应钦、顾祝同等人提出了严重抗议。

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怒不可遏，纷纷谴责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又展开了一场无形的战斗。

周恩来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长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武汉、重庆等地做统一战线工作。日本侵略军侵占武汉以后，八路军在重庆设立办事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邓颖超、吴玉章、王若飞等人先后来到重庆，组成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同国民党反动当局展开了尖锐的斗争。

放下话筒，周恩来的心情难以平静，眼前又浮现出了这几天同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人面对面交涉的情景……1月12日，周恩来和叶剑英接到一份电报，仔细一看，大吃一惊，新四军已经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看完电报不久，在延安的党中央也发来电报，要他们为新四军的事向国民党进行交涉。

放下电报，周恩来和叶剑英都感到事态严重。周恩来双眉紧皱，说：立即向张冲、刘为章进行交涉，要求国民党方面“急电制止”皖南的严重事态。

张冲和刘为章当时是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他们在周恩来面前支支吾吾。

第二天，周恩来和叶剑英又去找刘为章，直截了当地对刘为章说：叶挺、项英等人以及新四军主力已经突出重围，前进到泾县、宁国之间，有一小部分后续兵力，尚在茂林山中被围。

刘为章心中一惊，不由自主地抬了抬眼皮。

周恩来盯了刘为章一眼，又说：请蒋介石、何应钦立即命令解除茂林的包围，并让出去苏南的道路。否则，新四军主力虽然北上，其被围部队势将被迫分散，江南局面仍然不能解决。周恩来停顿片刻，又说：我华北、华中将士得知新四军恶讯，气愤填膺，怒不可遏，只有迅速解除对新四军的围攻，才能免危机于万一。

刘为章显得有些为难，说：“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蒋先生已经命令侍从室的贺耀祖打电话给顾祝同。蒋先生的意思是，只要新四军确实北渡，顾祝同他们应该予以帮助，不应为难。”忽然，刘为章又变了腔调，“至于冲突，估计双方都在严密戒备的情况下，自然容易发生误会。”

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提出：新四军北上必然要经过苏南，皖北绝对走不通。

刘为章说：“我再给顾祝同打个电话，满足你们的要求。”

周恩来和叶剑英回到办事处不久，刘为章又打来电话。刘为章说：“今天谈话以后，我立即向委座报告，委座答复说，关于茂林方面不要继续打的问题，他已经让贺耀祖下了命令，不成问题。新四军今后可以从苏北走，但

部队过江后不能打韩德勤，不得盘踞，必须继续到河北去。”

其实，刘为章当时是在何应钦家里打电话。

毛泽东人在延安，心里时时想着皖南的新四军。就在这一天，周恩来和叶剑英收到了毛泽东、朱德等人拍来的电报，告知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一万人之聚歼计划”。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朱德等人明确提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看完电报，周恩来凝神静思。

这场斗争还会更艰巨、更复杂。

当天，周恩来和叶剑英把同蒋介石方面交涉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报告。

1月14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又收到了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联名发来的电报，明确提出要他们“向蒋介石直接谈判”。

周恩来和叶剑英再次同蒋介石方面交涉，向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刘为章、张冲等人提出抗议，要求国民党当局坚决制止围攻新四军的行为。

近乎争吵的交涉并没有改变蒋介石的决心，他看了看周恩来，脸上浮出几丝奸笑，那几句话在喉咙里打了几个滚，才不阴不阳地说：“皖南的事情嘛，这个……”提出抗议以后，周恩来又把蒋介石当时的答复向延安方面报告。谁知仅仅过了两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竟然发表了颠倒黑白的通令。此时此刻，周恩来难以按捺心中的怒火。

“找张冲，我要当面问问张冲。”周恩来打开车门，敏捷地跨上了停在门口的那辆小车。

小车在急驶。重庆街上，到处可以听到抗日的呼声，也可以看到国民党特务的影子。周恩来等人找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当面提出了质问和抗议。

周恩来返回红岩村时，夜已经深了。月亮被乌云遮住了，到处漆黑一片，连星星也没有一颗。夜幕里，一切都显得朦胧、迷离……

红岩村，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却难以平静。白天发生的事情太惊人了。日本法西斯的军队在中国的土地上到处抓人、杀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明遭到无情的践踏，在抗日军民奋起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严峻时刻，蒋介石政府却诬蔑新四军是“叛军”，这正是千古奇冤。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同志先后来到红岩村13号。这是一幢“大有农场”的三层楼房改建成的办事处办公楼。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重庆时，办事处的房屋一度被炸毁，工作人员自己动手，修建了这幢办公楼。这幢办公楼四周的山坡上，国民党别有用心地建立了一些宪兵、警察和秘密特务机关，构筑了机枪阵地和瞭望台，日夜监视着八路军办事处的活动。

监视是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同志们依然机智、勇敢地开展各项工作。

这也是一次紧急会议。大家情绪激昂。

有人说：“国民党当局的命令公布以后，新四军面临的形势会更严峻，应该抓紧时间向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揭露蒋介石的阴谋。”

“应该向全世界揭露。”另一个人说，“要彻底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破坏国共合作的这一阴谋。抗日战争，关系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抗日战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击法西斯分子的一个重要战场，世界应该知道国民党撤销新四军番号的真相。”

会议决定，利用《新华日报》这一阵地，刊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所写的题词。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机关报。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武汉沦陷以后，《新华日报》又迁到重庆出版，山西、广州、西安设有分馆，郑州、潼关、洛阳、许昌、宜昌、南昌等地设有代销处。在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领导下，《新华日报》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殊环境里，及时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绩，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是国民党统治区影响最大、最受群众欢迎的报纸。

毛泽东当年称赞《新华日报》起到了一个方面军的作用。对于这个“方面军”，国民党方面往往给予“特别关照”。报纸稿件都要经过严格审查。前一个时期，有关皖南事变的稿件全部被新闻检查官扣下。这天夜晚10点多钟，国民党新闻检查所的检查官突然来到《新华日报》社，东张西望的。他们心里有鬼，不放心呀！

“稿件不是都看了吗？”有人责问。

“我们要看明天的大样。嗨嗨！”那人皮笑肉不笑。

“看大样？早呢！”

“我们等，等……”

周恩来的题词已经写好了。副官特地从红岩村把题词送来，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要求报社加快编排，组织好制版和发行力量，务必抢在第二天各大报发行前将报纸送到广大读者手中。如果新闻检查官看到周恩来的题词，一定会扣下。

斗争越是尖锐，越是需要智慧，需要勇气。看见坐在那里等候看大样的检查官，报社的同志们胸有成竹。他们准备了两种不同版面。

一种版面上刊登了周恩来题词的手迹。

另一种版面上没有周恩来的题词，那是专门给新闻检查官看的。

夜越来越深了。夜空阴沉沉的，大块大块的乌云把夜空压得很低很低，像是要塌下来似的。寒风吹得楼外的树沙沙地响，让人觉得格外寒冷。新闻检查官再三催促，终于看到了那个没有刊登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版面。他们看了又看，互相交换眼色，终于离开了《新华日报》社。

他们实在等得不耐烦了。

他们以为可以满意地向上司交差了。

他们回到住处，倒头就想睡。谁知被子没有铺开，就听到一阵严厉的斥责：“混蛋！”他们本想声辩，但当他们看到印有周恩来题词的《新华日报》时，惊得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大批大批的《新华日报》已经冲破山城的重重浓雾，传遍了重庆，轰动了重庆。

第二版上，周恩来的题词占六栏地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第三版上，用五栏地位登出了周恩来为皖南事变题的一首诗：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两个版面，满含悲愤的 25 个字，一下子揭穿了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皖南事变的实质，具有一种强大的震撼人心的抗议力量。报社的工作人员把报纸印好以后，把它包在铺盖卷里，装在箩筐里，巧妙地从红岩村运到重庆城里，送到读者手中。

周恩来的题词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反响。人们争着购买报纸。不到一上午，当天的《新华日报》都销完了。

毛泽东看到这一天的《新华日报》后，从延安致电周恩来，说：“收到来示，欣慰之至，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国难，又是一次国难。中国的灾难太多了。

中国人民怎么能忘记，1931 年 9 月 18 日的那个夜晚，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北郊柳条湖村附近炸毁了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再诬称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突然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发起进攻。

东北有一支东北军，有东北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决心。谁知，东北军不战而溃，军政官员四散逃避。19 日，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沈阳。不仅仅是沈阳，长春、营口、辽阳、鞍山等 20 座城市都被关东军侵占。再过 4 个月又 18 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100 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 3000 万同胞陷入日寇的铁蹄之下。

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想打日本鬼子，却被蒋介石束缚住了手脚。东北危亡在即之时，蒋介石却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那时候，蒋介石想的是集中力量在江西“围剿”工农红军。

历史在 9 月 18 日这一天划下了一道重重的伤痕。

“九·一八”，作为一个特定事变，震惊中外。

6 年以后，又一次震惊中外的事变发生了，那是在北平附近的卢沟桥。

也是一个天高月黑的夜晚，驻丰台的日本驻屯军一部分部队在北平西南宛平县境内的卢沟桥附近举行实弹演习，诡称一名日本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这种侵略行径当然会遭到中国驻军的严正拒绝。双方的交涉只是一种形式，无论怎么谈，日本军队都要向卢沟桥、向宛平、向附近地区发起进攻。

历史上又出现了一个“七·七卢沟桥事变”，又多了一道伤痕。

事变往往同灾难联系在一起。“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沦陷。“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

在抗日战争进入第四年的重要时期，历史又写上了“皖南事变”。蒋介石的反动军队要围歼坚决抗日的新四军。

这正是“千古奇冤”。

在发生“卢沟桥事变”以后的第 10 天，蒋介石一度作出历史性的抉择。蒋介石在江西庐山上向各界人士发表谈话时说：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讲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之条件。

我们东四省失陷，已有 6 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百年故都，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

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

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蒋介石的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是国民党多年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个正确的宣言，因而受到了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同胞的欢迎。

然而，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投降活动，更没有放弃反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

投降和反共，成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中的两大污点。

早在新四军组建时，蒋介石一伙的面目就暴露出来了。

历史为坚持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新四军将士树起了一座座丰碑。历史也在诉说国民党反动派在皖南事变中的暴行。

让我们掀开历史中的这一页。

## 1

1 南京，这座有六朝古墓、石头城遗址、栖霞山石刻、明孝陵、太平天国天王府等著名古迹的历史名城，国民党政府的首脑机构、蒋介石的总统府曾一度设在此。

1937年8月，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受国民党人的邀请，受中央委派赴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国防会议。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和国民党军队这两个整整打了10年仗的冤家对头要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击日本侵略军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南京之行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商谈中国工农红军的改编问题。

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中，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使事变得和平解决。蒋介石被释放前，承诺了“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改组政府”、“容纳抗日”等诺言。

蒋介石回到南京以后，马上扣押张学良，但对联合抗日等条件未敢推翻。

当时，要改编的不仅有经过艰难的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部队，还有湘、赣、粤、浙、闽、鄂、豫、皖八省的游击队，后者即为新四军前身。

蒋介石哪里想得到，他悬赏捉拿多年的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会同他坐在一个会议室里。

这是一场特殊的斗争。

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扣押时，曾经亲口向周恩来表示：我回南京以后，你可以直接去谈判。但蒋介石回南京后立即扣押张学良的举动，则使人感到他言而无信。

周恩来到南京谈判是否会出现“张学良第二”？红军战士不放心，毛泽东也不放心。

1937年1月上旬，毛泽东接连发电报给周恩来，明确指出：

“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

“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

应该欢迎“张君（即张冲）到西安与恩来同志协商。”

2月8日，蒋介石的心腹顾祝同到达西安。顾祝同当时担任南京政府的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委派顾祝同和张冲、贺衷寒为国民党方面在两党谈判中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作为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在西安同顾祝同等人进行谈判。

周恩来对红军改编问题有个基本考虑，他觉得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制可改四个师，每师三个旅六个团，约一万五千人，其余编某路军的直属队。”周恩来还把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洛甫报告。

在谈判中，顾祝同表示同意红军在西安设办事处，保证不迫害民众团体。

但情况很快发生了变化。2月26日，蒋介石对张冲说：共产党要等宪法公布后公开，红军可以改编为三师九团，不可再加。

蒋介石的调子一变，顾祝同和张冲等人很快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变动。他们提出：红军改编为3个师后，每个师的人数只能有一万人，共3万人，要服从南京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副职也由南京政府逐渐派人充当。

这实际上是要把红军和苏区完全置于南京当局的直接控制之下，中国共产党方面当然是不能同意的。

这以后，周恩来又在杭州、庐山等地同蒋介石进行了多次面对面的谈判，蒋介石总想在红军改编的问题上耍阴谋。

7月7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中国军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第二天，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大声疾呼：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

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国民党对红军改编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7月12日，叶剑英代表红军与国民党西安行营第一厅厅长侯成如会谈时，侯成如用试探性的口气说：据南京方面的绝密消息，南京拟将红军部队编入战斗序列，使用于平绥方面，与傅作义共同作战，但不知红军能否听从调动？显然，侯成如是秉承蒋介石的旨意。

叶剑英略加思索，郑重声明：红军抗日救国主张，国人皆知。华北事件发生，共产党和红军即通电表示救国。事关重大，会谈结束后，叶剑英立即向党中央报告。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看了叶剑英的电报，明确表示：竭诚拥护国民政府决心抗日，红军主力准备随时服从调动，同意参加平绥线作战，并决定以一部深入敌后。

但是，蒋介石、何应钦等人一字未提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和红军的改编问题。

蒋介石在耍手腕，他想借日本侵略军之手消灭红军。

8月初，张冲给周恩来打电话，邀请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大计。张冲还多次给西安的叶剑英打电话，询问朱德等人的行止。

叶剑英想起了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的遭遇。面对当时的险恶形势，叶



剑英向党中央建议，关于南京国防会议，“毛不必去，朱必须去”。

8月10日，朱德、周恩来、叶剑英从西安乘飞机到达南京，参加国民党的国防会议。

共产党在国民党首府取得了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会议期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频繁地同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国民党地方实力派将领会晤，利用各种机会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

国共双方的斗争很激烈。

8月12日，蒋介石派康泽见周恩来，对《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许多无理要求。其中不同意提“民主”，要求一律改为“民用”；不同意提同国民党获得谅解，要求提共赴国难。周恩来当即表示，有的可以研究，有的不能同意。

第二天，日本军队对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侵略者的炮火打到了南京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蒋介石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迫切需要红军开赴抗日前线。

18日，蒋介石同意发表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的协议。但是，由于双方对部队改编、员额等问题上仍有斗争，上述协议到22日才正式发表。

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朱德和周恩来先离开了南京，未了事宜由叶剑英在南京继续进行谈判和交涉。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及陕南红军74师，编为第115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为副师长。红二方面军及陕北27军、28军、独立第1师、第2师、赤水警卫营及总部特务团一个营、骑兵团，编为第120师，贺龙为师长，肖克为副师长。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及陕北红军第29军、30军，陕甘宁独立第1、2、3、4团等部队编成第129师，刘伯承为师长，徐向前为副师长。

红军主力改编后，国民党方面下发了三个师人员的军饷、弹药和碘片、阿斯匹林片之类的药品，枪枝却没有下发。对此，蒋介石的一名尉官曾经说：“共党一向夸口说，他们所有的枪炮物资都是过去从我们手中夺过去的。让他们从日本人手里去夺取吧！”

但是，对于红军游击队，蒋介石仍不肯给正式番号，千方百计地想要削弱和控制，甚至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致使新四军比八路军还迟两个月改编。

红军游击队有着光辉的历史。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央分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和中央军区，项英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和中央军区司令员，陈毅担任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红军第24师和十多个独立团及地方部队，都留下来了，加上3万多名伤病员，一共有4.6万多人。

陈毅元帅当时就是一名重伤员，艰苦的反“围剿”战斗中，兴国县老营盘一仗，陈毅的右胯骨被敌弹击中，造成粉碎性骨折，血流如注。那几天，陈毅的大腿红肿疼痛，伸不直，也下不了床，本该早作手术，但是，由于云石山那家医院没有电源，手术难以进行。10月9日，医院各科室的医疗器

械、药品都装到箱子里，很快就要转移了，陈毅才给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写信。

周恩来看了陈毅的信，立即派人把电台的汽油发电机送到医院，为陈毅作手术。周恩来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医院看望陈毅。

陈毅知军善战，因腿伤不能远征，中央本想派人把他抬走，但考虑到他在江西搞了七八年，有名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项英在中央苏区的时间短，又没有打过游击，才决定让陈毅留下来负责军事。

项英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部队不久，就到医院看望陈毅。项英在传达中央的有关部署时说：中央划定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为基本游击区和最后坚守的阵地。这些留下来的部队的任务是：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保卫土地革命的胜利成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及其周围进行游击战争，使侵占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敌人无法稳定其统治，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配合红军主力部队，在有利条件下进行反击，恢复中央革命根据地。

陈毅听后，坦率地说：蒋介石不会因为红军主力撤出而丢下中央苏区不管，不会让苏维埃政权继续存在。反革命大风暴很快要袭来，必须迅速做好打游击的准备。

果然，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以后，蒋介石仍然命令国民党军队向中央苏区腹地进攻。到11月下旬，中央苏区的全部县城和交通要道都被敌人控制。

从12月份开始，陈诚指挥的20多个师20多万人又对中央苏区进行划区“清剿”，还组织地主武装建立保甲制度，实行白色恐怖统治，企图彻底消灭红军。在优势敌人的进攻下，红24师等部队遭受严重损失，于是转移到南岭山脉，重新组织游击战争。

当时，陈毅、项英负责赣南区域，方志敏负责赣东北区域，粟裕负责浙江区域，叶飞负责闽东区域，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负责闽西游击区，等等。

蒋介石在围追、进攻中央红军的同时，从未放弃打击红军游击队。“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也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在同中共中央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调集优势兵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各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清剿”，企图在和谈的掩护下彻底消灭留在南方各地坚持斗争的红军和游击队。

但是，蒋介石的这种企图是徒劳的。红军游击队经过半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不但挫败了敌人的“清剿”，还得到国民党地方当局中一部分人士的同情。于是，蒋介石又改变手腕，企图通过“谈判”改编来取消红军和游击队。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中共中央于1937年8月1日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和包围袭击。”

随后，中共中央又针对两党谈判中出现的新情况，多次发出指示，要求南方游击队坚持独立自主，拒绝国民党派人来游击队任职；游击队驻地应背靠有险可守之山地，不能无条件地完全集中，不与国民党军队、民团混杂；严密防卫国民党军队的暗算、袭击和破坏。

陈毅、项英、曾山、张云逸等人分别奔赴各游击队，贯彻中共中央的

路线方针和政策。

北伐名将叶挺也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而奔走。

7月，周恩来在上海遇到叶挺。两人10年不见，彼此都有许多话要说。但周恩来当时极忙，他对叶挺说：“这段时间正和蒋介石谈判陕北红军部队的改编问题，待这件事解决好，改编南方八省游击队的问题将会提上议程。”叶挺对红军游击队很关心。

“叶挺同志”，周恩来接着说：“希望你能参加这支部队的改编工作。”周恩来还示意叶挺，在适当的时候可以向陈诚、张发奎等人表示自己愿意领导这支部队。周恩来认为，红军游击队的改编应取得国民党有关人士的同情和支持，并通过他们争取蒋介石同意。

陈诚是浙江省青田县人，蒋介石的亲信，保定军校第八期炮兵科毕业。1923年，陈诚入粤军任职，曾经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警卫。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官，参加过两次东征。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诚指挥的部队成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在中原大战中任第18军军长，后来又参加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四、五次“围剿”，多次被工农红军击溃。全面抗战爆发后，陈诚担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和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参加上海抗战。从这段简单的历史中不难看出，陈诚的建议对蒋介石有一定的影响。

叶挺对陈诚比较熟悉。

8月13日，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日军飞机对上海市狂轰滥炸。久经战阵的叶挺将军登上寓所屋顶，当他看到奋起应战的中国机群虽然英勇搏击，却弱不胜强，难以制止日军飞机的残酷轰炸时，将军心中油然升起一种奔赴抗日前线为国杀敌立功的激情。

不久，叶挺就去找陈诚，表明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

陈诚当时正在上海指挥作战。听了叶挺的一番话，陈诚表示同情，答应由他出面向蒋介石疏通。

蒋介石当时正为上海、南京的严重形势而发愁，对于陈诚的建议，蒋介石较为重视。

8月下旬，陈毅和项英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到江西省赣州市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和第46师代表谈判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正在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叶剑英也同叶挺联系，共同磋商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

9月下旬，叶剑英、博古等人一起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商定把南方八省区的红军游击队主力编为一个军。这时候，中央红军主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抗击日本侵略军的第一线。

10月初，项英到南京。叶剑英和博古又同项英一起商谈了南方各省游击队所面临的形势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叶剑英和博古对项英说：应注意保存南方原有的战略据点，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能放弃独立自主原则。

经过中共中央的努力，加之日军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国民政府才同意同中共中央达成协议。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构成新四军基本力量的南方8省红军游击队主要是：

闽西南地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领导的游击队，约1200多

人，500多枝枪。

湘、鄂、赣地区傅秋涛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1100多人，350多枝枪。

闽东地区叶飞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920人，500多枝枪。

闽、赣、浙地区黄道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600人，300多枝枪。

浙江平阳地区刘英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600人，200多枝枪。

瑞金中央苏区钟得胜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300人，150多枝枪。

皖南地区关英、李步新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190多人，75枝枪。

湘、鄂地区谭余保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350多人，200多枝枪。

赣南地区陈毅、项英等人领导的游击队以及桂东地区的游击队，共约300多人。

鄂、豫、皖地区高敬亭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900多人，500多枝枪。

鄂、豫边区周骏鸣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600多人。

湘南地区李林等人领导的游击队，约300人。

这里，让我们再看看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军队名称、军长人选和有关政策问题的历史镜头。

历史镜头之一：新四军名称由来。

1937年8月底，项英到南昌，同江西省府代表达成协议，议定江西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江西抗日义勇军”。此时，红军主力已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叶挺在上海同陈诚谈话时，建议成立一支名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的正规部队，共同抗日。

叶挺提议把红军游击队改编后的部队称为新四军。叶挺的意图很明显，是希望这支部队继承北伐战争中“老四军”的优良传统。

“老四军”即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对第4军有一种特别的感情。

1925年9月，叶挺担任第4军参谋处处长，不久又调到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4军独立团任团长。在北伐战争中，叶挺指挥的独立团猛打猛冲猛追，在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战役中，连战皆捷，屡建战功，叶挺被誉为“北伐名将”，升任第4军第25师副师长。

国民革命军第4军参加北伐的部队被称之为“铁军”。

肖克将军认为，在中国革命史上，铁军是一支“独负盛名、战绩辉煌的部队”。

肖克将军还提到：“人民军队初创时，连名称也是借用铁军的，井冈山朱德、毛泽东部，湘鄂西贺龙部，都称四军。”

叶挺提出“新编第四军”，寓意深远。

蒋介石接受了叶挺的这一建议，只是又加了两个字：陆军。

新四军军歌的歌词中有：“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等，也是寓意深刻。

历史镜头之二：新四军军长人选。

新四军第一任军长是叶挺，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国民政府同中共中央之间在任命新四军军长的问题上尚有一番周折。

1937年9月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厅发出通报，“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并且称这个任命是经过“委员长核定”的。

该通报一发出，毛泽东等人立刻引起高度重视。这其中两大疑问。

第一：国民政府对新四军军长的任命为什么没有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  
第二：国民政府迟至 10 月 12 日才宣布南方 8 省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陆军新编第四军，为什么要急于任命新四军军长？

也许由于这两大疑问，毛泽东、蒋介石才接踵召见北伐名将叶挺。

1937 年初，叶挺曾与张云逸在澳门相遇。因为是老战友，两人谈话比较随便。

张云逸说：“叶挺同志，你对个人的进退有什么考虑？”

叶挺略加思索，说：“抗日是我的夙愿。国共合作抗日，更是我的向往。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有力量。但是，我不太愿意到国民党军队去工作，我对国民党军队的作风不能适应。”

张云逸听后，建议叶挺再到上海或广东的东江地区去走一走，也许会有些新的感想。

叶挺接受了张云逸的建议，一家人都迁往上海，在国民党内一些老朋友的帮助下，住进了上海静安寺一座庭院式的小洋房里。

抗日战争初期，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听到双方激战的隆隆炮声，北伐名将叶挺更加萌发了率军抗日的激情。

蒋介石对叶挺的行止也很关心。当陈诚说到，叶挺希望参加改编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时，蒋介石想到了利用叶挺的威望。

蒋介石对叶挺太了解了。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的叶挺将军，声威赫赫，从 16 岁开始先后在广东陆军小学、湖北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参加粤军以后，很快升任粤军第一支队副官、第二师少校参谋，深得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的信任，是一位功勋卓著的名将。

蒋介石清楚地记得，十多年前，当北伐军三次北上，尚未打倒北洋军阀时，正是叶挺率领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踏上了第四次北伐的征程。

那是公元 1926 年 5 月。

初夏的广东，天空是那样的蓝，阳光是那样的明媚，就像这片景象终年在被夏日的风光笼罩着。寂静的热气在大地上蒸腾，闪光，闲散而轻柔地浮动着，俨如在溪里游动着的鱼。

一支 2000 多人的队伍雄赳赳地从广东肇庆、新会出发，提前开赴湖南前线。这支队伍就是威震敌胆的叶挺独立团。

叶挺独立团经过广州时，正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广州街头，到处是欢送北伐将士的工人和革命群众。当时，叶挺在广州司后街（今越华路）叶家祠已有一个家。那一天，叶挺的胞妹叶香、叶珠和新婚妻子李秀文也来欢送。叶挺穿着一身崭新的青色制服，双脚蹬着长筒皮靴，腰际的武装带上佩着一把精致的左轮手枪，显出出征将士特有的英武。

那时候，湖南的战争硝烟越来越浓。叶挺率领部队进入汝城县时，与粤军谢文炳的前卫部队一千多人遭遇。那天，天上金龙飞舞，电闪雷鸣，雨像鞭子一样抽打着大地。独立团的官兵冒雨战斗，很快占领了汝城和城西南的一片高地，毙伤和俘虏 200 多敌人。北伐战争的前哨战一举告捷。

忧心忡忡的蒋介石，得到叶挺独立团的捷报时，由忧转喜。然而，更使蒋介石吃惊的是揭开国民政府北伐战争序幕的一战——

那年 6 月 4 日凌晨 4 时，安仁、攸县间广阔的丘陵上，枪声炮声惊天动地，叶挺和周士第等人率领独立团的官兵向敌人发起了猛烈攻击。经过两

昼夜苦战，叶挺将军指挥 1 个团的部队打败了 4 个团的敌人，毙敌俘敌各 200 多人，缴获迫击炮数门，机关枪数挺，长短枪 300 多支。

北伐先锋第一仗，旗开大胜。

至于汀泗桥、贺胜桥之战，叶挺独立团更是威震天下。

当年，叶挺为打倒北洋军阀，率领独立团浴血奋战，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难忘这支部队。如今，日本法西斯疯狂地侵略中国，蒋介石也要叶挺去指挥由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

毛泽东对叶挺也很关心。毛泽东相当慎重地同周恩来联系，并查询“恩来与叶挺究竟谈了些什么”。

毛泽东还多次打电报给秦邦宪和叶剑英，说：“叶挺是否能为军长，待你们提出保证”。对叶挺的任命问题，毛泽东还请“叶挺来延安商谈”之后“再行决定”。

叶挺知道，当时的情况很复杂，中共中央应该慎重处理。当时，秦邦宪、董必武、叶剑英都在南京，叶挺对他们说，我完全拥护中共中央的政治军事战略，完全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关于新四军军长问题，叶挺表示愿意到延安去，与中央负责人当面商谈，如果中共中央不赞成，他可以辞职。

10 月下旬，叶挺来到延安。

毛泽东热情地接待了叶挺，专门为叶挺设宴接风。

那些天，毛泽东尽管十分繁忙，还是抽出时间陪同叶挺到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央党校等地参观。叶挺看到，延安尽管没有广州、上海那样喧闹的市区，却呈现出革命圣地特有的那种战斗朝气。身临此境，叶挺感到格外亲切、舒畅。

一天，毛泽东和叶挺谈到了新四军的组建问题。毛泽东说：“叶挺同志，中央经过全面考虑，新四军的编制可以争取为两个师 4 个旅 8 个团。”毛泽东还提出了新四军主要领导人的人选方案，即：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周子昆任参谋长。两个师的主要领导人选是：第 1 师师长为陈毅，副师长为张云逸，第 2 师师长为张鼎丞，副师长为谭震林。

叶挺听得很仔细，说：“这个方案好。”叶挺还希望党中央多派一些得力的干部到新四军工作。

毛泽东希望叶挺按照这个设想去做蒋介石和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的工作。

叶挺说：“我一定尽力去做。”

这次交谈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抗大礼堂主持干部大会，欢迎叶挺。会上，正式宣布叶挺为新四军军长。毛泽东热情洋溢地说：“我们今天为什么欢迎叶挺将军呢？因为他是大革命时代的北伐名将，因为他愿意担任我们的新四军军长，因为他赞成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所以我们欢迎他。”

叶挺很兴奋，他在欢迎大会上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是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跟了上来。今后一定要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坚决抗战到底。”

按照中央的部署，项英也到延安来了。

毛泽东为项英组织欢迎晚会时，特别邀请叶挺同项英一起坐在主席台上。由于组建新四军的有关事项十分迫切，叶挺在见到项英后的第 3 天就离

开延安，前往武汉。

武汉是当时国民党军政要人的活动中心。南京危急时，国民党政府已经决定迁都重庆，武汉这个长江沿岸的大城市变得格外忙碌。叶挺在会见毛泽东之后来到武汉，自然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关注，新闻记者也争相采访。但是，叶挺无心在武汉久留，他想尽快赶到南京。

叶挺要去见蒋介石，要向蒋介石转达毛泽东提出的新四军组建方案和其他有关事宜。

11月21日，蒋介石召见叶挺，参与新四军改编工作的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也同叶挺一起去见蒋介石。

曾经是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对北伐名将叶挺虽然很熟悉，但两人已有十多年没有见面。大家坐定以后，叶挺详细转达了中共中央关于新四军的改编方案，特别是具体讲明了新四军副军长、参谋长，各师师长、副师长的人员名单。叶挺还说：“关于新四军的集合地点，浙江西部的衢州附近比较合适。另外，请国民政府发给18万元作为集合开拔费和整理费。”

起初，蒋介石显得慢条斯理，听着听着，蒋介石的脸色变了，心里说：你叶挺是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军长，你怎么就……

叶挺刚说完，蒋介石马上说：“中共南方游击队不能按照八路军的办法改编，延安提出的军官名单我不能同意。”一句话刚说完，蒋介石眼前忽地浮现出八路军改编的情形，说话的语气都变了。他说：八路军拒绝点验，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按枪的多少决定编制。

新四军不能先由共产党委任师长、旅长”。

蒋介石似乎已经知道红军游击队人多枪少。

对于蒋介石的回答，叶挺多少有些吃惊。叶挺说：“如今日寇肆意侵略，中华民族的大好河山遭到践踏，改编部队上前线作战，这是最要紧的，其它人事问题容易解决”。

一听这话，蒋介石很不高兴，说：“这不行，这些红军游击队能不能开到前线还是个问题。依我看，他们不会离开南方。”叶挺想了想，又说：“游击队改编了，就增加了抗日力量。

再说，这对安定后方也有好处。”

“嗯？”蒋介石转过头，怒气冲冲地说：“扰乱，那是扰乱后方。扰乱后方就是破坏抗日，我要剿的。”大敌当前，蒋介石还是忘不了一个“剿”字。几年前，他调集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围剿”红军，多么疯狂。现在，他又想着要“剿”红军游击队，要“剿”即将改编的新四军。他绝不希望这些革命武装留在南方。在蒋介石看来，只要有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他心里就不安定。

蒋介石说的这个“剿”字，道出了4年后发动皖南事变的阴谋。

蒋介石余怒未消，突然用一种责问的口气说：“谁要你去延安的？”“这件事我同军政部长何应钦谈过。”叶挺显得分外冷静。

叶挺当然不会说是毛泽东要他去延安的。

客厅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叶挺又问，“那么，部队改编的整理费呢？”“什么整理费？”蒋介石故作惊讶。

叶挺见蒋介石连改编红军游击队的基本费用都不给，马上站起来说：“这不行，没有军费，部队无法改编。我不当这个军长了。”

听到这句话，蒋介石的心“突”地一跳，稍稍变了腔调，说：“坐！坐！

你的军长还是要当。有些事，你可以找陈诚商量。”蒋介石心里很明白，除了叶挺，当时没有第二个能使延安方面接受的新四军军长合适人选。蒋介石也担心叶挺真的不当新四军军长，赶紧搬出了陈诚。

陈诚是叶挺的同学，更是蒋介石的亲信。蒋介石故作姿态。

毛泽东、蒋介石接踵召见叶挺，北伐名将出任新四军军长。

历史镜头之三：不准一个国民党插进我军。

红军游击队分散作战多年。在谈判改编中，个别地区的游击队出现了一些不好的倾向。

活动在江西省东北部弋阳磨盘山地区的游击队一直不肯下山，当党组织指派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到磨盘山上进行说服教育时，游击队里个别人竟然把关英杀死。

赣东北德安、九江、瑞昌地区的游击队也拒绝下山。红军第 16 师政委明安类和鄂东南特委书记林美津到山上做工作时，也被他们杀死。

国民党军队找个借口，把这两支游击队消灭了。

相反，当特委代理书记、红军 3 团团长何鸣在同国民党第 157 师谈判时，同意把闽粤边的游击队改编为保安队，并归 157 师指挥。谁知当一千多名红军游击队撤离根据地，开到漳浦县城时，突然被国民党的军队包围，收缴了武器。由于党中央的严厉交涉，国民党方面被迫送还武器，但人员却失散了。

闽中一支游击队被国民党方面骗到莆田县城后，不但被缴械，大队长也被杀死。

毛泽东知道这些情况后，接连发出电报，要求湘鄂赣的游击队一定要吸取何鸣的教训，在接受改编时，不许轻易移居大城市，不许国民党派人来任职。毛泽东、张闻天还告诉周恩来，谈判时要坚持不准国民党插进我军一人的原则。

毛泽东还指出，红军游击队要依靠山地，改编时，驻地 200 里内对方驻军应调离。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湘鄂赣游击队把国民党派来任职的副司令、参谋长等人“礼送”出境。

## 2

陈毅元帅为新四军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陈毅不仅在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代军长，同刘少奇等人领导部队整训，早在编组红军游击队为新四军时，陈毅不畏艰险，赴湘赣、皖浙赣等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

那是一种生与死的考验。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以后，陈毅在赣粤边界坚持游击战争，那是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37 年 10 月以后，陈毅根据中央指示，在江西省南昌、吉安等地组建红军游击队接洽处、通讯处，主动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合作抗日的谈判，奔赴湘赣边、赣东北等游击区，动员游击队下山改编。

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



几年来，国民党反动派总是千方百计地要消灭红军游击队，现在遇到一个改编的新问题，有的游击队担心上反动军队的当，不肯下山。当陈毅派人上山进行说服动员时，不少人竟被当作“叛徒”杀害。

陈毅接到通报，十分焦急，决定亲自去说服他们下山改编。谁知一到山上，陈毅也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险些被杀。

那是1937年11月中旬，陈毅坐着一顶轿子，来到湘赣边的九龙山游击区。在山上，陈毅对湘赣边游击队参谋长段焕竟和政治部主任刘培善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的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号召共产党员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站在斗争的最前线。陈毅还逐条解释了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说明党中央指示要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游击队要有计划有步骤地下山。

听到陈毅这番话，大家都觉得有理。但是，一想起国共合作，有的人马上想到了三年艰难的游击战争，想到了反动军队残酷的“围剿”；有人还想起了“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那是在国共合作、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关键时刻，蒋介石叛变，革命力量遭受重大损失……

突然，一个人说：“蒋介石做梦都想消灭游击队，我们怎么可能和他合作？”另一个人说：“你们看，山下就是国民党军队，我们怎么能轻易下山？”

是呀，中共湘赣省委还来信说，没有省委的指示，不能下山改编。

大家七嘴八舌，不但听不进陈毅的耐心劝告，还怀疑陈毅可能不是党代表，是“叛徒”。

九龙山上，作出了一个错误决定，把陈毅送到省委，请省委书记谭余保处理。

一天，陈毅被送到甘子山，这是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住地。

突然，陈毅被捆了起来。

当省委几个人研究对陈毅的处理时，绑在竹棚子一边的陈毅听得清清楚楚，厉声说：“不能杀，杀掉我，你们要犯大错误！”这句话，把对方镇住了，他们不得不改变主意。

第二天，陈毅被带到树林里进行公审。看到面前坐着的许多游击队员，陈毅想，这正是宣传党的政策的好机会，他用回答问题的方式又把国共合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讲得清清楚楚。

一些游击队员被说服了，他们对谭余保说：“把陈毅关押几天，看看山下的敌人有什么动静。”

谭余保也感到怀疑陈毅是“叛徒”未必妥当，但是他想起不久前一名自称是湘鄂赣边区党委的交通员来到九龙山，走后不久就遭到敌人的“围剿”，使游击队蒙受了损失的教训，又不敢轻易相信陈毅。

数天后，九龙山下的国民党军队撤退了。

谭余保左思右想，派了一名交通员到吉安去了解情况。

当时，吉安已经成立了新四军通讯处。当这名交通员把从吉安取回的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和证明陈毅是党代表的公函送到谭余保面前时，谭余保一阵激动，连声说：“我鲁莽，险些误了大事。”谭余保一边说，一边给陈毅松绑。

陈毅说：“你是个坚决的老革命，是个好同志。”

回到南昌，陈毅听到有人提出要与国民党“合作到底”，又对大家说，我们不能麻痹，搞不好，“合作”就会变成“活捉”。这是多么深刻的比喻。

陈毅上九龙山时，项英在延安。12月13日，项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告了三年来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中共中央当即作出了《关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指出：“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

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陈毅、张鼎丞、曾山、黄道为委员，项英担任分会主席，陈毅担任副主席。

毛泽东对早期新四军组建曾提出明确设想，即：“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

根据毛泽东的要求，叶挺再次来到武汉，住在汉口太和街26号。叶挺的住址被称为“新四军筹备处”或“办事处”。这里与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不远，以前是日租界。随着形势的发展，这里的日本人纷纷回国，房门都贴上了封条。一个多月前，叶挺途经武汉时，亲自带人开锁启封，为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安排了一个活动地点。

叶挺再次到武汉，太和街26号显得十分活跃。新四军办事处的工作刚刚展开，朱克靖、吴振邦等许多叶挺的故旧、部属纷纷赶到汉口，参加新四军的筹备工作，叶挺的一些亲属也应邀陆续赶到汉口。

12月23日，叶挺迎接了两批战友。一批是延安派出的干部，在新四军参谋处长赖传珠率领下乘火车到达武汉，叶挺带领他们在汉口太和街23号住下后，让他们启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给的新四军关防，开展有关公务。另一批人由项英率领。项英离开延安以后，途经西安，乘飞机到达武汉。

项英穿一身八路军制服，叶挺穿一身便衣。当时，新四军办事处的许多干部都穿着便衣。

赖传珠的工作进展很快。12月24日，赖传珠即向叶挺和项英汇报了新四军军部现有干部和工作布置情况。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叶挺和项英一起，会见了军部的全体干部，并就当时的形势和新四军面临的任务发表演说。

那几天，叶挺兴致很高。元旦将近，叶挺说：“这是新四军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我们要在德租界味腴别墅宴请全体干部。另外，延安来的干部每人发8元大洋。”短短几句话，表现出叶挺对新四军这支革命力量的无限深情。当时，新四军的经费很紧张，叶挺任新四军军长时，何应钦只批准发给5万元“开办费”。

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也在德租界味腴别墅设宴答谢。

但是，在新四军组建过程中，国民党顽固派不时发难，制造了不少麻烦。正如周恩来所说：还是“交涉困难”。

元旦过后，周恩来直接找到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发给枪枝。

蒋介石怒气冲冲地说：“现在，连坏枪也发不出了。”

宋美龄在一旁微笑，说：“来了新枪再发吧！”1938年1月6日，新四军军部由汉口移至南昌。这时候，新四军全体干部都穿上了深灰色的制式服装，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力量中，又出现了一支强大的正规军。

然而，新四军的组建工作仍然很艰难，尤其是关于新四军干部任免问题和经费问题，叶挺等人同蒋介石的斗争更为复杂。

干部任免是新四军建设的一个重大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叶

挺为军长以后，中共中央对新四军的编制和各级军官配备提出了具体方案，但国民党方面迟迟不予答复，毛泽东向叶挺提出的“两师四旅八团”式编制也未能实现。经过多次要求，何应钦才以军政部长的名义“核定”，批准新四军“编为第一、二、三、四共四个游击支队”，并“准予照委”陈毅、张鼎丞、张云逸、高敬亭分任一、二、三、四支队司令。

看到这个“核定”，叶挺心头涌起一股怒火，怎么不提对项英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和周子昆副参谋长的任职呢？蒋介石要搞什么名堂？对于经费，何应钦等人也要阴谋。起初，叶挺等人经过详细预算，提出每月经费为16.6万元，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眼睛一眯，整整勾掉了10万余元，只批准每月各种费用为6.5万元。

更为荒唐的是，当新四军要求发给1万套棉军衣时，国民党方面竟说：“新四军打游击，不需要军衣”。

周恩来一眼看穿了国民党方面的阴谋。1月20日，他同彭德怀一起给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蒋对人、枪、钱都抓得紧，不愿我军扩大，不肯发枪加钱。”人、枪、钱，蒋介石看作命根子。

周恩来利用各种机会同何应钦交涉。叶挺去找陈诚。陈诚尽管在前线作战失利，却又被蒋介石委任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武汉卫戍总司令兼湖北省主席等职务。叶挺还去找顾祝同。当时，新四军所在地归顾祝同管辖。

经过一次又一次艰难的工作，项英、张云逸、周子昆等人的任职命令终于获准发布，新四军每月的经费也增加到9万元。

2月上旬，新四军军部发布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结整编，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和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集结改编。全军一共编为4个支队。

第1支队由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胡发坚任参谋长，下辖第1、第2团。

第1团由湘赣边的游击队改编，团长由傅秋涛兼任，副团长是江渭清。第2团由湘赣边、粤赣边、赣东北的游击队改编，团长是张正坤，副团长是刘培善。全支队共2300多人。

第2支队由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罗忠毅为参谋长，下辖第3、第4团。

第3团由闽赣边的游击队改编，团长黄火星，副团长邱金声。第4团由闽西、闽南和浙南等游击队改编，团长卢胜，副团长叶道之。全支队共1800多人。

第3支队由张云逸兼任司令员，谭震林为副司令员，赵凌波任参谋长，下辖第5、第6团。第5团由闽北游击队改编，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昭铭。第6团由闽东游击队改编，团长叶飞，副团长吴焜。全支队共2100多人。

第4支队由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下辖第7、第8、第9团和手枪团。第7团由鄂豫皖边区游击队改编，团长杨克志，副团长曹玉福。第8团由豫南区游击队改编，团长周骏鸡。第9团团团长顾士多，手枪团团团长詹化雨，这两个团是从第7、第8团抽调合编的。全队共3100多人。

此外，湖南和闽南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军部特务营，一共980多人。

新四军改编之初，全军共有10300多人，各种枪6200多支（挺）。

红军游击队的改编，标志着一支新的革命力量的诞生，一个新时期的开始。2月11日凌晨，当参谋处长赖传珠一行来到南昌牛行车站迎接叶挺

时，叶挺神采奕奕，好一副北伐名将风度。当叶挺走进焕然一新的军长办公室，看到赖传珠等人已经整理好的各部队下山集结情况和有关统计图册时，喜上眉梢，眼前浮现出千军万马在抗日战场上奋勇搏杀的情景……然而，新四军的发展是艰难的，叶挺等人面临的已不是军官的“核定”和每月经费，而是一场更为艰巨的斗争。

### 3

蒋介石很不愿意看到新四军在敌后活动，总是要新四军集中起来，其中一个集结地点就是皖南歙县的岩寺。

毛泽东有个设想，新四军应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不断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这就是矛盾，这就是斗争，一场生死存亡的斗争。1938年2月12日，担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回到南昌，同叶挺一起主持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了新四军的集结和补充整训问题。两天以后，叶挺同陈毅、李一氓等人离开南昌，到绩溪第三战区去找顾祝同，要同顾祝同交涉部队的驻地和经费问题。

当时，国民党的一些主力部队尚在新四军周围，新四军驻地的选择事关重大。就在陈毅离开南昌这天，他同项英一起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新四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中岩寺，建议首先以第1支队出动，第2支队暂时留在闽赣，第3支队则在第1支队到达岩寺后再行动。电报还告知，叶挺和陈毅去会晤顾祝同时，将要求新四军不住在岩寺，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江、江苏，安徽的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并受领一定的机动任务。如果顾祝同不同意，新四军就一面到岩寺，一面随即出发，不在岩寺集结停留。

毛泽东看到项英、陈毅拍来的这份电报，思绪万千。

国民党军队被迫放弃淞沪地区以后，日本侵略军更加疯狂，短短两个月，上海失守，南京陷落，杭州等大中城市相继被敌人占领。在南京，日本侵略者惨绝人寰，屠杀了30万中国人。1938年春，敌华中派遣军的3个师团沿津浦路北进，企图南北夹击徐州地区的中国第五战区主力。然而，敌人只能控制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无法控制广大乡村，江苏、浙江、安徽的大部分地区已成为敌后。在日军的大举进攻面前，国民党军队和大部分政权机构都撤走了。

毛泽东在思考，这是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创建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有利时机。

江苏、浙江、安徽等地区，共产党的影响也比较大，有的地方还组织了抗日武装。

2月15日，毛泽东给项英、陈毅发电报。电文指出：

同意14日电的行动原则，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的发展地区，还在江苏

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

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

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础。如有 2 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

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军事家，几句话就指明了“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的方向。

谁知，毛泽东这份电报发出后仅仅 5 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发布命令，要新四军各部队限时到岩寺集中。

岩寺，古名岩镇，在安徽省歙县城西南约 10 公里的丰乐河畔，是著名游览胜地黄山的天然门户。但是，岩寺并非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东各省游击队之间的中心地区；江西的大庾、福建的龙岩等地的新四军，需要长途跋涉 2000 多里，历时 1 个月的行程；最近的也需要一周时间才能赶到岩寺。把岩寺作为新四军的集中地点也是一项艰难的工作。

那时候，许多新四军部队饷额不足，粮秣不济，在向岩寺集中途中，沿途不仅饱受饥饿，还受到了各地军事当局的无理阻碍，有的人由于在十多年中形成反对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的错误思想，对新四军部队恶意造谣破坏。江南的新四军部队战胜种种困难，于 4 月初先后到达岩寺集中，其中闽西南的新四军部队在 4 月 18 日才到达岩寺。

国民党方面让新四军到岩寺集中是别有企图的。这里，我们不妨揭开蒋介石耍弄的几个把戏。

一曰：“点验”。

军队的点验，就是清点枪械数量，核定编制员额。按常理，点验是军队的一项正常工作，但是，蒋介石对新四军的“点验”是另有所图，是要削弱新四军。在国民党军队中，蒋介石常用“点验”的办法削弱非嫡系部队。抗日战争初期，蒋介石又想用“点验”的把戏来削弱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但是，八路军在改编中不同意国民党方面派人进行“点验”。

对此，蒋介石很生气。在南京时，蒋介石当面对叶挺说：南方游击队必须派人点验。

新四军方面考虑到为了改善部队的装备，增加军饷，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派人点验”的要求。

4 月 20 日，国民党首席点验官罗卓英中将带着几十名将、校级“点验委员”来到岩寺，开始对新四军“点验”。罗卓英，字尤青，1896 年 3 月 19 日生于广东省大埔县白侯乡渔洋坪村。1919 年，罗卓英考上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1925 年第二次东征作战时，罗卓英担任第 1 师炮兵连连长。攻打惠州时，罗卓英指挥炮兵射击，摧毁了惠州城楼，使固守了两天的惠州城得以迅速攻破，立了战功。叶挺同罗卓英既是广东同乡，又是保定军校的同学和粤军时期的同事，俩人比较了解。早在保定军校时，叶挺就知道罗卓英与陈诚是莫逆之交，直至发展成为陈诚派系的主要骨干和智囊人物。尽管陈诚连打败仗，但依然是蒋介石的心腹，罗卓英背靠大树来“点验”，很想在叶挺面前抖一抖自己的威风。

罗卓英虽然担任第三战区所辖第 15 集团军副总司令，但军衔同叶挺一样，都是中将。

来到岩寺，罗卓英一眼看见身穿缀有中将军衔的草绿色将官制服的叶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检阅开始了。罗卓英下意识地瞄了一眼身旁的叶挺，觉得叶挺身着那副横扎斜吊的制式武装带和黑色长筒马靴特别精神。那一刻，他想抖一抖威风的感觉飞到九霄云外。叶挺乃北伐名将，军内军外谁人不知？与叶挺同行，罗卓英有几分心虚。

一想到蒋介石和陈诚的交待，罗卓英又打起精神对叶挺说：“老兄，你这里老、小、瘦、弱的兵员还不少呢！”说完，故意瞟了一眼那些下山不久的游击队员，摇了摇头。

叶挺微微一笑，说：“你别看战士们瘦弱，他们可是打不垮、拖不烂的英雄呀！”罗卓英的心“突”地一跳，想到十多年来“剿”来“剿”去，还使红军游击队发展成这么一支队伍，就像挨了一记闷棍。他想了想，又说：“你们的武器残的残，旧的旧，怎么和日本人交手？”

叶挺心中一亮，马上说：“武器问题，还要靠军委会和第三战区来解决。前段时间，我多次同何应钦部长和顾祝同长官交涉，至今没有很好解决。你这次来，可要帮我们出力呀！”

罗卓英脸上挂着一丝冷笑，又问：“你了解这些士兵的素质吗？”

“我同许多战士谈过。”叶挺说，“他们大部分人都打过仗，有作战经验。他们都知道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抗日的积极性很高。”

“他们经过正规训练吗？”

“军队的训练要经常进行，可以补课嘛！”

尽管罗卓英百般挑剔，叶挺为了使部队顺利通过点验，尽量应酬。叶挺还为罗卓英及其随员们准备了几桌宴席。席间，罗卓英说：“新四军人多枪少，编制还要压缩呀！”

叶挺知道，罗卓英这个人权力欲很重，为了满足他们的权势欲望，叶挺表示可以按“点验”的要求作些精简，但这种精简实际上是新四军内部的整编、消化，只是瞒过了罗卓英等国民党要员。

第二天，叶挺又陪同罗卓英等人游览黄山。

黄山以其独特的风貌耸立在皖南山区，是中国名山中的一颗灿烂的明珠。明代著名的旅行家徐霞客曾经写下了“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名句。黄山上，著名的72峰、24溪、3瀑、2湖，峰峰奇特，溪溪曲折，极尽天下山水之美。罗卓英曾经听说黄山以“奇松、怪石、云海、温泉”四绝闻名天下，现在，看到连绵的群峦之间布满着奇松异石，看到飘曳在群峦之颠的云海，仿佛进入仙境一般，心中暗暗感激叶挺的周到接待。

国民党的“点验”官离开岩寺时，叶挺集合新四军机关全体军官，礼貌地欢送他们。

看到叶挺应付国民党要员的这一切安排，项英暗暗高兴。

项英对战士们说：“叶军长真有办法。”

二曰：军部“搬迁”。

新四军军部几经搬迁，其中也表现出了抗日将士与敌斗争的策略。

毛泽东最初的考虑是：“军暂驻武汉，南昌、福州设办事处”。但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后仅仅过了十多天，就移至南昌。自然，江西、福建、浙江、湖南一带部队较多，便于指挥。

南昌位于赣江下游东岸，是一个具有21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汉初时已为南方昌盛之地，因而得名南昌。南昌也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城市，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革命武装

似星星之火，燃遍中华大地。蒋介石很不愿意让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新四军在南昌设立军部，就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命令新四军军部转移到岩寺。

4月4日，新四军军部离开南昌，向岩寺迁移。

毛泽东十分注意蒋介石的这一企图。粟裕将军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将我主要力量限制在面临长江天险和日寇侵华心脏的南京附近地区”，是“实行借刀杀人之计，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我军于这一狭窄地区。”

4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提出新四军不能在岩寺久驻，主力要开往泾县、南陵一带。

5月1日，新四军遵照中央的指示，军部离开岩寺，迁至太平。但太平也不是久驻之地，不久，军部又移至南陵地带。

7月，新四军军部又转移至安徽泾县西25公里处的云岭。云岭东接泾云公路，南依青弋江，西靠黄山，北濒长江，风景秀丽。叶挺很喜欢云岭，曾写诗赞美新四军军部所在地：

云中美人雾里山，  
立马悬崖君试看，  
千里江淮任驰骋，  
飞渡大江换人间。

这以后，新四军军部一直设在云岭，直至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队共约1万多人才于1941年1月4日从云岭出发，向东拟在苏南渡江。叶挺万万没有想到，他日夜渴望驰骋的“千里江淮”，在国民党顽固派的围攻下，洒下了无数新四军将士的鲜血。

项英当时对蒋介石等人的阴谋也是警惕的。4月29日，项英给毛泽东打电报，其中讲到：国民党当局“以命令强迫”新四军，“显然是将我送出到敌区听其自灭，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

军部不能在岩寺久留，部队也不能在岩寺久驻。新四军改编已有数月，国民党方面却迟迟不发给经费，不发给枪支弹药，同时还在新四军游击活动的地域派遣了许多牵制武装。蒋介石的企图早被抗日将士们看透。中共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从第1、第2和第3支队抽调部分干部战士组成先遣支队，于4月28日从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挺进，进行战略侦察。

率领这支先遣支队的是一代名将粟裕。

出发前夕，陈毅赶来了。陈毅对大家说：我们要以打击日寇的实际行动来争取江南抗日的领导地位。先遣支队的任务很重，新四军挺进敌后靠什么呢？主要靠三条，一条是模范的群众纪律，另一条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再一条是胜利的战斗，希望同志们旗开得胜。

陈毅还先期赶到南陵，与国民党军队交涉，为先遣支队疏通道路，直至看到粟裕和战士们顺利地通过了日本鬼子设置的芜湖——宣城封锁线，才返回。

但是，主力部队没有马上跟进。新四军主要领导人对向敌后进军有不同看法。

项英尽管意识到国民党当局“含有借刀杀人的用意”，但他仍然希望新四军留在皖南，不到敌后去。项英提出的四条主要理由是：

新四军还需要从国民党方面争取补充武器；  
敌后水网平原地带部队行动困难；

干部战士需要训练提高；

深入敌后会触动江浙财团，那是蒋介石的靠山。

这显然是不行的。实际上，项英对新四军的行动另有考虑。粟裕将军回忆当时的情况时说：“项英同志从右的立场看待国民党蒋介石借刀杀人的阴谋，不敢到敌后去，希望通过谈判在第三战区范围内得到一个‘较好’的防区。”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从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高度出发，于5月4日打电报给项英，要他树立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信心。毛泽东明确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

毛泽东还要求新四军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的广大地区创建根据地。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

项英看了这份电报，同意陈毅率领1支队向江南敌后挺进。

5月下旬，新四军第1支队途经南陵时，召开干部会议，陈毅特地作了关于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苏南有许多水网稻田地，这同新四军战士以往在山地作战大不一样。陈毅在讲到在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的困难时，告诉大家，“寇能往，我亦能往”，要善于利用地形，克服轻敌急躁思想，增加开创苏南抗日根据地的信心。

在溧水的刷新桥，陈毅率领的第1支队主力与粟裕指挥的先遣支队相遇，整整5个小时，粟裕把侦察到的敌后情况详细地向陈毅作了汇报，陈毅对苏南的情况更清楚了。

6月中旬，新四军第1支队到达苏南溧阳竹箠桥，很快在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展开。

新四军与敌激战的序幕即将拉开。

#### 4

军事家都欣赏首战告捷，那是振奋军心的捷报。

华北战场上，八路军出师抗日，第115师首战平型关大捷，大快人心。

江南敌后战场上，陈毅指挥新四军第1支队，首战告捷，再战抓获日俘，攻克县城，也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和威风。

新四军首战日本侵略军是在韦岗，这是陈毅和粟裕密切配合进行的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韦岗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是日本鬼子经常活动的一个集镇。6月11日，陈毅和粟裕接到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的命令，要新四军先遣支队破坏镇江到下蜀之间的铁路，牵制日军会攻武汉。新四军当时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序列，该战区司令长官是顾祝同。

陈毅仔仔细细地看完命令，决定从第1支队第2团抽调两个连队加强先遣支队，同时命令第2团的两个营在镇江至下蜀一带活动，及时策应粟裕。



粟裕到达苏南后，发现镇江至句容之间的公路上经常有日本鬼子的汽车活动，就决定在韦岗设伏。

6月17日凌晨，粟裕率领先遣支队完成了破袭铁道的任务以后，巧妙地指挥部队在韦岗设下了伏击圈。新四军将士张网以待。

太阳从东山露出了脸，射出道道强烈的金光，像是在向大地欢笑，藐视那层淡雾的不堪一击。蔚兰色的天空上没有一丝云彩，越发显得它的深邃无边。日本鬼子的汽车队一早就从镇江出发了，侵略者们坐在汽车上耀武扬威，目空一切。当车队驰近韦岗时，突然响起了一阵激烈的枪声，子弹、手榴弹暴风雨般地落在日军的汽车上。日本鬼子万万想不到会遭到新四军的伏击，几乎没有还手的机会。

战斗只进行了短暂的半个小时，日军指挥官土井少佐等20多人成了异乡之鬼，负伤者更多，4辆汽车被击毁。当镇江的日军闻讯赶来增援时，新四军将士早已安全转移。

韦岗首战告捷，新四军缴获日军的长短枪十多支，日币7500多元和许多其他军用品。

当大家把缴获的日本国旗、日军军旗、日军指挥刀、军大衣、钢盔、皮鞋、望远镜等物品在一座祠堂里展出时，远远近近的群众争先恐后地赶来参观，新四军打胜仗的消息很快传遍镇江、句容，传遍苏南，传遍全中国……韦岗伏击战的规模不算大，但是，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连打败仗，苏州、镇江、南京等大中城市相继被日军侵占的严重形势下，新四军在江南首战告捷，旗开得胜，不但当地群众人心振奋，也提高了新四军的声誉。

陈毅得知韦岗伏击战的捷报，兴奋不已，当即作诗曰：

弯弓射日到江南，  
终夜喧呼敌胆寒；  
镇江城下初遭遇，  
脱手斩得小楼兰。

陈毅称韦岗之战为新四军的“处女战”。

10天以后，新四军又用伏击手段，俘虏了进入江南以后的第一个日本军人。

抗日战争初期，经过法西斯军国主义训练的日本鬼子气焰嚣张，在战场上很难俘获日本军人。曾经担任八路军第115师第686团团长的李天佑将军回忆当时的战斗时，气愤地说：日本鬼子不仅不懂中国话，而且还是一群经过法西斯军国主义训练的至死不悟的野兽！他们只知道向中国人开刀，喝中国人的血，吃中国人的肉。许多战士因为缺乏对日寇作战的经验，反被垂死的敌人杀伤了——

一个正在公路上查线的电话员看见汽车旁躺着一名即将死去的鬼子，跑过去大喊一声：“缴枪不杀，优待俘虏”。谁知鬼子扬手就是一刺刀，刺进了这名电话员的胸部。

一名战士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鬼子背回来，那鬼子苏醒过来时，把八路军战士的一只耳朵咬掉了。

在平型关战场上，日本鬼子虽然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却依然十分野蛮和骄横，不肯举手投降。李天佑将军称日本鬼子是“至死不悟的野兽”。

新四军在韦岗成功地伏击敌人以后，陈毅又指挥2团2营在竹子岗伏击了日本侵略军的一个车队。这次设伏，不但打击了敌人，还抓获了一名日

本军人。此人是日本华中派遣军的特务机关黎明公司的经理，叫管明弦政南。新四军挺进苏南，抓到了第一个俘虏。

连战皆捷，新四军士气高昂。7月1日，陈毅又亲自部署了袭击京沪铁路上新丰车站的战斗。这天，新四军巧妙偷袭，将驻守在新丰车站的80多名日本鬼子团团围住，经过一阵激烈战斗，新四军巧借火神，熊熊烈火烧毁了新丰车站的三层大楼，80多名日军全部被歼灭，又是一场大快人心的歼灭战。

8月13日，陈毅司令员亲自指挥第2团的部队夜袭句容县城，一举摧毁了伪县政府。

新四军挺进江南，第一次攻下了一个县城。

一个接一个的胜仗，真是令人兴奋。

与此同时，江北新四军第4支队东进抗日的第一仗也打得很漂亮。那是5月16日。高敬亭指挥的第4支队得到情报，驻巢县的日本鬼子要到蒋家河口抢掠。蒋家河口离巢县有十多里，这是一个打伏击的好战机，第4支队当即决定由第9团副团长带领部队前往蒋家河口设伏。

清晨，当20多名日本鬼子分乘两艘小汽艇驶到蒋家河口登岸时，新四军指战员对其猛烈射击，当场就打死打伤十多名日本鬼子。当残敌企图登上汽艇逃跑时，几名战士眼明手快，用手榴弹把汽艇炸沉。一名侦察员看到一个日本鬼子游水潜逃，立刻跳进水中，用刀把日本鬼子砍死。

这一仗只用了约20分钟，击毙20多名日本鬼子，缴枪11支和一些其他战利品，新四军指战员无一伤亡。这又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

首战告捷以后，新四军第4支队又在安（六安）合（合肥）公路两侧连续袭击敌人的后勤供应，打击了伪政权，取得了范家岗、棋盘岭、西三十里铺等数十次战斗的胜利，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作战行动。

然而战争环境是复杂的。正当新四军将士出师抗日，在敌后游击战场上捷报频传时，新四军的两名主要领导人叶挺和项英在工作上出现了一些矛盾。

新四军远离延安，在江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对新四军主要领导人之间的工作关系十分注意。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给项英的电报中，特别要求项英“始终保持与叶同志的良好关系”。

毛泽东这一句话，寓意深刻。

新四军组建以前，毛泽东特地把叶挺和项英请到延安，一方面是交待有关新四军建设的方针大略，同时也希望项英和叶挺等人之间密切合作，不断发展壮大新四军这支革命力量。

此后，毛泽东又多次对项英说，新四军的军事指挥叫叶挺来办，提出要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关系。毛泽东甚至说：叶挺工作问题的解决，将影响新四军的前途，全国同情对我之态度，关系也极大。

在中国革命斗争中，叶挺将军有他辉煌的一页，项英也有他值得自豪的经历。

叶挺1919年初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曾经在孙中山身边工作。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中，叶挺冲锋陷阵，屡建奇功，饮誉中外。

项英从1920年起从事工人运动，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参与领导了1923年的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和沪西日商纱厂工人二月罢工。

北伐战争中，当叶挺率领独立团打到武昌城下时，项英正在发动武汉

的工人配合北伐军作战。叶挺协同友军攻占蛇山、迫使北洋军投降时，项英担任武汉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与叶挺共同分享胜利。

叶挺同周恩来、贺龙、朱德、刘伯承等人一起领导了震惊中外的南昌起义，叶挺率领的第 24 师是起义军的骨干，起义后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兼第 11 军军长。1927 年 12 月，叶挺又与张太雷等人领导了广州起义，任工农红军总司令。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三大起义，叶挺参与领导了两次起义，这是何等光荣。

项英在 1923 ~ 1928 年期间连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六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项英还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并被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项英既是中国共产党的常委，又是共产国际的监委，他的责任是何等重大。

从延安到南昌，叶挺是否想到了北伐战争，想到了“八一南昌起义”？项英是否想到了“二七大罢工”，想到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叶挺的个性鲜明。平时，这位中将军长服装整洁，仪表堂堂。叶挺爱吃广东菜，身边有一名广东籍的厨师。身为军长，叶挺总是骑马到各支队去，随行人员也比较多。有时外出巡访或集合，叶挺总要带上他那架德国造的高级照相机，拍些精彩的照片。叶挺同各方面的朋友们交往也比较频繁。

项英却对这些显得不习惯。叶挺有客人来，起初也邀请项英一起聚餐，项英去了一两次，再也不肯去了，叶挺也不勉强。

项英有他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他向党中央汇报新四军的工作，不征求叶挺的意见。党中央的有关指示，项英也不向叶挺传达。对此，叶挺难以接受。

1938 年 4 月，蒋介石曾经命令，新四军集中后出南陵，依大茅山脉向芜湖、宣城一带行动。叶挺思前想后，认为可以这样做。项英认为不应该执行蒋介石的这道命令。

项英想撇开叶挺，由他自己同蒋介石打交道。4 月 18 日，项英给毛泽东、王明和周恩来打电报，公开提出同蒋介石交涉，由叶办，不能解决问题。蒋压迫叶，不能反抗。应由党负责直接交涉四军。因党不出面，以间接方式解决，使问题愈弄愈棘手。

毛泽东批示：不妨出南陵。

毛泽东不仅同意叶挺的意见，还进一步指出：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以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

在一些朋友面前，叶挺显得很活跃。著名的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到皖南采访时，叶挺特地让新四军军医处长沈其霞把史沫特莱接到军部。史沫特莱想看看新四军的“竹子医院”，那是在叶挺的直接过问下发展起来的一所医院。在这所医院里，病房是竹子造的，病床和桌、椅都是用竹子做的，皖南有的是竹子。病房显得十分明亮、整洁。叶挺得知后，亲自陪着史沫特莱去看望伤员。

有几天，叶挺还同史沫特莱一起到山上去采摘鲜红的杜鹃花，史沫特莱总是把最好看的那些花献给伤病员。新四军医院药品紧缺，设备简陋，史沫特莱听了叶挺的详细介绍以后，当即表示要写一篇有关新四军医务情况的报道，要帮助新四军解决医院的某些困难。叶挺感激史沫特莱的国际主义精神。

6 月初，叶挺离开云岭，再次来到武汉的国民党军委会，要求国民政府

再给新四军增拨一些军费。当叶挺得知周恩来和叶剑英也在武汉时，马上前往中共中央长江局去找他们。

周恩来、叶剑英和叶挺的感情很深，多次同生死共患难，筹建新四军时，他们同叶挺的交往也十分密切。这次又在武汉见面，三个人分外高兴。

周恩来紧紧握住叶挺的手，询问新四军的情况。

叶挺微笑着说：我到武汉跑一趟，他们总要给我增加些军费嘛！

一提到工作环境，叶挺的脸色就变了，说：我名义上是个军长，却有职无权，难办呀！

叶挺看了看周恩来，又看看叶剑英，果断地说：我想了好久，是否可以成立一个共同议事的新四军委员会，新四军的工作一定能开展得更好。

周恩来和叶剑英对叶挺的处境很同情，也理解叶挺要抓好新四军建设的心情。当天，周恩来和叶剑英就向党中央发电报，告知：“叶挺来汉，军费增加，情绪很好。要求在新四军组织一个委员会，以便共同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周恩来和叶剑英还明确表示了他们的想法，建议“拟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副。如何？盼复。”

毛泽东和党中央很重视叶挺的建议，马上答复：“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项为主任，叶为副。”

项英在皖南也收到了党中央的复电。

叶挺很高兴，一个棘手的问题即将解决了。

叶挺说：“周公总是那样的关心人，了解人，帮助人。”

叶挺还说：“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

可是，项英对叶挺的建议有抵触情绪，新四军委员会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叶挺的工作条件没有得到改善。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桥儿沟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项英提前离开新四军军部，先到武汉述职，再赴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

自新四军挺进江南敌后，连打胜仗，也使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受到极大震动，日伪军对新四军的“扫荡”也更为频繁，反“扫荡”的形势很严峻。

周恩来收到叶挺的电报，于8月28日同王明、博古一起回电，坚决挽留叶挺。电报中说到：“项英同志已赴延安，我们不日也往延安开会。关于新四军工作，请兄实际负责。”“当前战役已到紧急关头，兄必须到前方督战，万万勿误。我们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觉有困难，请明告。我们正帮助你克服这一困难。延安会毕，我们拟来一人帮助整理四军工作。”

叶挺没有等到中共中央的六届六中全会结束，甚至不等会议开始，而是在收到上述电报的第三天，就向汉口的中共长江局发出电报，并请长江局转告项英。这份电报讲到：

我军在战局激变中与各军关系更为复杂，且部队整训实属繁重，原非我独力所能处理。

你离部之期已远逾叔时之约，恳即从速南归。

从电文中可以看出，新四军当时正处于整训和作战的严重时刻，项英长时间离开部队，“远逾叔时之约”，叶挺对此是有看法。因此，叶挺也要向顾祝同请假，到湖南、江西去观察。叶挺在电报中说：

我拟于下月初赴顾（祝同）处一行，如能请准假，则返香港，观察各

方情形。你何日回，盼即告之。

不久，叶挺在教导营一个班的护送下，离开新四军军部，缓缓南行。

这时候，陈毅根据毛泽东的电报精神，在创建茅山抗日根据地的同时，开始筹划向东向北分兵发展的行动部署。茅山周围司令多如牛毛，少则几十人，多则数百人，都称作一方司令。陈毅认为，这也是可资利用的抗日力量，向东向北分兵发展，做好这些地方武装的工作，也有利新四军的发展壮大。

八路军挺进华北、山东以后，部队已增长五倍。新四军在江南，部队只增长一倍。

八路军已经开辟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晋西、山东等十多块根据地，新四军还只有茅山一处抗日游击根据地。

陈毅的行动，为新四军东进北上奠定了重要基础。

叶挺一行来到南昌，这位新四军军长感慨万千。十多年前，也是在南昌，他同周恩来、刘伯承、贺龙、朱德等人一起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那是多么激动人心的时刻……十多年过去了，南昌依旧，赣江依旧，叶挺的心情却难以平静。

离开新四军军部时，叶挺没有带警卫分队，而是让教导营的一名参谋负责。这天，叶挺把他们叫到一起，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护送我的任务，到南昌就完成了。下一步你们到湖南去学习工兵技术，学习爆破。我们现在的武器比较差，学会爆破技术，也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为了给他们创造顺利学习的条件，叶挺特地告诉设在南昌的新四军办事处，到国民党统治区去学习的人，每人领取 80 块银元。

新四军军费不足，每人 80 块银元，已不是一个小数目。

分别时，叶挺又说：你们要带好新四军的符号和胸章，要保持组织，保持新四军艰苦奋斗的传统，不要听坏人的挑拨离间，不要做投降派，不要参加国民党。现在虽然是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时期，也要防止坏人搞破坏。

叶挺忘不了新四军的符号和胸章，忘不了新四军的传统，更忘不了新四军广大指战员的音容笑貌。

到湖南学习的指战员很快学会了爆破技术，回新四军后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1938 年 10 月 11 日，日本侵略军第 21 军主力在司令官古庄干郎中将的指挥下，到达广东省大亚湾口，其主攻部队第 18 师团主力先后在大亚湾西岸澳头岛虾涌圩、岩前港登陆成功。大亚湾属于国民党军队的第 4 战区，何应钦和余汉谋大概不会想到日军会在大亚湾登陆，因此没有在大亚湾设防，日本侵略军没有遇到抵抗。第二天，日军第 21 军司令部又下达了攻占惠州的命令，并迅速北上。

广东省的东江地区，岗峦叠嶂，河流纵横，不利于日军的重兵器和辎重车辆行走。谁知日军进攻连连得手，不几日，虎门陷落，广州陷落。

叶挺得知故乡被日本侵略军侵占，心情分外沉重。离开南昌后，叶挺决定到广东去，到故乡去，去打日本鬼子。

叶挺来到广东北部的城市韶关时，见到了余汉谋。余汉谋是广东高要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1925 年，余汉谋担任国民革命军第 4 军第 11 师的一名团长，当时，叶挺是第 4 军独立团团长。1927 年，叶挺组织领导南昌起义时，余汉谋担任第 11 师副师长。1936 年，余汉谋连续被授予陆军中将、上将。抗日战争爆发后，余汉谋又担任第 12 集团军总司令、第四战

区副司令长官，参与了淞沪、南京、陇海等战役。余汉谋对叶挺比较熟悉。

余汉谋当时掌握了广东省的军政大权。日本侵略军从大亚湾登陆以后，余汉谋被迫退到韶关。但是，余汉谋当时有两大顾虑，一是担心日军的肆意侵略会使他失去粤南的根据地，二是担心日军继续北上，使他在广东无立足之地。这个广东军阀深知无势力则无权的定则，也深知蒋介石吞并异己的手段，他急于想在东江流域组织起一支游击军，开展“敌后游击”，牵制日军，使日军难以北上。

但是，谁来指挥这支游击军呢？余汉谋本人是不便直接出面的。

余汉谋见到叶挺，眉开眼笑。

叶挺说，他想在东江发动游击战争，打击日本侵略者。当时，叶挺不再坚持辞去新四军军长的职务。

余汉谋很快发布命令，委任叶挺为东江游击指挥。余汉谋是想借用叶挺的威望，尽快稳住广东的局势。

粤东南特委和粤南的群众得知叶挺要领导家乡的抗日游击战争，很高兴，各方面都给予大力支持，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游击队。

叶挺想，要多发动当地群众，多动员港澳爱国青年，争取在短时间内组织一支上万人的部队。

叶挺要打电报给新四军领导人，希望能从新四军抽调几十名干部支援东江游击队。

蒋介石得知这件事后，连声咒骂“娘西匹”。

余汉谋还想申辩，蒋介石更火了，不等余汉谋说完，连声责斥：你余汉谋搞什么鬼？这不是让共产党又在华南建立一支“新四军”吗？华中的新四军够我操心了，你不要再上当。

你立即撤销委任，让叶挺离开东江。

中共中央也认为，在抗日战争全局中，华中的战略地位比华南重要，叶挺在华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叶挺顾全大局，按照中央意图，把指挥部的机构撤销，人员遣散，回到香港后，设法与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取得了联系。

这时候，周恩来也十分关心新四军的发展和叶挺的情况。周恩来了解有关情况以后，同叶剑英一起打电报给项英，明确提出：工作关系不良，应当改善，为统一战线的发展，以请叶挺回新四军工作为有利。

项英接受了周恩来和叶剑英的建议。

周恩来又打电报给叶挺，请叶挺到重庆去。

叶挺愉快地接受了周恩来的邀请。飞抵重庆以后，叶挺题写了“抗战到底”4个字，以此表达自己的心愿。1939年1月21日，《新华日报》刊登了叶挺的这一题词。

项英不等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闭幕，就回到新四军。10月23日，项英急电中共中央军委转周恩来。电文说：叶之辞职系（愈）坚，本问题无可挽回。目前四军问题应直接由周与蒋解决继任人。以后四军与八路军共同由党直接解决各种问题，才是根本之办法。

法。

这说明，项英希望选择他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

周恩来看到这份电报，不同意项英的意见。周恩来还同叶剑英商量。11月2日，周恩来和叶剑英从长沙打电报给项英，说：

希夷（即叶挺）尚未见，正从各方面探访中。我们拟向希夷说明两点：一、新四军应保持我党领导，不能改变现行制度，此事已向蒋说明过，希夷不应

有异议；二、至于工作关系不良，可以改善，而且应当改善。

关于新四军军长人选问题，周恩来和叶剑英明确告诉项英：

我们估计希夷不回部，蒋亦不肯另委别人，为

着统一战线的继续发展，希夷回部工作是有利的。

由于新四军是由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又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三战区序列，对新四军军长的职务，国共双方都很关心。叶挺离开新四军，国民党方面引起很大反响。蒋介石多次对中国共产党的有关人士说：连叶挺都不能与你们合作，将无人与你们合作。

周恩来分析当时的形势，认为蒋介石对新四军可能采取两种办法，一种办法是另派更难相处的军长，当然，蒋介石不会派叶剑英去任新四军军长；另一种办法是把新四军改为游击队，减少军款二万，如果这样，对中国共产党方面更不利。

1939年1月8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提议叶挺仍回新四军。解决新四军问题的原则是：“共产党的领导必须确定，工作关系必须改变，新四军委员会可以叶正项副，项实际为政委。”

两天以后，中共中央复电，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且进一步提出：“应尊重叶之地位与职权，我们提议，项多注意四军总的领导及东南局工作，而将军事指挥与军事工作多交叶办。”

中共中央书记处还委托周恩来，在1939年春到新四军去一次，处理新四军的有关问题。

其实，叶挺对中国共产党有很深的感情，对新四军也有很深的感情。

在重庆时，叶挺应召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微微一笑，上下打量一眼叶挺，说：好，你来了就好。你还愿意回新四军吗？

叶挺略一思考，说：我愿回新四军工作。叶挺还表示，新四军问题好解决。

周恩来也同叶挺多次交谈。当周恩来向叶挺转达党中央留在华中的决定时，叶挺笑了笑，说：“我只因自己非党，工作困难，大家信任差。如加入党，则只有往八路军；因为在四军，蒋介石会怀疑我。”

叶挺的话语中，流露出与项英共事的难处。

忽然，叶挺头一昂，问：“恩来，可不可以让我到八路军去带兵打仗？如果可以，不论到哪个师，担任何种职务，我都愿意。”

周恩来笑了，说：“华中也很重要嘛！”周恩来很体谅叶挺的难处，接着说：“党中央已经同意新四军委员会由你任正职，项英为副职。”周恩来还说：“对项英在新四军发展方针和内部团结方面所犯的错误，党中央很重视，正设法纠正。以后，新四军的军事工作多交你办理。”

……

周恩来那番热情洋溢的话，深深感动了叶挺。叶挺再次表示，愿意听党的指示，回新四军工作。

周恩来紧紧握住叶挺的手，说：“到时候我们一起动身，我送你回皖南。”2月3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和王稼祥报告：叶挺到重庆后已见过蒋介石和陈诚。蒋介石问叶愿回新四军否？叶挺准备回去，并表示新四军问题好

解决。

毛泽东十分关心叶挺的意向。叶挺不是一个普通的军长，而是在新四军当军长。

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说：“我们力劝其回，并拟确立制度必能解决工作困难与关系。我拟向蒋、陈说与叶同往新四军，顾祝同已来电欢迎。”

周恩来原籍是浙江省绍兴。这次，周恩来回东南的表面理由是回故乡省亲。当时，浙江省政府主席是黄绍竑，他同周恩来是旧识，很欢迎周恩来到浙江去。

2月16日，周恩来和叶挺一起乘飞机从重庆飞抵桂林。

当时，黄绍竑也在桂林。

2月18日是农历除夕，按照中华民族的传统，这一天应该全家团聚吃年夜饭。周恩来却和叶挺、黄绍竑一起从桂林乘火车，缓缓奔湖南、江西而去。

列车到达江西省的樟树车站时，周恩来和叶挺要下车了。黄绍竑握住周恩来的手，说：“恩来，我先回浙江，作些准备，你一定要去呵！”国民政府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一度设在安徽绩溪，后来又转移到江西上饶。由于工作需要，周恩来和叶挺从樟树坐汽车到上饶，先后会见了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再经赣东北前往安徽泾县新四军军部。

周恩来此行，要妥善解决新四军的有关问题。

## 1

陈毅得知周恩来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视察，早早地来到泾县云岭附近的章家渡，同项英一起迎接周恩来。

叶挺回到新四军军部后，又特地到太平县去迎接周恩来。

在湘潭村，周恩来同叶挺一起登上竹筏，顺水北上。

皖南山区，春意盎然。青弋江的水哗哗地流，仿佛在向客人欢笑。幼芽在柳枝上萌发，虫蚁爬出了洞穴。春雨丝丝，像千条万条彩色的线，忙碌地为大地绣织鹅黄浅绿的春装。水绿了，山绿了，万绿丛中，唯有杏花在洁白中浸出几许粉红。周恩来和叶挺兴致勃勃，一边欣赏山色，一边交谈，十分投机。

看见周恩来，陈毅非常高兴。陈毅心里明白，周恩来此行，不仅仅是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身份来视察第三战区，也是专程到新四军传达和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

粟裕也来迎接周恩来，他是同陈毅一起特地从苏南敌后赶到新四军军部的。

来到新四军军部，周恩来看见会议室里挂的领袖像只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却没有看到孙中山的像，心中升起一个疑团。他认为，在国共合作时期，也应该把孙中山的像挂出来。

周恩来心中的这个疑团没有消除，又看到新四军第二次政工会议的一个文件中，有反映王明右倾错误思想的内容，周恩来更为吃惊。党的六届六



中全会已经批判了统一战线问题上只讲联合不讲斗争的迁就主义，也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可是这个文件一味迁就国民党的军事指挥系统，还把蒋介石的演讲编成材料进行宣讲，这怎么行？周恩来看了项英一眼，郑重地说：你们不挂孙中山先生的像，看起来很“左”，但是又讲一切服从国民党，甚至还用蒋介石的讲话作教材，完全丢掉了我们党独立自主的原则，岂不是很右吗？你们必须以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为准则，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

一天，叶挺和项英为了欢迎周恩来，特地举行了一次小型宴请，在军部的新四军主要干部也出席了。入席时，周恩来坐在主宾席上，叶挺和项英分坐两旁。

叶挺马上站起来，举杯提议：“我和项英代表新四军指战员欢迎周恩来同志前来指导工作。来，为恩来同志浙皖视察一切顺利，干杯！”

周恩来马上端起酒杯站起来，一边道谢，一边同叶挺、项英等人一一碰杯。喝了酒，周恩来又示意袁国平和周子昆，要他们向叶挺敬酒。

袁国平是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周子昆是新四军的副参谋长，早在北伐战争时期，袁国平和周子昆就是叶挺的部属。袁国平是湖南宝庆县人，1925年冬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政治科，翌年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后来长期从事人民军队的政治工作。周子昆是广西桂林人，曾经参加孙中山的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以后，在叶挺独立团任排长、连长、营长。周恩来这一声提议，很自然地使大家想起了叶挺的革命历史。

不久，周恩来向新四军领导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叶挺工作的意见。周恩来还多次找项英谈话，他对项英说：“叶挺是个好同志，很有军事才能，这样的将领如果不去团结，还要团结谁呢？”

项英默不作声。

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叶挺是热爱党的事业、热爱人民解放事业的，不能认为他现在不是党员就不欢迎他。你想过吗？叶挺参加党，不如留在党外对党的工作更有利。”

项英作了自我批评，说：“我要同叶挺搞好团结。”

周恩来还同陈毅作了长谈。他对陈毅说：你们在江南的发展是符合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的。要使日寇在正面战场不再深入，就必须在敌后战场开展更广泛更深入的游击战争。现在，八路军在五台山，牵制敌人主力五六万；新四军在江南，牵制敌人主力三四万。如果全国有十几个、二十几个这样的地区，日本侵略军就要疲于奔命了。

关于新四军的情况，周恩来还广泛听取了各支队领导和基层干部的意见，知道了许多新情况，做了许多树立叶挺威信的工作。

但是，项英心中仍然没有完全消除对叶挺的成见，叶挺的工作处境也没有很好改善。后来，周恩来在重庆见到袁国平时，再一次叮嘱：“如果项英再不团结叶挺，可以在党内开展思想斗争嘛！可以批评项英的错误嘛！”可是，袁国平回新四军以后，没有及时传达周恩来的这一指示，皖南事变就发生了。

历史就是这么阴差阳错。

周恩来到皖南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帮助新四军解决发展方向问题。

1939年春季，陈毅指挥的新四军第1支队已经挺进苏南，创建了以茅

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张云逸指挥的第3支队进抵皖南长江沿线，策应苏南部队。但是，从全局看，新四军所处的战略态势仍然不利。

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以后，把7个师团和1个独立混成旅团部署在长江中游地区，武汉、南昌周围的一些主要城市相继被日军占领。尽管日本侵略军的主要意图是针对那些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但是，新四军主力驻扎在皖南，日军在南面对新四军构成了威胁。长江下游的苏浙皖地区，还有日本侵略军的4个师团又3个独立混成旅团，这也是一股威胁力量。

苏北敌后，国民党军队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指挥的约10万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斥和迫害苏北地区的抗日力量。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司令部也驻在新四军军部的南面。

新四军主力的左右两侧也部署了许多国民党军队。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实际上被限制在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之间地域，横宽约100公里，纵深约50公里。

新四军处于这种战略态势下，一旦战争风云突变，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

解决新四军的发展方向，刻不容缓。

延安：毛泽东在思考。

皖南：周恩来在思考，陈毅在思考，叶挺、项英都在思考，新四军每一个指战员也在思考。

有人说：向南，向闽浙方向发展。他们认为江南敌、伪、顽的力量过于强大，部队在平原水网地带作战会有许多困难。闽浙一带山高林密，地形条件有利于打游击，群众基础也好，新四军应该向闽浙发展。

陈毅在想，闽浙一带是国民党统治区，在日军没有侵占浙赣闽广大地区时就向闽浙一带发展，就会造成政治上的被动。武汉失守以后，国民党政府在对内对外政策上发生了严重变化，新四军必须冲出国民党第三战区所设置的牢笼，向东发展，向北发展。

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的干部大会上，详细阐述了新四军的发展方向。

周恩来认为，在新阶段，新四军和八路军抗日的中心应放在敌后，要在敌人占领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新四军要在黄河以东、平汉路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中国东部人口多，是交通便利、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文化程度高的地区，也是代表了中国走向近代化最有力的地区。我们愈向敌人的后方，愈能够得到发展的机会。

周恩来响亮地提出，我们要坚持游击战争，创造大江南北的根据地，给敌人看，给全国全世界看。我们绝不退后，绝不逃避。

对新四军的发展原则，周恩来明确提出三条。

哪个地方空虚，我们就向哪个地方发展。

哪个地方危险，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

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根据这三条原则，周恩来又明确提出新四军今后活动方针的三句话、十四个字，即：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有阵地。

向北发展：抽调部队过江，把江北发展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据地。

向东作战：出击沪宁地区，在国内外造成巨大影响。

巩固现有阵地：新四军皖南军部和茅山根据地要不断巩固、发展，也

即是“向南巩固”。

这是周恩来对全局形势的深刻洞察，也是对新四军发展的高瞻远瞩。这与毛泽东的要求相吻合。

4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

6月，毛泽东指示东南局：必须大力发展华中中的游击战争。

11月，中共中央重申：整个江北的新四军应从安庆、合肥、怀远、永城、夏邑之线起，广泛猛烈地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海边，不到海边，决不停止。

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得到了许多新四军干部的赞同。陈毅、粟裕等人都积极执行了这个方针。

如果自始至终贯彻这个方针，新四军会发展得更快。

如果坚定不移地贯彻这个方针，历史上也许没有皖南事变这一页……历史没有如果，但要思考如果……

无论如何，在周恩来的指导下，新四军的发展方向更加明确。

周恩来要去浙江了，他已经在新四军紧张地工作了20多天。

云还是那么淡淡的，山还是那么绿绿的。叶挺依依不舍地陪同周恩来来到青弋江边，当周恩来踏上那只早已准备好的竹筏时，叶挺也身不由己地跨到竹筏上，他要送一程，再送一程。

周恩来和叶挺并肩伫立，双双眺望远方。

碧绿的青弋江上，留下了两位革命者的身影。

竹筏缓缓地向远方游去。那是逆水而行。

蒋介石得知周恩来到皖南，立刻想到了新四军，想到了叶挺。蒋介石急忙派陈诚和白崇禧也去江南，赶到第三战区。

顾祝同和陈诚、白崇禧密谋良久，电告蒋介石：叶项乃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蒋介石又对顾祝同说，你们要进一步限制江南，着重对付陈毅、粟裕。

顾祝同答应得十分明确。蒋介石的心中还在翻江倒海。南昌陷落，长沙再度告急，蒋介石想来想去，还是希望新四军来牵制日军的进攻。

为此，蒋介石同意新四军在华中成立指挥部。

送走了周恩来，叶挺集中精力处理新四军的日常军务，其中有几件事比较重要、迫切。

第一件事是向国民政府军委会送去了《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这个文件是对新四军进入江南敌后一年的战斗总结，也是对国民党顽固派污蔑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有力驳斥。叶挺还对国民政府克扣新四军武器经费、限制新四军活动地区等行为提出抗议。

何应钦仔细看了叶挺主持编写的《关于新四军对敌作战说明书》，他很关注新四军所采取的战术，他在文件上批示：

此报告颇有价值，可作我军战术研究之资料。

何应钦不肯给新四军增拨武器和经费，也不让新四军扩大活动区域，但他对新四军的作战经验感兴趣。

第二件事是为新四军第二届参谋工作会议起草演讲稿。那是一次可以代表叶挺军事思想的重要演讲。会上，叶挺说：我们要用作战的勇敢精神来进行教育，不要自傲自大，以为打了许多年的游击战争已很够了，不需要再学什么了。就是我们有以往的优良的游击战争传统，也还需要有不断的进步。

我们要求政治上进步，也要求军事上的进步。没有军事的胜利，当然不会有政治的胜利。

4月下旬，叶挺北渡长江，到皖中地区去整顿新四军第4支队。

## 2

东进北上，这是维系新四军发展的重大方略。

蒋介石注意到了，他不希望在他发迹的地方有一支强大的共产党领导的军队。

日军注意到了，伪军也注意到了，他们面临着陷入一个陌生的战场。

新四军指战员群情激昂，他们又踏上了通向胜利的征途。

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向南巩固……

征途多艰险呀！

陈毅和粟裕离开新四军军部后，迅速部署部队东进北上。1939年4月，陈毅和粟裕指挥的新四军第1支队和第2支队已经发展到14000多人。刚进入敌后开辟茅山根据地时，这两个支队只有4000多人。新四军各部队的发展壮大，为贯彻东进北上的方针奠定了基础。

但是，战争形势也发生了变化，日伪军采用跟踪“扫荡”的办法来打击新四军。国民党顽固派也以种种理由限制新四军发展。顾祝同曾经强令新四军第1、第2支队在高淳、水阳间15公里的水网地带组织防御，企图要新四军同武器装备占优势的日本鬼子打阵地战。

陈毅同顾祝同交涉。顾祝同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是不准新四军第1、第2支队向金坛地区和溧（水）武（进）公路以南活动，国民党顽固派还派武装特务进入根据地活动。

陈毅同粟裕等人研究以后，决定先分兵“向东作战”，要6团打过京沪铁路，用“江抗二路”的番号到东路去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再组建一个团，称新6团。这个计划也得到新四军军部的批准。

一切准备就绪，部队正要出发，陈毅突然接到军部的命令：6团停止东进。

原来，有人担心东路敌人太强，一个团到东路去难以打开局面。国民党方面也会对新四军越出原定游击范围而提出异议。决策者的决心开始动摇了。

陈毅经过反复考虑，感到敌情的变化和国民党顽固派的态度使新四军必须更加坚定地贯彻“向东作战”的方针，而且必须抓紧时间贯彻。陈毅再次看了看电报，把第6团团长江飞叫到跟前，问：“叶飞同志，东进，行吗？”“当然。我同意东进的主意。”叶飞满怀信心。

陈毅微微一笑，注视着叶飞，说：军事上我可以保证，部队不会被消灭。

第二天拂晓，6团指战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向东进发。部队出发后，陈毅马上电告军部，请对6团东进给予追认。

叶飞率领6团东进时，不到500人。途中与无锡、江阴游击队合编，

沿用当地“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番号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头两仗就歼灭日伪军 150 多人。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支部队突然插到上海西郊的虹桥机场，击毁了 4 架敌机。这一仗，使京沪线上的日本鬼子大为震惊。由于这支部队一面打击日寇，一面放手发动群众，人也多了，枪也多了。不到 3 个月，该团发展到 5000 多人，收缴的大量武器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往茅山根据地，送往新四军军部。

6 团东进的行动很快引起了顾祝同等国民党第三战区方面的注意，他们怀疑陈毅把茅山根据地的主力派出去了，猜测新四军超出了原定的游击范围，就让冷欣去追问陈毅。冷欣是江苏兴化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1926 年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训练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冷欣担任第三战区苏南署主任，自己认为对新四军有所了解，但是，这次他没有抓到任何确凿的证据。冷欣左思右想，提出要陈毅派人到东路去联系。

陈毅一听，很高兴，说：派人东进，可以呀，但必须带电台，不然怎么联系呢？人少了不行，至少得去一个营。

冷欣连连摇头，说：那怎么行呢？冷欣生怕陈毅打着合法的旗号“越界”东进，只得放弃上述要求：

这年冬天，国民党投降、分裂的危险继续发展，顾祝同、冷欣等人不但进一步限制新四军的活动，还不断派遣武装特务袭击新四军的后勤供给，还利用苏北韩得勤的部队阻止新四军向江北发展。

为了巩固新四军第 1、第 2 支队东进北上的辉煌战果，进一步推动苏南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1939 年 11 月 7 日，新四军第 1、第 2 支队领导机关奉命合并，成立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任指挥，粟裕任副指挥。叶飞领导的“江抗”主力与丹阳游击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北渡长江，在扬州、泰州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至此，陈毅、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 1、第 2 支队不但人数增加，在江南站稳了脚跟，还造成了跨跃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向苏北发展的有利态势。

新四军第 4 支队的东进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曲折。

以高敬亭为司令员的第 4 支队是新四军中人数最多、实力最强的一个支队。1938 年春季，新四军江南各支队东进皖中时，连战皆捷，创造了继续东进、进取皖东的极好环境。但是，由于种种原因，高敬亭没有执行党中央关于“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敌后挺进”的指示，一度按兵不动。

中央决定派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到江北，说服高敬亭率部东进，同时把庐江、无为等县城的部分游击队和自卫军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在皖中地区抗击敌人。

但是，项英没有及时贯彻党中央的这个部署。

1938 年 11 月 10 日，毛泽东发电报给项英，查问张云逸到江北之事。电报中说：

白崇禧已允新四军张云逸同志率一个营到长江

以北安徽境内活动，已否派去？

现在安徽中部最便利我军活动，新四军可否派

二个营至三个营交张云逸同志率领过江。

毛泽东不但要求新四军派部队到江北，还要多派部队。白崇禧允许张云逸带一个营到江北，毛泽东认为可以派二至三个营。这就是一种高超的战

略远见。

为了贯彻执行东进方针，张云逸于 1938 年 11 月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无为地区，很快与国民党豫鄂边游击总司令廖磊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庐江、无为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

这时候，部队应该大踏步东进了。然而，高敬亭却有意拖延。

驻扎在大别山的国民党桂系军队察觉到新四军的东进意图以后，自己千方百计向皖东伸展，又以种种手段阻止新四军东进，并企图把第 4 支队挤出皖东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再次要求新四军第 4 支队东进。

1939 年 3 月，高敬亭不得不命令部队东进。但是，当部队进至合肥东北的兴众集中时，高敬亭又借故命令部队停止东进。高敬亭竟然带着手枪团和特务连返回出发阵地西蒋冲。

第 4 支队东进再次受到干扰。

高敬亭为什么这样做？历史留下了一个谜，因为高敬亭在两个多月以后“被错误地处决”。

历史也揭开了谜底。

高敬亭是河南省光山县董店（今属新县）人，1928 年春参加农民运动，翌年 3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县委书记、中国工农红军第 25 军第 75 师政治委员、第 28 军政治委员（无军长）等重要职务。红 25 军开始长征以后，高敬亭奉命留下坚持了极其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使大别山上的红旗一直不倒。正是由于这些功绩，党中央把带领新四军第 4 支队的重任交给高敬亭。

但是，高敬亭缺乏全局观念，不愿离开大别山，不愿到交通发达的水网稻田地区作战，对党中央确定的“东进北上”的方针贯彻不力。高敬亭甚至把 4 支队当作个人资本，认为新四军是‘吃 4 支队的饭’。

按照常理，项英应该督促高敬亭执行“东进北上”的方针，谁知项英在对第 4 支队下达的要求中竟提出：军事上要控制津浦、淮南两铁路；不宜单纯扩大部队，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根据地的口号等等。这显然是不符合“东进北上”的方针大略的。

4 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统一指挥江北的新四军。并由东南局和江南新四军抽调一批干部到江北。中央还明确要求，由新四军委派员主持成立江北指挥部。

那天一大早，叶挺同邓子恢、罗炳辉、赖传珠等人一起离开了新四军军部，前往江北。

那时候，日本侵略军在长江上设置了封锁线，叶挺等人是从新四军第 3 支队的活动地域越过日军封锁线，到达长江北岸的。

一路上，叶挺同大家一起夜行晓宿，有时步行，有时乘船，整整用了 10 天时间，才到达庐江东汤池。张云逸的临时江北指挥所就在东汤池。

在东汤池，叶挺组织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赖传珠任参谋长，邓子恢兼政治部主任，这就为打开皖东抗战的局面奠定了基础。

5 月 9 日，叶挺和张云逸一起前往西蒋冲找高敬亭。叶挺对高敬亭说：东进方针是中央确定的，你必须率领部队东进合肥、定远等地，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

高敬亭沉默不语。

叶挺说：你把第4支队的干部召集起来，我要讲话。叶挺的讲话实际上是对东进方针的宣传，也是一次东进的动员。听了叶挺的讲话以后，大家进一步理解了中央的方针，对执行东进方针进行表决时，指战员们纷纷举起了手。

高敬亭用眼光一扫，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也举起了手。

高敬亭投了“东进”这一票，但心里依然不舒服。第4支队开始东进以后，高敬亭又瞒着叶挺和张云逸等人要第7团和第9团停止东进。第7团和第9团都是大别山的部队改编的，同高敬亭关系密切。

第7团的团长和政委接到高敬亭的指示，觉得是个机会，竟然叛逃离队，投进国民党顽固派的怀抱。

第9团的指战员全局在胸，不听高敬亭那一套，继续东进。

叶挺等人得知高敬亭的行为以后，十分气愤。第7团团团长、政委逃离部队和高敬亭屡次不执行中央指示的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新四军开辟皖东局面。一天，叶挺同张云逸、邓子恢等人在合肥县青龙厂集体召见高敬亭，并按照预定计划把高敬亭扣押起来。

云岭县新四军军部，项英在关心第4支队。延安，毛泽东也在关心第4支队。国民政府方面，蒋介石更为注意江北新四军的动态。

对高敬亭的处置，项英犯了一个不该犯的错误。他没有及时请示党中央，却向蒋介石报告：高敬亭该不该杀。

其实，毛泽东早在一年前就告诉项英，新四军方面的事情不要事事都请示国民政府。毛泽东以薛岳为例告诫项英，说：

薛岳等的不怀好意，值得严重注意。但现时方

针不在与他争若干的时间与若干里的防地，而在服从他的命令开到他指定的地方去，到达那里以后就

有自己的自由了。尔后不要对他事事请示与事事报告，只要报告大体上的行动经过及打捷报给他。

毛泽东要项英“打捷报”给国民党的将领，蒋介石却看到了项英要处置高敬亭的报告。

于是，历史又留下了不该有的那一笔。

国民政府军委会打电报给叶挺：“白崇禧电奉委座电令，所请将高敬亭处以枪刑照准”。

中共中央也发电报给新四军：争取教育改造4支队，对高采取一些过渡办法，利用目前机会皖南军部派遣一些得力干部到4支队工作。

过渡办法是什么？是调离领导岗位？还是赴外地学习？

然而，当时的情况极其复杂。当叶挺看到延安发来的电报时，连声说：晚了！晚了！因为高敬亭已于1939年6月24日在安徽省合肥县青龙厂（今属肥东县）被错误地处决。

历史终究是公正的。36年以后，毛泽东在有关高敬亭的一份材料上批示：“我觉此案处理不当。其责任我怀疑主要是项英。”

1977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对高敬亭予以平反，恢复名誉，认为高敬亭“在坚持鄂豫皖边区的革命斗争中是有功的，将其处死是错误的”。

高敬亭的问题处理完后，叶挺又组织有关人员对部队进行整编，原第4支队编为第4、第5两个支队。

第4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员，下辖第7、第9、第14团。不久，该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根据地。

第5支队由原第4支队的第8团为核心编成，辖第8、第10、第15团，司令员是罗炳辉，政治委员为郭述申。这个支队开辟了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根据地。

津浦路东、西等根据地的创建，不仅为皖中、皖东地区的抗战打下了基础，也有利于新四军第1、第2支队北渡长江。

新四军东进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叶挺回到东汤池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以后，心情一直很沉重。一连几天，叶挺常常夜望星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这天，叶挺刚进屋，忽然听到一声报告，说：军长，彭雪枫司令员派人来，一定要见你。

叶挺的心“突”地一跳，他想，彭雪枫的游击支队离这里远呢，他派人来，一定有要紧事。刚一转身，来人已到跟前。仔细一看，好一名英俊的指挥官。

来人是新四军游击支队第2团政委谭友林，原来是贺龙的部属。谭友林没有见过叶挺，却深知这位北伐名将治军严格，内心非常崇敬叶挺，却又有几分畏惧。当他握住叶挺军长那双热情的手时，一股暖流传遍全身，旅途的疲劳一下子消失了。

“报告军长，彭司令员派我来，请军部解决我们的正规番号 and 经费问题。”说到番号和经费，谭友林显得格外认真。

叶挺的心像被猫爪抓了一把。一支抗日的部队没有正规番号怎么行？上万人的部队没有经费怎么行？彭雪枫的部队恰恰缺少这两项。这是为什么？让我们窥视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窗口。

彭雪枫是河南省镇平县七里庄人，中国工农红军的高级指挥员，曾经担任红军第3军团师政治委员、红军大学政治委员、陕甘支队第2纵队司令员等重要职务。长征途中，彭雪枫在攻克娄山关、遵义城等战斗中功勋赫赫。抗日战争初期，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驻晋办事处处长。1938年春季，彭雪枫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兼任河南省委军事部长。

那年，新四军第8团的留守处在确山县竹沟镇组织了两个新兵连。这两个连由彭雪枫领导。

徐州战役以后，中共豫西特委、豫东特委等组织了当地的民众抗日武装，其中有豫东游击第3支队。

9月初，河南省委根据周恩来、叶剑英的要求，决定由彭雪枫率领新四军游击支队300多人挺进豫东。10月11日新四军游击支队到达西华杜岗时，与豫东游击第3支队一部及先遣大队合编，部队扩大到1000多人。这支部队仍然称为新四军游击支队，由彭雪枫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以后，彭雪枫率领游击支队继续东进，行程千里，一边作战，一边发展壮大部队。淮阳县窦楼一仗，与日本鬼子的骑兵队遭遇，毙敌少尉以下十多人。到1939年初，彭雪枫的游击支队已经发展为3个团、1个游击总队和一个随营学校，共约5000多人的强大部队。

但是，他们一度与新四军军部失去联络。

周恩来离开新四军军部以后，叶挺军长要组织部队东进北上，却不知道新四军游击支队在哪里，叶挺急了，只好发电报到延安，问：“彭雪枫部现在何处，最近情况如何，又将用何种名义？”



叶挺相信彭雪枫的部队一定在打日本鬼子，却不知道他们是何种名义。叶挺着急呀！他向延安提出，彭雪枫“如能与我们发生关系最好”。

彭雪枫也在找叶挺。游击支队在贫困地区活动，由于国民党政府不给正式编制，部队极其艰苦，数千人有时候连红薯粥也喝不上。眼看就是春节了，支队司令部提出，能不能把那十几匹马卖了？

彭雪枫一听，很不高兴，那是仅有的十几匹战马呀，怎么能卖呢？但是，他很快又作出决定：卖，把我那坐骑也一起卖掉，让部队吃几餐饱饭。

于是，豫皖边界传开了“穷兵卖马”的谚语。

游击支队的马只能卖一次，以后怎么办？为了部队的生存和发展，6月1日，彭雪枫给党中央发电报，其中提出：

我支队合法名义及每月经费至今尚未解决。前接云逸同志电说，叶军长此次渡江向蒋要求江北部队合法名义问题，要我们报告人员武器数目，也已照发。但数日来迄无电复，是否有望，尚无可知。总之经费不能解决，这是我们经常焦虑的一个大问题。

延安，毛泽东和党中央也十分关心彭雪枫领导的这支部队。6月14日，中央军委复电新四军军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和彭雪枫的游击支队。电报中讲到：本军江北已成立指挥部，彭雪枫以四军名义在蒙城、宿县一带行动，应与指挥部联系，以便直接指挥和了解该部情形。同时雪枫所在地区行政系统、统战关系等均与中原关系密切，交通亦较便利，故

中央决定：一、雪枫部仍划归叶张指挥；二、雪枫部活动地区仍划归中原局管辖。

这份电报没有说明解决游击支队经费的办法，半年以后，毛泽东在另一份电报中说：“经费绝无他项出路，全党均须自力更生。”

彭雪枫考虑再三，才派谭友林来找叶挺。

听了谭友林的汇报，叶挺心里翻江倒海。他想，彭雪枫这支队伍没有军饷，没有被服，弹药接济又十分困难，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一边作战，一边建军，能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真是不容易呀！叶挺对谭友林说：津浦、陇海这两条铁路的交叉地带历来为兵家所必争，你们能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是大有作为的。

谭友林两眼注视着叶挺，他想起了昨天晚上同叶挺一起去捉青蛙，想起了叶挺对青蛙和田鸡这一名称的议论……。然而时时让他不能停止思考的是游击支队的军饷和番号问题。

他正想问，叶挺却先说了。

“指挥部已经为你们筹集了几万发子弹和几挺机枪，这些东西要运到游击支队去就必须通过日本鬼子的封锁线。这样吧，你转告彭雪枫，让他派一支部队来，把这批武器运回去。”

“部队番号怎么办？”谭友林问。

叶挺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他说：“新四军经过这次江北整编，已经有5个支队。我想，游击支队可以正式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但是，这件事要请示延安，也要得到重庆方面的批准。我会尽快想办法的。”

8月3日，谭友林带着江北指挥部发给的5000元现金和一批药品，同警卫班一起返回皖西北。叶挺也在这一天离开东汤池，返回江南，他要同国民党方面交涉，争取得到第6支队的番号。

9月6日，彭雪枫领导的游击支队主力回到涡阳新兴集，进行整训。在

短短一个月内，先后成立了6个独立大队，部队人员增加了几十倍，成为游击支队发展的全盛时期。

正当这支部队大力发展时，国民党第一战区派出骑兵第2军和骑兵第8师向西华、沈丘推进。骑兵第2军是何国柱指挥的部队，原来属于东北军；骑兵第8师马彪部，原来驻在青海。国民党派出这两支部队到西华，不怀好意。新四军游击支队在东进过程中又面临新的战斗。

11月，游击支队正式编为新四军第6支队，彭雪枫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支队伍当时已发展到9个团12000多人，打开了豫皖苏边的抗战局面。

新四军主力东进时，军部仍留在皖南云岭。

顾祝同觉察到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意图以后，心生一计，他命令新四军派一个支队去接替青弋江国民党军队的防务。

项英派第3支队的两支团去青弋江。谁知新四军接防以后，敌人从湾沚集中兵力向新四军阵地发起进攻。这一仗整整打了三天三夜，新四军将士凭借勇敢机智，终于取得了胜利。

顾祝同耍了一个心眼。

1938年6月，毛泽东曾经告诉项英：“顾祝同较开明，望与好好联络。”当时，毛泽东的判断是对的，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顾祝同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日军和伪军觉察到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战略意图以后，调集兵力，对皖南地区进行频繁“扫荡”。当时，新四军军部只有第3支队和第1支队第1团、第2支队第3团等部队，形势十分严峻。

1939年5月，1000多日伪军向繁昌出动，被新四军指战员击退。半年以后，3000多日伪军又两次进攻繁昌，但是，敌人又没有得手，新四军取得了繁昌保卫战的胜利。

到年底，新四军第3支队等部队连续作战200多次，成功地保卫了新四军军部和皖南抗日根据地。

### 3

1938年11月，李先念受中共中央委派，带领数十名干部前往豫鄂边领导和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中央还委派李先念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事部部长。抗日战场上，从此又开创出了一块信阳四望山根据地。

临行前，毛泽东对李先念说：你们到豫鄂边的任务，第一是武装，第二是武装，第三是武装。

1939年1月，李先念一行到达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那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山区，也是发展壮大新四军的好地方。笔者曾经专程到竹沟，参观访问了新四军将士当年战斗过的地方，参观了刘少奇工作的地方。刘少奇也是1939年1月到达竹沟的。尤其令作者难忘的是参观竹沟附近的革命烈士纪念碑，那里有“确山惨案”中新四军指战员洒下的鲜血。

当时，竹沟驻有新四军第8团留守处两个中队。李先念一行到达竹沟

后，同留守处的那个中队一起组成了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共 160 多人。

不久，李先念率领游击大队离开竹沟，向敌后挺进。他们以豫鄂边的四望山为立足点，在信阳、罗山地区往返活动，连打胜仗。

第一个胜仗是在 2 月份。当独立游击大队到达应山罗家庙时，一百多日伪军正向该地进犯，当地守军有国民党军队的一个营。照理，对付这些日伪军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国民党军队不战而退，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却迎敌而上，奋勇抗击。这一仗，击毙了 20 多日伪军。初战告捷，当地人民深受鼓舞，部队也得到迅速发展。

第二个胜仗是在 5 月份。李先念率领独立游击大队向鄂中挺进，很快与当地的抗日武装一起歼灭了伪军第八司令部和—个多营的敌人，俘虏伪旅长以下 300 多人，缴获枪枝 500 多支。这一仗，也打出了威风，提高了新四军的声望。

当新四军这面旗帜在鄂中的威望日益提高时，蒋介石深感不安。蒋介石让人打电报给新四军军部的国民党第 5 战区，说：“鄂中非新四军防区，必须马上撤走，否则第 5 战区当以武力解决。”

“当以武力解决”，这是蒋介石对新四军的预谋。时间仅仅过了一年多，亲者痛仇者快的“皖南事变”就发生了，蒋介石对新四军使用了国民党第 3 战区的武力。

实际上，国民党顽固派在“皖南事变”以前已经对新四军使用武力了。1939 年 1 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以后，政策发生了变化，逐渐导致了全国性的反共活动，制造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血案，许多八路军、新四军指战员、机关干部遭到突然屠杀。请看：

1939 年 4 月 30 日，发生博山血案。

1939 年 6 月 11 日，发生深县血案。

1939 年 6 月 12 日，发生平江血案。

1939 年 9 月 1 日，发生鄂东血案。

1939 年 11 月 11 日，发生确山血案。

这触目惊心的“五大血案”中，发生在确山县的竟然是对新四军伤、病、残人员、家属和职工的大屠杀。

新四军竹沟留守处主要是留守人员和一些伤、病、残人员，他们理应受到保护和休养。

谁知，11 月 11 日那天，国民党第 31 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指使确山县县长，纠集确山、信阳、泌阳等县的 2000 多名国民党地方武装，突然围攻新四军竹沟留守处，将 200 多名新四军伤、残、病人员和家属职工残酷屠杀。这是一场惨无人道的屠杀。

确山惨案发生后，新四军军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历史已经跨越了 50 多年，竹沟的烈士陵园仍然在向人们诉说国民党顽固派的暴行。

笔者到竹沟访问时，一位老战士向我们介绍了刘少奇在竹沟工作的许多精彩情节。由于参观访问的人多，这位老同志整天不停地讲呀讲呀，他的嗓音已经沙哑，但他讲述刘少奇的经历却是那么动人，令人难忘。

竹沟惨案发生前数十天，刘少奇就在竹沟。当时，刘少奇已经觉察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预谋，为了以防万一，刘少奇要朱理治率领中原局机关和直属队 600 多人离开确山，转入豫鄂边区。刘少奇的这一决策，减少了新

四军的损失。

这是刘少奇第二次到竹沟。

1939年初，刘少奇也到过竹沟。

1938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决定撤销武汉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为中原局书记。中原局当时在竹沟办公。1939年1月，刘少奇从延安到达竹沟。为了应付各种事变，确立中国共产党和新四军在鄂中的地位，中原局要求鄂中区在最短时期内创建一支5000人以上的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队伍。

6月，鄂中区党委在养马畈召开扩大会议，成立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为司令员，陈少敏兼政治委员，下辖第1、第2、第3团和挺进团。以后又组建了第4、第5两个团，为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9月，中原局进一步要求：鄂东、豫南、鄂中敌占区域是今天党开展华中游击战争最重要地区之一，创立坚强的游击队伍，建立鄂东、豫南、鄂中抗日根据地，并使之逐渐打成一片，这是今天鄂豫皖、鄂豫边区以及鄂中三个区党委最主要的任务。

11月底，刘少奇到达合肥东北大桥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

1939年12月至1940年2月，刘少奇连续3次召开中原局会议，深入研究了华中新四军的发展问题，再次提出了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发展战略，认为这样做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其中：

1939年12月召开的第1次中原局会议，确定了今后大力向东发展的任务。

1940年1月召开的第2次中原局会议，决定了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和任务。

1940年2月召开的第3次中原局会议，确定了反磨擦的方针。

这三次会议前后，为贯彻新四军东进北上的方针，刘少奇同项英和中共中央之间有一系列电报来往。其中：

1939年12月19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并东南局书记兼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该电提出：皖东在武汉失守前后完全有可能建立相当完善的根据地，但现在时机已失。目前，大有发展希望的地区是江苏北部，新四军应集中最大力量发展苏北。

这也是进一步肯定了“北上”的方针。

1940年1月11日。

中共中央复电刘少奇，同意关于全力发展苏北的意见。

1月13日。

刘少奇致电中共中央和项英，指出：目前时局紧张，在半年内外将发生变化，我须迅速发展自己，不然时机稍纵即逝。

刘少奇的这份电报，是把新四军进军苏北的建议具体化。

这也是完全符合中央精神的。

但是，项英有不同意见。

1月14日。

项英致电中央军委，提出：华中南部各省在政治与群众基础上均有利于我，要发展北部，必须有南部配合。因此，中原局和刘少奇要求皖南部队

北渡，这不仅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新四军应按战略要求努力发展与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项英认为，新四军北上危险的。这也是他在“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皖南部队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的一个原因。

1月19日。

中共中央致电项英，明确指出：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中共中央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取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目前最好发展的地区，而大江以南则受友军的限制。大江南北的新四军应在现地力求发展。

中央的这份电报，是为了说服项英接受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

1月29日。

毛泽东和王稼祥致电项英和叶挺：“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须秘密准备多数渡口，为紧急时用。”

毛泽东和王稼祥的这份电报，明确告诉项英和叶挺，皖南部队须力争江北。

3月，当项英还没有完全贯彻中央的方针时，刘少奇预料的时局“变化”提前发生了。

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军队李品仙部第138、第171师越过淮南铁路，向皖东进逼，先头部队5000多人围攻位于合肥以北青龙厂的新四军第4支队和位于定远以南大桥地区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两个保安团也向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进攻。

与此同时，苏北地区的国民党韩德勤部队也前后呼应，准备向津浦铁路东的新四军第5支队进攻。

国民党军队南北夹击，严重威胁新四军皖南部队的生存和发展。

延安。毛泽东对新四军十分关切，在短短20多天里，连续发出了7份电报，对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作了明确指示，对新四军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3月19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和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起草了给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电报，要袁国平汇报“在政治工作之各方面如何保证中央路线之实行”的具体措施。毛泽东还具体指出，新四军要在敌人后方坚决地广泛地建立独立自主的抗日民主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设立经济机关，发展农工商业，设立各种学校，大批培养干部，执行扩军计划，使1、2、3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0万左右人枪，使4、5、6及李先念支队在一年之内扩大至15万左右人枪，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等。毛泽东还要求袁国平把新四军的政治工作“逐一见告”。

3月21日。

毛泽东考虑到要援助新四军，代表中央军委起草了给朱德、彭德怀等人的电报。该电报指出：安徽主席李品仙奉某方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完全消灭，切断新四军、八路军的联系。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

3月29日。

毛泽东和王稼祥又发出电报，对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策略作出了明确指示，指出：华中武装磨擦，我军应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

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先肃清地方顽固派，对桂系的军队力求缓和，对韩德勤的部队在有利有理的条件下，当其进攻我军时，应坚决消灭之。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南局一面命令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随时做好应付顽固派进攻的准备，一面派人同李品仙的部队进行谈判。新四军方面提议，以淮南铁路为界，分区抗日，我不向西，彼不向东。

4月1日。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起草的电报中提出：某方现在鄂中皖东淮北三区大举进攻新四军，我新四军应坚决而有计划地进行自卫战争，其皖东淮北两地，务须独立坚持三个月，以待援军到达，然后大举反攻。

但是，毛泽东还在考虑新四军能否“独立坚持三个月”，项英能否应付国民党的袭击？两天以后，毛泽东要项英明确回答这些问题。

4月3日。

毛泽东致电项英，要项英电告下列各项：

（一）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

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

（二）党内干部是否已有应付某方可能袭击的精神上充分准备？

（三）皖南、江南地区各友军中是否有坚持抗日同情我党的高级中级进步军官与进步部队，在突然事变时是否有掩护我军或与我军一致行动的可能，我在附近友军中统一战线工作如何？

（四）某方在第三战区的意向如何，顾祝同等中央军态度如何，黄绍竑态度如何？毛泽东向项英提出的一连串问号，表明他对当时的形势已经看得十分清楚。

4月14日。

项英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将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

这样做，实际上是要执行顾祝同的命令。

4月16日。

中央军委复电项英，明确指出：江北部队不应南调，应配合八路军向苏北发展。

四天以后，中共中央又致电项英，明确指出：蒋介石和顾祝同的阴谋是要把新四军全部集中到苏南敌后的狭小地区，从而隔断新四军与八路军的联系，再在适当的时机消灭新四军。

可见，中共中央早已觉察到蒋介石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的阴谋。

中共中央还强调，皖北、皖东、淮南、苏北是新四军、八路军在全国最重要的战略地区之一，也是同蒋介石的阴谋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地区。因此，绝对不能答允新四军第4、第5支队和叶飞领导的挺进纵队第6团、张道庸领导的苏皖支队第4团等部队南调。叶飞、张道庸的两个团和苏北的部队应按照中央的电令调动。

这就明确告诉项英，不能盲目听从蒋介石、顾祝同那一套。

5月4日。

毛泽东为了使项英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指示：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极大

的错误。

华北、华中、华南，江北、江南；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有特殊性，但是都有同一性，即都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都能够发展，都应使其发展。

对国民党顽固派必须实行针锋相对的政策，要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只有坚持对顽固派的斗争，才能振奋精神，扩大力量，巩固党和军队。

毛泽东提出的发展，就是要不受国民党的限制，独立自主地放手扩大军队，建立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

毛泽东还要求把这一指示传达到党和军队的全体干部。

5月5日。

毛泽东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打电报给项英和陈毅，明确指出新四军的主要发展方向是苏南苏北广大地区。其中讲到：

同意军部、后方机关及皖南主力移至苏南，惟请注意皖南力量不要太弱，并须设置轻便指挥机关。

新四军 1、2、3 支队主力的主要发展方向，也不是溧阳、溧水、郎溪、广德等靠近中央军之地区，而是在苏南、苏北广大敌人后方直至海边之数十个县，尤其是长江以北地区。请按这个方针部署兵力，分配指挥人员及指挥机关。在郎、广、两溧上应配置一部分兵力及一部分人员机关，并须在适当时机取得该地政权。

速令叶飞在北岸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不要顾虑顾祝同韩德勤李明扬之反对。

陈毅接到以上两份电报以后，坚决执行了中央部署的战略任务，取得了著名的黄桥战役的胜利。

与此同时，刘少奇也对新四军的发展作了多次重要指示。其中讲到：苏北党的总任务是以现有苏北的新四军部队为基干，抵抗敌寇、汉奸及顽固反动势力对于我党我军的围攻，彻底战胜顽固反动势力，建立民主的抗日政权与根据地，以便最有效地长期坚持苏北敌后抗战，直至最后胜利。

在 3 个月内（在今年 9 月 1 日以前）要扩大新四军至 1 万人枪，并加以巩固。在目前顽固派尚未武装围攻我军时，应到处动员民众加入我军，并在可能地区组织新四军的游击队。……在武装冲突发生后，则应更加放手地扩大我军，武装人民，最广泛地动员民众同我军一起坚决战胜顽固派与反共派的进攻，直至民主政权的建立。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军第 4、第 5 支队在大桥镇东南的古城集又一次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加强了皖东根据地的建设。

8 月，新四军第 5 支队与八路军第 5 纵队共同开辟了淮（阴）宝（应）区，这就使皖东与淮海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9 月 5 日至 17 日，我军作战 60 多次，歼灭日伪军 600 多人，进一步巩固了皖东根据地。

叶挺处理完高敬亭事件不久，就离开了新四军军部，两度到重庆，历时 10 个多月。新四军东进北上和同顽固派斗争期间，叶挺军长也经历了种种甜酸苦辣——

1939 年 8 月 15 日，叶挺和项英联名拍电报给位于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该电称：

希夷已返部。叶拟赴重庆解决江北部队编制问

题及全军经费问题，但不知重庆关系如何，是否可去，请即电示。

8月21日，叶挺又单独给周恩来拍电报。该电称：

恩来同志：

我已由江北南返，本军经济困难情形极端严重，拟即来渝向委座报告并力求解决，你意如何，请即答复。

不久，叶挺没有得到答复就离开了皖南。

其实，周恩来早在7月份就离开重庆回延安。在延安时，周恩来骑马跌伤，住进了医院，准备去莫斯科医治。叶挺就不能及时收到回电了。

一路上，叶挺思绪万千。数月前，他离开新四军军部，也离开了项英，他觉得自己干得很顺心，江北部队的东进问题也解决了，尽管经费困难，彭雪枫的部队没有正式番号，但他相信通过他的努力这些问题可以解决。项英对他处理高敬亭的问题也很满意，项英还给军委打电报说：“此次解决高敬亭叶最坚决起作用很大而努力，在政治上对党均有极大进步。”

到南昌以后，叶挺改乘火车，有时还特意看望沿途的朋友。9月底，叶挺到达广西桂林。

10月初，叶挺乘飞机到达重庆。当时，周恩来不在重庆，叶挺就向董必武和叶剑英谈了他要找蒋介石解决的新四军的经费问题和编制问题。

10月3日，中共中央南方局给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报，其中汇报了叶挺到重庆后的情况。其中讲到：

叶已到渝，昨日晤谈。据说对新四军问题他将向蒋提出：

- 一、 经费至少须增至30万元一月；
- 二、 江北各部队均须以合法名义；
- 三、 如经费不加，则新四军将在其驻防区内设县长，就地筹给养。

在重庆，叶挺住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大梁子青年会招待所。叶挺向董必武、叶剑英谈了自己的想法以后，又通过设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军委会要求见蒋介石。有空时，叶挺也同李济深、陈铭枢等一些老四军的熟人聚谈。

谈到战场情况，叶挺有时很气愤。他说：新四军在前方打日本鬼子，国民党军队却在后方围攻新四军，诬蔑新四军“破坏军令”，这算什么事？叶挺还说，我今天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情况这么复杂，我实在干不下去了。

旁人听了，说：现在，国家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你的处境不管多么困难，都要忍辱负重，奋斗到底呀！

听到这些劝慰的话，叶挺不再作声了。他想起了当年在北伐战场上冲锋陷阵，他多么希望也在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场上冲锋陷阵……

不久，叶挺接到通知，蒋介石要见他。

蒋介石已经知道一些新四军的情况，也听到了“叶项不和”之类的话。因此，他见到叶挺时，显得格外亲热。

叶挺向蒋介石报告了新四军召开参谋会议和整顿第4支队的情况。蒋介石不时地“嗯嗯”几声。当叶挺提出要把新四军的每月经费至少增加到30万元，要给江北新四军第5、第6支队下达正式编制时，蒋介石显得不耐烦了。

让我考虑考虑，蒋介石说。但蒋介石马上又说：你叶挺没有在新四军



起到领导作用，光知道要钱、要枪、要扩大编制。你是一军之长，有负我的希望。

蒋介石想来想去，还是要拉拢叶挺。他问叶挺：“你在新四军自由不自由？”

“我是军长，怎么会不自由？”

蒋介石又问：“你想不想参加国民党？”

叶挺马上说：“我只想参加抗日救国。”

谈话中，叶挺明显感到了蒋介石那种挑拨和拉拢的用意，他感到气愤，新四军在前方杀敌，蒋介石连合法的名义和最基本的经费都不解决，他无法当好这个军长，他想请求辞职。

蒋介石对此并不感到意外，他对叶挺说：“你离开也好，或许有比四军更有意义的事要你去。”

片刻，蒋介石又问叶挺：“如果你离开四军，谁可以代替？”

“最好是叶剑英。”叶挺说。

蒋介石“嗯”了一声，脸上露出一丝不快的表情。蒋介石显然不能接受叶挺的建议。

事后，叶挺把同蒋介石谈话的情况详细向董必武、叶剑英作了汇报。不久，叶挺找个理由请假回到澳门家中。

叶挺离开新四军军部以后，项英渐渐不安起来。项英担心为此受到党中央的批评，就问沈其震：“叶挺是你送走的？”

沈其震说：“叶军长离开皖南时，我到绩溪为他送行。”

项英一听，心里更恼火，说：“既然是你把他送走的，现在就要你去找他，把他请回来。”

项英还给叶挺打电报，希望叶挺以新四军数万部队的生存发展为重，就新四军的经费和编制问题再到重庆去交涉。沈其震离开皖南时，项英还写了一封信要他带给叶挺。

沈其震一路寻访，来到澳门，由廖承志陪同去找叶挺。叶挺看了项英给他的信，对廖承志说：我可以再到重庆去交涉，但有无结果，我没有把握。

不几天，叶挺同沈其震一起来到香港找宋庆龄。那时候，宋庆龄主持保卫中国同盟，许多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的药品，医疗器械、被服、食品等物资都集中在宋庆龄这里，然后再由宋庆龄设法送往内地。见到叶挺和沈其震，宋庆龄很高兴，她把叶挺和沈其震带到仓库里，说：新四军需要什么，你们就挑选什么，尽量多带走一些。

保卫中国同盟还赠送给新四军一些港币和国币，这些物资和款项后来都转送到皖南的新四军部队。

1940年春节过后，叶挺再次到重庆同国民党方面交涉。这一次，叶挺主要是找国民党军委会的一些熟人疏通关系。蒋介石没有见叶挺，但是国民党方面认可了江北新四军部队的番号，新四军的军费也比原来增加了4万元。

叶挺的要求尽管没有完全满足，但总算有了收获。

3月25日，出国治伤的周恩来回到延安。不久，中共中央听取了周恩来的汇报，周恩来和大家一起讨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后，又踏上了前往重庆的征程，继续主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工作。

5月31日，周恩来到达重庆。当周恩来看到中央书记处发来的一份电

报时，不顾 20 多天旅途的疲劳，立即去找叶挺。

这份电报讲到：

蒋在西安向我们同志表示，叶挺已离开新四军，因此新四军问题须重新解决，有另派他人去新四军

任军长之意。

周立即约叶挺到重庆谈话，彻底解决其在新四军工作问题，并要叶挺向蒋表示愿回新四军工作。

对新四军之其它解决办法如另任军长等，我们

表示坚决反对，并对 4 支队 8 团不准用新四军名义事，表示抗议，要求蒋下令纠正。

周在与叶谈话中，应确定叶在新四军之实际地位与实际职权，以坚定其在新四军之安心工作。

周恩来一到重庆，董必武和叶剑英主动向周恩来报告了叶挺的有关情况。那天，周恩来同叶剑英一起来到青年会招待所找叶挺。

大家一见面，周恩来一眼就看出叶挺鬓角上的白发又多了。叶挺也注视着周恩来那只因伤致残的右臂。

周恩来把中央的电报给叶挺看后，耐心地劝叶挺，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以后，又在酝酿新的阴谋，新四军面临着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叶挺不能去职，不能给蒋介石以可乘之机。个人的处境再困难，也要坚持抗战到底。

叶剑英也在一旁劝说。

叶挺深受感动，他说：我本来不想改变去职的想法，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要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回到皖南去。个人的委屈再多，也要同新四军共命运。

“应该向蒋介石表示愿意回新四军工作，坚决反对蒋介石另派新四军军长。”周恩来又说。

叶挺微微点头。

周恩来给项英打电报，要项英派一名高级干部到重庆来接叶挺。项英接到电报后，马上派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赶往重庆。

在重庆，周恩来先后三次找袁国平谈话。

第一次是周恩来个别找袁国平谈话。周恩来指出，项英没有积极执行中央关于新四军应向北发展的方针，没有执行中央关于对顽固派应进行“有理有利有节”斗争的方针，在同国民党的谈判中没有坚持党的立场，这些都是错误的。周恩来还说：新四军发展的主要中心是江北，第二是苏东，第三是苏南、皖南。新四军必须建立苏北、皖北根据地，其次是湖北根据地。在年内新四军要扩军 20 万人。

周恩来第二次找袁国平谈话时，博古、叶剑英、饶漱石和叶挺都参加了。叶挺还表示了三个同意：即同意中共中央提出的发展方向，同意用各种游击队的名义发展武装，同意在敌后建立民主政权并大批募款。

当时还决定：新四军军部争取移往苏南；今后有关新四军问题的谈判，一律在重庆由周恩来负责，不再由袁国平在上饶同顾祝同进行谈判。

第三次谈话时，饶漱石也参加了。周恩来在同他们的谈话中，确定东南局仍以项英为书记，饶漱石、曾山为副书记。

周恩来还要求袁国平回新四军以后要支持叶挺做好工作，帮助项英改

正错误。

7月9日，叶挺离开重庆回新四军。临走前，周恩来同叶挺一起字斟句酌，写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这封信写得很巧妙，既回避了辞职的字眼，又承当了“迄未完成”“旨意”的“责任”，从而使蒋介石无法阻止叶挺回新四军工作。这也是周恩来高超的斗争艺术的体现。现把这封信辑录如下：

委座钧鉴：

年来挺以愚拙无能，诸凡钧座所付托之旨意，迄未完成。按其责任，挺实无可辞卸。乃蒙委座曲谅，感戴靡涯。倘能追随钧座，仍许为国效力，则挺唯有摩顶捐躯，以报万一。临禀待命，肃叩钧安叶挺

#### 4

公元1940年。

新四军东进北上，在黄桥漂漂亮亮地打了一仗。

史载，陈毅指挥“黄桥战役”，为巩固和扩大苏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苏北，地处上海、南京、蚌埠、徐州侧背，盛产粮、棉、盐等战略物质，也是日本侵略军华中和华北两个战略集团的接合部。在苏北坚持敌后游击战，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黄桥，位于泰县、泰兴、靖江、如皋等县的中心。以黄桥为中枢建立根据地，东可向南通、海门敌占区挺进，北可以与八路军接应。黄桥周围数县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对新四军坚持敌后游击战十分有利。

为了贯彻“向东发展”的方针，陈毅、粟裕决心东进黄桥。

敌人的力量显然比新四军强大。

当时，盘踞在苏北大部分地区的是国民党江苏省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省保安司令韩德勤指挥的部队。韩德勤是江苏泗阳人，早年曾在江苏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北伐战争时，他任第3师上校参谋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曾率部参加对红一方面军第三次“围剿”，后来又担任军委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办公厅厅长、西安行营办公厅厅长等职务。淞沪会战爆发时，他担任第三战区参谋长。1938年1月，韩德勤任第24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韩德勤勾结日寇，不断制造反共磨擦，残杀抗日军民。

日本侵略军由于兵力不足，也想利用韩德勤的力量来镇压苏北人民的抗日活动。因此，如何对付韩德勤的部队成为新四军贯彻东进北上方针的一个重要问题。

陈毅看到，韩德勤虽然有15万多军队，但派系繁多，各部队之间矛盾很深，难以统一行动。这些军队主要有三部分组成。

一部分是第89军，该军辖第33师、第117师、独立第6旅、江苏省常备第1至第10保安旅。这一部分军队是韩德勤的“嫡系”。

第二部分是苏鲁皖边游击军，下辖第1至第11纵队，共约3万人，部署在泰州及其附近地区。李明杨为游击军总指挥，李长江为副总指挥。他们属于地方实力派。

第三部分是由国民党财政部税警总团改编的游击第 8 军，由陈太运指挥，名义上隶属于李明扬和李长江，实际是宋子文系统的力量。

韩德勤凭借自己的军队优势，时时都想兼并“二李一陈”。“二李一陈”虽然隶属韩德勤指挥，但对韩德勤的排挤非常不满，他们暗中联合，反对韩德勤。因此，这些军队之间各怀叵测，明争暗斗。

陈毅和粟裕决定利用这些部队之间的矛盾，打开苏北抗战的有利局面。

1940 年 5 月 8 日，陈毅向中央报告：“解决苏北问题，应先向省韩下手。”在陈毅看来，惨杀抗日游击队、制造大小血案的韩德勤已成为苏北抗战的主要障碍。要建立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苏北抗战，必须从韩德勤手中夺取苏北抗战的领导权。毛泽东也明确提出：“陈毅部队，应当加紧向苏北发展”。

陈毅的设想是：第一步：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应率领主力迅速转移到苏南；第二步：从苏南渡江北上。

5 月 17、19 和 27 日，陈毅三次报中央和项英，促请新四军军部及皖南主力迅速向苏南转移。

5 月 26 日，党中央致电项英、陈毅，不仅同意陈毅的建议，还明确指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

然而，国民党顽固派不顾抗日战争的大局，调动军队千方百计地要把陈毅指挥的部队阻止在江南，形势很严重。当时，陈毅所部 8 个团已有 4 个团在苏北，江南只有 4 个主力团，即第 4 团（其中第 1 营已随陶勇北渡）、第 2 团、第 3 团、新 6 团。这些部队中除第 4 团留在苏南协同地方武装坚持斗争外，其余全部开赴苏北。同国民党顽固派压迫新四军的军队相比，江南新四军兵力薄弱。为此，陈毅曾请求从苏北调两个团到江南，以应付顽军的进攻。

中央书记处告诉陈毅：4 个团的“主力仍应留在苏北发展但可酌抽一部加强苏南。”

然而，由于形势变化，“酌抽一部”也未能实现。苏北叶飞率领的挺进纵队前有日军、后有韩德勤的顽军，南下增援的八路军一时也上不来，处境也很险恶。苏北的兵力也很单薄。

刘少奇曾致电中央：“叶飞部队甚为孤立，有被韩军消灭之危险”。

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只能把加强苏南兵力的希望寄托在新四军军部的东移上。

但是，项英迟迟不动。新四军军部不见东移，而国民党冷欣的部队正在向陈毅的部队步步逼近。

6 月 4 日，陈毅致电中央，请中央敦促项英率领新四军军部东移。

6 月 10 日，陈毅再次向中央报告：冷欣部队对我江南指挥部形成大包围，苏南我力量不足不能突破，决心东移，到京沪线大举肃清敌伪势力，然后决定今后动向。

项英却认为，他面临的形势比陈毅更严重。6 月 12 日，项英打电报给党中央和陈毅，说国民党正在增调军队，如果军部向东转移，很可能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转移路线正好在两条河之间，不利于作战，军部只能“待机”移动。

陈毅明白了，依靠新四军军部东移来加强苏南力量的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他毅然决定率部东移。

6月15日，陈毅向中央和项英、刘少奇发电报。其中说：

目前只有集中苏北攻击韩或者集中苏南打冷欣两个途径。一切应付已到穷尽之时，再不决定必致苏北苏南两方受损。

在你们未指示前我决心布置移往苏北。到苏北后，皖南军部方面宜速部署。

这份电报发出以后，陈毅一面命令部队准备渡江，一面欺骗敌人，使国民党顽固派放松警惕。

为此，陈毅让粟裕率领战地服务团的演出队到冷欣的第二游击区副总指挥部进行慰问演出。为了麻痹国民党顽固派，陈毅特地让新婚妻子张茜也一起参加慰问演出。演出前，陈毅又让作战科长吴肃到冷欣的副总指挥部进行联络。

演出队演出时，陈毅却组织部队进行北移。

起初，冷欣得知陈毅派张茜等人一起来演出，以为陈毅的部队不会向江北转移，他也放心了。蒋介石曾经亲自布置，要冷欣把陈毅的主力“陷死”在江南。

当冷欣突然发现陈毅的主力部队要渡江北上时，非常惊惶，连夜调了一个团赶去堵截，加上原来驻扎在茅山腹地的一个团，共用两个团的兵力来拦阻陈毅。

陈毅得知敌人出动，命令新6团配合新4团坚决还击，肃清北上途中的障碍。

新6团得知冷欣又派出了钟钟山这个团来拦阻新四军，指战员们恨得咬牙切齿。原来，新6团在上旬的一次抗日游击活动中，冷欣派出钟钟山这个团秘密跟随，故意引诱日本鬼子来围攻新四军，使新六团遭受严重损失，团长段焕竞也身受重伤。这一次，钟钟山还想演这种把戏。双方一交火，他们又故意往日本鬼子的据点方向撤退。

新四军指战员早已看透了敌人的鬼把戏，战斗中紧追不舍，不让他们有溜走的机会。

钟钟山被逼得无奈，在慌忙逃退中引起了日军的“误会”，部队伤亡了一大批。

冷欣派出的两个团有的被新四军歼灭，有的遭到日军打击，残部不得不退出茅山腹地，再也不敢接近茅山根据地。

陈毅率领部队进抵茅山北麓后，挥戈一转，往东进入了水网地区，避开了敌人的截击。

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准备渡江北上时，江北的形势意外地发生了变化。盘踞在苏北泰州地区的国民党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在韩德勤的挑拨、拉拢与威胁下，由中立转向军事反共，集中了13个团的兵力于6月28日凌晨向郭村的新四军发起攻击。战斗发起后，李明扬退避幕后，由副总指挥李长江在前线指挥。

陈毅是在6月28日夜晚得知这一消息的。

当时，陈毅刚由扬中渡过长江，准备连夜赶往郭村。陈毅原以为“二李”的态度尽管有变化，但对“二李”还是可以争取的，原定的“灭敌、联李、反韩”的方针是适用的。但是，当陈毅从苏北来迎接的人员中得知“二李”的十多个团已经包围并猛攻郭村时，马上决定改变策略。

郭村原来有新四军的两个团和1个教导队。6月下旬，李长江要对李玉

生的支队用武力解决时，新四军从郭村派出一个团去援救和接应陈玉生支队，因为这个支队原来是由共产党员组织起来的。这样，郭村只剩下新四军挺进纵队主力一团及教导队。面对十多倍于己的敌人的猛攻，形势十分危急。尽管陈毅已经急电命令新四军苏皖支队日夜兼程，赶往郭村，但是，韩德勤也会派主力围攻郭村。

假如郭村失守，新四军北上就会处于被动，部队也要受到损失。

陈毅了解到这些敌情后，退守长江中的新老洲，立即写了两封信派人送出。陈毅当时没有带电台，只好派人送信。

一封信给粟裕，要求粟裕“速派主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渡江支援”。

另一封信给李明扬和李长江，劝他们悬崖勒马，停火言和。

信发出后，陈毅还在思考。当时，北上的苏南新四军主力已经到达铁路、长江一带地区，那里是日本鬼子的重兵封锁区，国民党第三战区冷欣的部队又在紧紧追赶新四军江南主力。如果郭村的阵地守不住，长江北岸被韩德勤和“二李”控制，新四军江南主力不但无法渡江，甚至会在长江和沪宁路之间遭受日本鬼子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两面夹击。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不但东进北上的战略方针要受到影响，江南新四军主力也会遭到难以弥补的损失。

陈毅认为，李明扬和李长江的部队和新四军兵刃相见，不管胜败如何，都有可能使“二李”完全投入韩德勤的阵营，而韩德勤做梦都想实现苏北反共大联合。如果那样，就会增加新四军向苏北发展的困难。

6月下旬，陈毅曾三次急电叶飞，要叶飞避免与“二李”作战，必要时可退守到大桥地区或扬中。但叶飞坚持要在郭村迎敌。挺进纵队的其它负责人也认为，郭村有新四军1个精锐主力团和1个教导队，凭借有利地形有把握抗击“二李”的部队，等待支援。

战斗发起后，驻守郭村的新四军打得十分勇猛顽强。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也呼吁“二李”停止进攻，同时命令苏皖支队及江南主力3个团迅即向郭村增援。

郭村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发生了三个情况。一是“两李”内部的女共产党员郑少仪冒着生命危险把敌人的进攻部署送给新四军。二是“二李”下辖的5支队4大队突然掉转枪口，同新四军一起作战。这个大队是由王澄、姚力等共产党员领导的。三是陈玉生支队也回师逼近“二李”部队的侧后。

在新四军指战员的打击下，“二李”的部队三次总攻失败，全线退却。保3旅在苏皖支队的反击下，被迫北逃十多里。

郭村解围。

7月3日，陈毅赶到郭村。

有的指战员对陈毅讲，我们应该固守郭村，等待八路军第4、第5支队增援。

也有人讲：战斗开始，统战结束。我们应该乘机把：“二李”的部队打垮，一直打到泰州。

是守？是攻？陈毅要作出新的决策。

陈毅与新四军挺进纵队的领导人分析苏北的斗争形势时，认为“二李”进攻郭村主要是韩德勤策划的，韩德勤要借此挑拨“二李”同新四军的矛盾，他可以从中渔利。现在“二李”部队士气低落，韩德勤的主力第89军正在向“二李”部队处集中。新四军怎么办？

如果把“二李”的部队就地歼灭，就必然会造成苏北各派势力联合反共，这不利于发展苏北的敌后抗战。

如果继续在郭村同“二李”的部队对峙，就可能出现韩李联合、再次进攻的局面，这对新四军也是不利的。

如果简单地提出和“二李”的部队讲和，这也会助长“二李”的气焰，“二李”还会强硬要挟，利用韩德勤的支持再次向新四军进攻。

陈毅经过反复思考，决定指挥新四军乘胜攻取塘头，直逼泰州城下，但不攻占泰州，尔后呼吁“二李”与新四军团结抗日，重修旧好。

陈毅对干部们说：战役和战斗上的胜利，不等于战略上的胜利。新四军要向苏北发展，就一定要打败韩德勤的进攻；要打败韩德勤，非争取“二李”等部队中立不可。现在我们虽然和“二李”打了一仗，但“二李”同韩德勤的矛盾还存在，我们还应该把“二李”争取过来。怎么争取呢？就是再打一仗，打下塘头，打出新四军的威风，让“二李”知道搞反共摩擦要吃大亏。塘头大米多，税收丰富，还控制着我们东进要经过的两条大河。但是，我们绝对不能打进泰州。如果新四军现在打进泰州，就会把“二李”推到韩德勤那里去了。

有打，有收。这是多么高明的策略。

7月4日，新四军一举攻克泰州以西的塘头，打下了距泰州城只有7里路的面粉厂。当时，李长江准备弃城逃跑，李明扬在兴化韩德勤处如坐针毡。当他们得知新四军完全有力量轻取泰州而停止进攻时，又惊又喜，觉得新四军是真心团结他们。

这时，陈毅再次给“二李”写信。“二李”的态度有了变化。

陈毅电告党中央：“虽省韩派兵并接济两李饷弹，鼓励两李再打，两李已觉悟不受其利用，认清我们不攻击泰州符合中央七七宣言。”

谈判中，新四军提出送还全部2000多名俘虏及大部分枪支，归还原来由“二李”防守的郭村、塘头等地；“二李”必须让路帮助新四军东进。

得知这么宽厚的条件，“二李”起初很兴奋。但是，当他们知道韩德勤的4个团和保安旅的3个团进至泰州及其附近时，“二李”的态度又强硬起来，提出要让陈玉生、王澄等部队“返部归建”。

对此，陈毅坚决不同意。

当时粟裕已率领江南主力于7月8日到达苏北，苏北新四军连同陈、王等的部队已有9个团的兵力。陈毅和粟裕经过研究，向“二李”表示：新四军东进以后，可以把每月收税5万元的吴家桥一带根据地让给他们。

这着看似“慷慨”的妙棋，实际上是为了高度集中兵力。

新四军让出吴家桥，可以不再分兵驻守。

“二李”见此，欣然同意协助新四军东进黄桥。

郭村一战，孤立了韩德勤，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为进军黄桥、打开苏北敌后抗战的局面创造了条件。

由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渡江北上后，于7月奉命改称苏北指挥部，先期北上的部队与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合编，成立第1、第2、第3纵队，共辖9个团约7000多人。

黄桥周围没有国民党的正规军，日军兵力也比较薄弱。江北新四军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便于控制长江通道，便于向南通、如皋、海安、启东发展，也便于同江南的新四军相呼应。新四军东进黄桥，势在必得。

7月14日，陈毅打电报给新四军军部，请转告中共中央及重庆周恩来处，决定部队整顿一星期以后即向东挺进，建立以黄桥为中心的根据地。

7月25日至28日，陈毅率领所属部队从泰州以西直下黄桥。新四军经过“二李”的防区时，李长江果然命令部队朝天放枪，给新四军让路。新四军通过以后，李长江却向韩德勤报告：缪湾一带发生激战，新四军“伤亡惨重”，一部绕道东去。

韩德勤也同时收到了驻黄桥的保安第4旅旅长何克谦的报告，说新四军1000多人已经从宣家堡“东侵”，韩德勤马上命令何克谦和陈太运“各派精锐部队一大部迅即前往包围而歼灭之。”

对于何克谦和陈太运这两部分敌人，陈毅采取了不同的策略。

陈太运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又是国民党军统局的核心组织“复兴社”的成员，他的部队连以上军官都是军校生。这路敌人虽是国民党的顽固派武装，但他们同韩德勤的矛盾很深，陈太运一度被韩德勤软禁在兴化，只是在他人的帮助下才逃出来的。陈毅认为，可以把陈太运指挥的税警总团争取为中间势力。因此，当税警总团拦阻新四军时，陈毅命令部队只要把他们击溃就可以了。

可是这些敌人战斗力弱。新四军同他们交火时，还是歼灭了陈太运的一个营，抓了不少俘虏。战斗结束后，陈毅马上命令遣返全部被俘的官兵，送还枪支。

何克谦的保4旅与日伪军勾结，新四军早就要打他们。战斗中，新四军迂回包抄，追击突破，一举歼灭其主力2000多人。

29日凌晨，新四军进占黄桥、蒋垛、古溪、加力等地。

这一仗，陈毅区分对象，打得得心应手。28日夜，进占黄桥的战斗正打得激烈，陈毅和叶飞轻松自如地在老叶庄挥扇谈心。

8月2日，陈毅收到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的身份发出的电报，称：苏北各部队将来由你担任战役上的统一指挥。当时，苏北除了陈毅率领的新四军部队外，还有八路军南下的部队和渡河东援时的4、5支队。

新四军进占黄桥以后，连续打下了靖江东北的孤山、西来镇等日伪军据点，粉碎了敌人的报复性“扫荡”。正当新四军准备进一步扩大战果时，韩德勤却集中了20个团的兵力举行大规模的摩擦战争，进行粮食封锁，企图趁新四军在黄桥立足未稳之际予以消灭。

9月3日，韩德勤命令部队分两路南犯。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等的部队为右路，在姜堰地区集结；第117师、独立第6旅、保安第1旅等部队为左路，在曲塘、吴家集、海安地区集结。

两天以后，左路敌人侵占营溪，并开始对古溪进行试探性的进攻。这时，陈毅主张新四军撤出古溪，再退10里，这样就可以诱敌深入，迂回包围。但是有人认为韩德勤进攻的部队不多，完全有把握歼灭当面之敌，不必再退。

9月6日，新四军一举将保1旅击溃，俘虏1000多敌人。但是由于少退了10里，部队迂回未成。战斗结束后，陈毅等人决定把被俘的保1旅副旅长以下1500多人全部释放。

这是陈毅为争取保1旅中立打出的一个智慧之“球”。

当韩德勤发现新四军实力强大，强令保9旅严密封锁新四军的粮食来源，强令李明扬和陈太运的部队向新四军进逼时，陈毅又采取了软硬两种攻



势。

软攻势是舆论宣传。陈毅抓住韩德勤封锁粮食这一不得人心的做法，向各方中间势力写信，说明韩德勤进攻与封锁新四军的真相，进行舆论宣传。这一做法非常有效，当地各界人士奔走呼吁，连李明扬也答应进行调停。许多人都说，封锁粮食是“饿了老百姓，肥了韩德勤，难了新四军，帮了日本兵”。

硬攻势是武力打击。陈毅决定用两个纵队的兵力攻打右路敌人的集结地域姜堰。姜堰的敌人修置了36座碉堡，还摆出了电网地雷阵。9月12日夜，新四军指战员巧妙地用自行车内胎裹住马刀柄，斩开电网，打开了突破口，经过一天激战，攻占了姜堰，歼灭了1000多敌人，也打破了粮食封锁。

陈毅软硬两手都达到了目的后，再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团结抗日。韩德勤却要新四军退出姜堰作为停战条件。

韩德勤认为，新四军决不会退出姜堰，他就能以此为借口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哪知陈毅早已料到这一手，当即决定接受韩德勤的条件，新四军于9月30日撤出姜堰，姜堰的阵地交给李明扬、陈太运的部队接管。这么一来，韩德勤同李明扬和陈太运之间的矛盾又加深了。

新四军撤出姜堰之前，陈毅派人送给李明扬和陈太运的部队100多条步枪和几挺轻机枪，并转告他们：如果韩德勤战胜了新四军，回头就会收拾他们。这正是李明扬和陈太运等人最担心的。李明扬和陈太运都向陈毅表示不再参战，并为新四军提供情况。

韩德勤得知陈毅把姜堰阵地交给了李明扬和陈太运，非常恼怒。他一面向国民党军委会告状，又用优势兵力来压迫他们参战，一面又给“二李”10万元钱，进行拉拢，命令左右两路军队与新四军决战。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决定采用后发制人的策略歼灭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队。

黄桥决战是惊心动魄的。

10月1日。

韩德勤的部队齐头并进，向黄桥攻击前进。黄桥外围新四军的警戒分队进行了一定的抵抗以后，主动撤退。陈毅的意图是诱敌深入，掩护主力集结。

韩德勤果然上当，继续命令顽军向黄桥前进。

陈毅坐镇徐庄，泰然自若。粟裕到黄桥前线指挥。

10月3日。

韩德勤的部队进抵黄桥外围。

八路军第5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率领纵队主力驰援黄桥作战，开始南下阜宁、盐城。

延安：中共中央向重庆国民党当局提出：“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短短16个字，对蒋介石和韩德勤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压力和军事威慑作用。

10月4日。

敌第33师经分界向黄桥东北进攻。第117师在野屋基、何家塘一线进攻黄桥，独立第6旅也从高桥北面进攻黄桥。枪声一响，苏北各种势力都密切注视着黄桥决战的胜负。李明扬“谢绝会客”，中止了同新四军代表的见面。但是，新四军黄桥大胜以后，李明扬又开始“会客”。

陈太运派专人到通扬运河堤上，向南眺望黄桥的战况。

伪军据点里的汉奸也密切注视着黄桥的战斗。

陈毅分析了全局情况，决定先从独6旅下手，迅速歼灭敌人。

独6旅是韩德勤的主力。当其先头部队接近黄桥时，后尾脱离高桥，3000多人形成一路长蛇阵。前线指挥员粟裕根据陈毅的决断，采取“黄鼠狼吃蛇”的办法，指挥部队激战3小时，全歼该旅3000多人，中将旅长翁达被迫自杀。接着，新四军第1、第2、第3纵队将敌第33师和第89军军部包围于黄桥以北地区。这路敌人武器好，战斗很激烈。陈毅向党中央和叶挺、项英报告的电报中说到，黄桥“空前恶战”，“攀登屋顶顽固抵抗拼刺刀七八次”，“我一、二、三、四、九各团进攻凶猛，刺死敌官兵在千名左右，敌胆始寒”。

6日凌晨，战斗基本结束。敌第89军军部及第349旅大部被歼，军长李守维中将在逃跑时被敌兵拥入河中淹死。韩德勤见大势已去，率残部千余人逃回兴化。李明扬、李长江、陈太运更不敢轻举妄动。

黄桥一战，陈毅指挥新四军歼敌11000多人，乘胜连克海安、东台。14日，黄克诚率领的八路军第5纵队在东台县白驹镇与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部队胜利会师，从而基本完成了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

11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成立了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

黄桥决战大捷，陈毅欣喜地赋诗一首：

十年征战几人回，  
又见同侪并马归。  
江淮河汉今谁属？  
红旗十月满天飞。

10月9日，毛泽东、朱德和王稼祥打电报给刘少奇、陈毅、叶挺和项英，其中指出：

陈部大胜振我士气，寒彼贼胆。

无论何部向我进攻，必须坚决消灭之。只有消灭此等反共军队，才有进攻日寇之可能。

陈毅同粟裕在黄桥同国民党顽固派激战时，新四军军长叶挺正在皖南泾县同日本鬼子作战。

当时，皖南的日本侵略军调集重兵，又一次进行残酷的“扫荡”。从繁昌、南陵出动的5000多日本鬼子在航空兵的配合下，分兵向泾县扑来，企图围歼新四军军部。

敌情十分严重。叶挺身边只有驻在云岭北面的第1团和军直特务团第1营的200多人，教导总队的千余名学员，但叶挺对打击日本鬼子显得很有信心。叶挺当军长已有3年，时时都有一种上前线奋勇搏杀的心情。这一次日本鬼子来“扫荡”，他毫不犹豫地亲赴前线，往日那种胜利的喜悦激起了他打击日本侵略军的激情。

部队集合好了。叶挺走上讲台，扫一眼会场，问：“你们知道今天是开什么会吗？”

“动员大会。”大家一齐回答。

“为什么要动员呢？”

“要打日本鬼子。”

“打鬼子要勇敢，会流血牺牲。大家有决心吗？”

“有！”指战员们的喊声惊天动地。

“好！新四军是抗日的一面旗帜，我们一定能粉碎日本鬼子的‘扫荡’。”动员结束后，叶挺又到预定战场指挥大家构筑工事。忽然，叶挺看见了上次带他们到湖南学爆破技术几个人，于是几步走到近前，说：“哟，刘奎，你现在是爆破专家了吧，你们要好好教大家埋地雷，把学到的技术都用上。”

10月2日，日本鬼子从戴家会、三里店向南进犯。新四军将士利用连绵起伏的山地预设埋伏，节节抵抗，在龙洋岗、凤凰山、台山等地有效地杀伤敌人，阻止了日军的进攻。仅仅20华里路程，日本鬼子整整行进6天6夜。

7日傍晚，日本鬼子进入汀潭。但是，不等敌人站稳脚跟，叶挺亲自指挥从中村、茂林赶来增援的部队，把鬼子赶出汀潭。此时，这路敌人离云岭只有7公里，却不敢再向新四军军部前进，在新四军的连续打击下被迫转向青弋江西岸的泾县县城。

9日，日本鬼子在泾县城内到处放火，还烧毁了著名的泾县宣纸厂的一些厂房。

叶挺率领新四军进入硝烟弥漫的泾县城时，一面组织部队打击敌人，一面调遣人员灭火救灾，还帮助人民群众修复住房，为乡亲们做了许多好事。当地群众专门为新四军举行了一次祝捷慰劳大会，称新四军为“救苦救难菩萨军”。

与此同时，周子昆指挥的一部分新四军，在汀潭东北阻击另一路日军时，经过数日苦战，不但打退了日本鬼子，还乘胜打下了南陵。

这些战斗中，新四军共歼灭了1000多敌人。10月12日，叶挺率领新四军回到军部时，云岭的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欢迎打日本鬼子的凯旋之师。第二天，叶挺和项英等人商量之后，亲自执笔写了泾县战役中打日本鬼子的报告，送给上饶的顾祝同，要顾祝同转报蒋介石。其中写道：

委员长蒋钧鉴：

日寇自上月进攻苏皖边境惨败后，复自京沪增

兵皖南，本月2日开始，以步骑炮5000余人，配合空军向我进攻。其一部千余人由戴家会犯汀潭，主

力由南陵犯三里店。职军当经分别迎击截伏，激战于龙洋岗，凤凰山、台山、大小岭及巨坑等处八昼

夜。反复肉搏，纠缠苦斗，战况之烈，前所未有。至7日晚首先将龙洋岗、凤凰山一线之敌击溃，8日晨复将大岭、蜈蚣山之敌全线击溃。敌退据泾县。我跟踪彻夜猛攻，9日晨光复泾县，敌残部向东北溃窜。犯三里店之敌，经我数日苦战，伤亡惨重，向

南陵溃退。我尾随猛攻，同日并克南陵。此役毙敌千余，俘虏敌军中并有西班牙人一人。缴获详数正

清查续报。

蒋介石很快复电，给新四军“传令嘉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嘉奖”离蒋介石10月19日签发的以何应钦、白崇禧名义发出的“皓电”仅仅只有数日。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

与中国的抗日战争息息相关的欧洲战场上，法西斯军队发动了新的进

攻，接连占领了西欧 4 个国家。

1940 年 5 月 10 日清晨，德国军队在荷兰海岸至马奇诺防线之间地域展开全面进攻，德军的飞机猛烈轰炸荷兰的战略要地，空降兵突然袭击了海牙、鹿特丹等政治和经济中心。荷兰军队遭到德军进攻以后，全线败退，短短几天，荷兰全国陷于一片混乱和极度恐慌之中，威廉明娜女王和主要大臣见德国军队攻势猛烈，荷兰军队无还手之力，竟然登上驱逐舰逃往英国。

威廉明娜女王临走前把荷兰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叫到跟前，心惊胆颤地说：适当时机，宣布投降。

没有什么适当时机了。

5 月 14 日，德国军队攻占鹿特丹。第二天，荷兰投降。

德国军队在侵占荷兰的同时，一支由一名上士指挥的 80 名德军小部分乘滑翔机突然降落在著名的埃本·埃马尔要塞的工事顶部，用炸药和火焰喷射器攻打炮塔和碉堡，在地面部队的支援下只用 30 个小时就占领了当时被认为是“欧洲最难攻克的工事”。埃本·埃马尔要塞被攻克，德国军队顺利地渡过了马斯河，击败了英国和法国军队的抵抗，在 5 月 17 日占领了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

德国军队在向比利时进攻的同时，也向卢森堡发起突击，人口只有 30 万的卢森堡面对强大的德国军队的攻势，不战而降。

5 月 14 日，德国军队通过阿登地区以后，又从法军两个集团军之间的结合部色当强渡马斯河，再以每昼夜 20 至 40 公里的速度向西挺进。5 月 20 日，德国军队占领阿布维尔，德军的快速部队第二天就到达英吉利海峡沿岸，分割了英法联军战略正面，封锁了加来海峡。这一招十分厉害，英国和法国的 33.8 万军队不得不由敦刻尔克从海上撤退。这次撤退，仅仅英国军队就丢弃了 2400 门火炮，700 辆坦克，8000 挺机枪，226 艘舰船。这就是西方称之为“战争史上一大奇迹”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然而，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欲望远远没有满足。6 月 3 日至 4 日，德军航空兵大规模袭击法国各机场和重要目标，摧毁了 900 架法军的飞机，掌握了制空权；地面部队在 180 公里的正面上分两路向法军发起攻击。意大利政府见德国法西斯胜利在望，乘机对法国宣战。意大利军队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占法国。6 月 11 日，法国政府迁出巴黎。3 天后，德国军队未经战斗就进占巴黎，巴黎城著名的艾菲尔铁塔上挂起了法西斯德国的旗帜。

6 月 22 日 18 时 50 分，法国和德国的要人来到法国东北部康边森林中，法国全权代表查理·亨茨格将军和德国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走进一节车厢，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法国政府投降。

战争就像一个大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也是在这节车厢中签署投降书的。

这时候，北起挪威、南迄西班牙的全部西欧海岸，都被德国军队控制，英国陷入了三面包围的困境。

德国法西斯军队在欧洲战场的侵略行径刺激了日本侵略军。就在德军占领巴黎的前一天，日本侵略军侵占了湖北省的一个重要城市——宜昌。

蒋介石感到十分震惊的是，日本侵略军占领宜昌以后，又派出空军和海军的大量飞机对重庆等重要战略目标进行轰炸，其中攻击重庆市军事设施的炸弹就有 1 万多枚，企图以疯狂的轰炸来动摇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

一天，日本陆军的 35 架飞机和海军的 89 架飞机联合出击，自 16 时 28

分开始集中轰炸重庆市区两个多小时，炸弹落在蒋介石行营附近，一时间，黑烟冲天。

根据日本方面统计，7月中旬，重庆市区遭到轰炸以后损失严重，其中20%的设施遭到破坏，该市经济生活停滞，物价飞涨，人民厌战情绪空前高涨，由于连日长时间隐蔽，不少人患病。

日本侵略军的轰炸一度使国民党上层集团笼罩着一种失败情绪。蒋介石等人也曾经寄希望于美国和英国的援助，然而，英国和美国的决策者们似乎还没有从法国迅速灭亡的恶梦中惊醒过来。

美国和英国暂时没有力量东顾，却又极不希望日本在亚洲战场上继续得势，因而支持中国抗战。

苏联也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蒋介石看到了美国、英国和苏联支持中国抗战的期望，也想用这种无形的力量同日本政府讨价还价。

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也有变化。日本为了巩固其侵华的既得利益，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决定：“除继续进行武力战外，应采取断绝英美的援蒋行为及调整日苏邦交等一切政治和军事手段，力求摧毁重庆政权的抗战意志，以迫使其迅速屈服”，实现“蒋汪合流”。

冈村宁次称这种“诱降”企图为谋略战。

当日本人伸出诱降这只“手”时，蒋介石并没有拒绝，而是匆匆忙忙地举行长沙会谈，达成了与日本方面代表板垣征四郎的长沙会谈备忘录。蒋介石并不是要走汪精卫的老路，而是借与日本谈判，来压美国、英国、苏联给他更多的援助和支持。

在纵横交错的战争形势中，蒋介石还摸到了一张牌。蒋介石渐渐看到，日本决心南进，要到地球上最大的太平洋上去同美国争夺利益，日军在中国的打击重点是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已经不可能对正面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了。

有了以上3张牌，蒋介石觉得自己正处于“左右逢源”、“待价而沽”的地位。

于是，蒋介石决心继续执行既抗战，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这是一种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于是，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中出现了皖南事变，出现了新的反共高潮。

这也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已久的。

1940年7月1日至8日，重庆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五届第七次全会，蒋介石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这以后，国民党顽固派又制造了大规模反共摩擦事件，其中一个主要矛头就是企图消灭和驱逐新四军。

蒋介石耍出了幕前和幕后2套把戏。

幕后的把戏是：秘密命令顾祝同和韩德勤调集部队，准备消灭长沙南北的新四军。

幕前的把戏是：在所谓“中央提示案”中，强令黄河以南的新四军全部集中到旧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指使顾祝同通电全国，诬蔑新四军“破坏抗战”，大肆宣传统一“政令和军令”。

抗日战争整整4年了，蒋介石又弹起了“统一”的老调。这种“统一”实际上只是要“统一”2个军，八路军和新四军。

但是，这不是普普通通的2个军，而是一支团结抗战的革命力量。

新四军在江南抗日，八路军在敌后战场上抗日。就在蒋介石玩弄“中央提示案”的时候，八路军总部于7月22日向晋察冀军区、第120师、第129师下达了关于击破正太铁路为中心的《战役预备命令》。其中指出：“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动，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被截断，国内困难增加，敌有8月进攻西安截断西北交通之消息，似此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更加动摇，投降危险也随之严重，我军应以积极的行动在华北战场上开展较大胜利的战斗，破坏敌人进攻西北计划，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争取时局好转。”

这一命令表现出了八路军将士为中华民族的利益而浴血奋战的崇高精神。

这一命令也导演出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那是抗日战争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谁知，当八路军的勇士们在敌后战场同日本鬼子奋勇拼搏时，蒋介石却指使何应钦和白崇禧于10月19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和副参谋总长的名义，向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了所谓“皓（19日代号）电”。“皓电”除了继续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战”、“不服从军令、政令”外，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电到后一个月内，全部集中到黄河以北的冀察地区，从而掀起了抗日战争中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蒋介石总是千方百计要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北伐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时刻，蒋介石之流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人民。当革命的火种在红色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时，蒋介石又调集上百万军队，连续五次“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如今，日本侵略军野蛮地在华夏大地掠夺、屠杀，蒋介石又要对新四军下毒手了。

## 1

1 黄桥一战，韩德勤元气大伤，退守兴化、曹甸等水网地区，不敢轻举妄动，颇为恼火。

然而，最为恼火的人物要数蒋介石。此刻，他最后瞥了一眼放在办公桌上的“黄桥战况”，不禁陷入了沉思……1939年底，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确定了以军事反共为主，政治反共为辅的方针。尔后，经过周密策划，以胡宗南部进攻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以阎锡山部进攻晋西地区的山西新四军和八路军。可惜胡、阎不争气，使蒋委员长丢尽了脸，在国人面前声名狼藉。

1940年伊始，蒋介石即把军事反共锋芒从华北移到华中，本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

因为苏北新四军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孰料韩德勤也是个不中用的东西，进攻黄桥未遂，却损兵折将1万余人……

蒋介石毕竟是一个与共产党打了十多年交道的老手。他不只一次地安慰过下属：“不以一役胜败论短长”。眼下，他深知，为兵败黄桥而恼火已失

去任何实际意义。于是，那种令人不悦的沉思被一幅辉煌的景象所代替。

他看到：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互相承认对方的欧洲和东亚的霸权地位。此时日本急于结束对华战争，以便放手南进攫取东南亚。于是通过亲日派加紧与蒋方对话，争取在 1940 年未之前能建立“和平”关系……

他看到：为了抗衡德、意、日军事同盟，苏美也签定了联防协定。他们采取了赞助中国抗战，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南进和拉拢蒋介石加入英美同盟的政策。为此美国在 1940 年 9 月给中国贷款 2500 万美元；英国在 10 月 8 日重新开通滇缅公路，香港交通也正式开放；12 月 2 日美国国会又通过议案，给国民政府 1 亿美元巨额贷款，同时，美国还派了一批专家到国民政府各个部门参加工作……他看到：苏联为避免东西两面受敌，也采取了大量贷款、支援物资、派军事顾问等方法积极援助国民政府抗战。在派朱可夫到中国的同时，苏联政府一次就给蒋方提供了飞机 250 架、大炮近 300 门、汽车 500 辆以及相应的装备物资……如果说，抗战以来蒋介石一再丧师被弄得一筹莫展的话，那么，此时的蒋介石已经开始春风得意，左右逢源。在风云际会的国际舞台上，蒋介石深知自己已经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从而引起各方面重视。假使这时蒋介石能充分把握时机，在国际上积极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国家，在国内积极联合中共和一切民主力量一致抗日，那么他在中国近代史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形象无疑将大为改观。

然而，蒋介石没有这样去做，眼前那幅辉煌的景象无形中成为他下一个战略决策的支撑点。他按照自己的逻辑在思考怎样利用大好的国际形势来完成他十多年的夙愿。他深知，攘外必先安内，八路军、新四军毕竟是他的心腹之患。然而，如若反共，必须有实力。实力何在？他不禁将目光落回到中国这块版图上。

就国民党而言，冯玉祥、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国民党左派曾多次上书蒋介石，极力谴责反共。他们是指望不上了。

以何应钦为首的国民党亲日派集团与蒋介石虽有矛盾，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却是一拍即合。何应钦反共有心，无奈手中实力有限。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嫡系，实力虽强，但内部意见不一。胡宗南、卫立煌等都是拥兵一方的干将，可是对此次国共磨擦却无战意。

地方实力派诸如阎锡山、傅作义、马鸿逵等人，大多数不愿绑在蒋介石的战车上。

蒋介石想来想去，眼光最终落在了桂系首领白崇禧及其所属李品仙的身上。桂系原为全国著名反蒋地方实力派。抗战爆发后，桂系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推动下，同时也出于保护自己根本利益，获得更多的政治、军事实力的需要，主动请缨出征，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蒋介石为了笼络桂系，吸收白崇禧“担任中枢挾持”，担任军事委员、副参谋总长。而后，任命李品仙继任安徽省主席。李品仙上任后，即听命于蒋介石。白崇禧不断向皖南新四军张云逸、罗炳辉部和豫鄂边新四军李先念部挑起兵端，颇受蒋介石赏识。

此刻，蒋介石的思绪透过层层迷雾渐渐地清晰起来，他很清楚，如果与何应钦、白崇禧结为联盟，尤其是桂系参加反共，那么挑起一场大规模的局部内战，实力足矣。

于是，他召来了白崇禧，在面授机宜之后，一个阴谋形成了。

黄桥战役后第9天，即1940年10月9日，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面谕，同何应钦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皓”电，命令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六问题所规定工作战境地内”，即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延安。

毛泽东走出窑洞，极目远眺，环视群山，目光终于融入清凉山上那一抹落日余晖之中。

清凉山上留有宋代军事家、大词人范仲淹的墨迹。此时，毛泽东无心去吟诵范大词人“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那种萧条冷落、雄浑悲壮的词句，而是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之中。何、白“皓”电，使这位红军领袖不得不校正对时局的判断。

1940年夏，法国战败，英法已失去干预东方事务的可能性，蒋介石失去了组织反苏反共集团的帝国主义支持，因而毛泽东断定“发动反苏暗流与反共高潮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要被迫重新来考虑其政策了，他们有可能在不妨碍其阶级利益即政权的范围内，延长合作抗日时间。”

毛泽东还判断，由于中共已发展到50万军队、60万党员，而大资产阶级不统一不强大，国民党内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也竭力反抗，蒋介石将不得不被迫让步，一方面承认共产党在黄河以北的实力地位，一方面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有实施宪政的必要。于是，毛泽东很快决定：不仅要迫使这种好转及时实现，而且还要争取彻底好转，即大资产阶级下台，代以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各得一票。

蒋介石集团是靠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存在的，这是毛泽东在英法两国失去东顾能力之后判断蒋介石必定要向共产党妥协的基本依据。

然而，历史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判断去书写，而是与这位伟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国民党并没有妥协，而是于7月6日抛出了《中央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内“扫数”开赴黄河以北，并只允许八路军编6个师，新四军编2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分析国际局势，分析蒋介石有转向日本寻求和平的可能，但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在近期内发生。因此，毛泽东固然同意与国民党划界（以新黄河为限），但在其它方面仍旧不打算退让。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国民党毫无商量余地，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发出了“皓”电。

很清楚，“皓”电之后，国共关系高度紧张。此时，毛泽东作为中共的最高决策人不得不对时局重新进行审视，不得不对蒋介石集团的走向作出清晰的分析。

上饶。

就在毛泽东沉思于清凉山下时候，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的办公室里烟雾弥漫。作为国民党中央军“八大金刚”之一的顾祝同，此刻正不停地吸着烟。站在一旁的参谋处长岳星明心里很清楚：司令长官是在吞云吐雾中渲泄着十余天来的不快。

在蒋介石军事集团中，顾祝同与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不同，他从黄埔时期起就一直追随、依附蒋介石，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地盘和军队，好不容易利用抗战的机会，派其心腹、同乡和同学韩德勤惨淡经营苏北，保住了苏北这块地盘和第89军这支实力。可惜，黄桥一役，韩德勤遭重创，



顾祝同的心也随之颤抖。他感到愤懑，他要为自己唯一的嫡系韩德勤出一口恶气。

手中的烟头在闪烁，顾祝同的眼睛也发出了亮光。昨天，“皓电”发表了，他看到了委座的决心，也看到了自己的机遇。他心里很清楚，在限制新四军的发展方面，他颇受蒋委员长赏识：

1939年5月5日，顾祝同根据国民党中央颁发的《共产党问题处理办法》等密件，向辖区各地党政机关、部队发出了关于取缔中共和新四军“违法”活动的密电。接着，他正式下达了《第三战区各省防制共产党活动实施办法》，命令各地加强防范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活动，一有情况，立即上报。1939年9月，顾祝同从参谋处、政治部、军务处和办公厅挑选精兵强将，组成了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情报室。为了加强皖南特务工作，特派军统特务张超坐镇指挥。广泛收集有关新四军及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活动情报。

1940年5月，顾祝同派遣战区上校高级参谋、军统特务陈淡如到云岭新四军军部任联络参谋，公开任务是调解新四军与当地国民党军队、政府之间的“纠纷”，考察新四军对日作战情况，实际任务是收集新四军情报。

1940年9月，第三战区成立了以上官云相为主任委员的国民党党政军联合委员会，该委员会奉顾祝同旨意，拟定了防制共产党、新四军方案，组织了特种委员会行动队，严密监视新四军。

……此刻，顾祝同看到了立功受奖的机会，于是，十余天来的不快，随着“皓电”中暗藏的种种杀机，随着手中烟头的缕缕青烟而荡然无存了。他狠狠地掐灭了烟头，转过身来，对伫立已久的参谋处长岳星明下达了指令：迅速拟出增强皖南兵力，作堵击准备的“防堵计划”。

与此同时，蒋介石一期部署业已完成：汤恩伯率9个师10万人进兵豫皖苏；李品仙率4个师5万人进攻皖东根据地；顾祝同、韩德勤、冷欣则准备扫荡长江南北的新四军。

云岭。新四军军部。

秋雨濛濛，项英站在窗前，透过细雨的屏幕望着朦朦的群山。身为中共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的他，有着历史的辉煌。

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项英出尽了风头。斯大林单独接见了她，会见时的情形和斯大林那一字千金的评价，使项英久久甚至终生难以忘怀：“项英同志，你是中国革命真正工人阶级出身的领导人，要不断在斗争中锻炼，要加强理论学习，使自己完全布尔什维克化。”他记得，斯大林眼睛里充满希望的光芒。这位共产国际的最高负责人亲手送给项英两件礼物，一支手枪和一支钢笔。

这也许是斗争和学习的象征。

他的政治素质受到过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赞赏，他的形体神态、音容笑貌又给一位美国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1939年，美利坚合众国颇负盛名的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南昌新四军军部采访了他。这位美国人是这样描述他的：“他的外貌不给人好感，实际看上去，他很像通商口岸的外国人心目中的‘典型苦力’；他身体结实，肌肉发达，身材矮小，从背后看去，他的头很像圆屋顶那样突出；他的双手手指粗短，布满老茧，他的嘴唇和鼻子宽厚；他的牙齿突出，不整齐，不美观，而且缺少了一些牙齿；但他的笑容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富有感染力的笑容……”

项英喜欢细雨，他有着自己的清高和孤傲。眼前这霏霏细雨给他以畅快，任他去遐想。

一阵急促的脚步和一声“报告”，使他不得不从烟雾迷朦中收回目光，收回遐想。机要秘书送来了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项英的电报。

项英扫了一眼电报内容：

……皓电发表后，反共高潮上升，我们在军事

上必须第一步以移动为名，将新四军主力开至江北，以便于我军集结应战。

希夷（即叶挺）及一部分工作人员必须过江，指挥江北的大部队。你及皖南部队或整个移苏南再渡

江北上，或整个留皖南，准备于国民党进攻时向南突围，二者应择其一。如留皖南，须准备打内战，并蒙受政治上不利，望考虑。

黄桥战役前，毛泽东、王稼祥即有电报称：“韩德勤部是顾祝同唯一嫡系，受我打击后，顾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

黄桥战役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叶、项：“整个南方有变为黑暗世界之可能。但因蒋介石是站在反日立场上，我们不能在南方国民党地区进行任何游击战争，因此，军部应乘此时迅速过江，绝对不要再延迟。”

项英不再去想，早在一年前中央就开始催促他北上，时至今日，他仍然感到很烦恼。

他认为，毛泽东算什么？不过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十分了解，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而他自己是一个无产阶级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一个独撑一片天的党的重要负责人，一个总结过敌后3年游击战争经验的英雄，一个共产国际给予高度评价的革命领导者，一个在新四军中颇具威望和绝对权威的人，怎能让别人来指手划脚？

项英不愿北进，他有着自己的战略构想。

一份刚刚送来的苏联大使通报端端正正地摆放在毛泽东的面前：国民党正与德国、日本进行秘密谈判。

毛泽东立即联想到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联想起国民党的“皓电”，联想起国民党兵力调动与部署情况，于是对时局作出了如下的判断：

如果日美战争不能迅速爆发（这个可能多），或虽爆发美无胜利把握（两年内是无把握的），如果英国被德意日三国在今冬明春打得落花流水（一定的），如果日本能退出武汉等地，仅占沿海与华北并声明主权仍属中国，由蒋介石派人自行管理（可能性很大），如果参加德意日同盟反对英美能使中国资产阶级发财，蒋介石是愿做贝当的，……蒋介石走

这条路的可能性很大。

毛泽东很清楚，如果蒋介石直接准备投降德意日，共产党不仅要立即准备与大资产阶级永远决裂，更重要的是要立即准备与国民党进行全面战争，并承受日蒋两军的严重夹击。

毛泽东深感事态严重。

中共中央深感事态严重。

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当，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

毛泽东举棋不定。

毛泽东先后致电各地党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提出看法，中心问题：军事上是坐以待毙，还是先机制敌，即：“我军不待日蒋夹击到来，即从50万人中抽调至少15万精兵，分数路入敌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以此来避免严重的日蒋夹击。”

毛泽东当然倾向于这种带有积极防御色彩的战略进攻，在他曾经指挥过的大小战役中不乏这种精彩之笔。然而，毛泽东不仅仅具备了战略家的胆魄，更重要的是具备了政治家的深邃灼见。他深知，这一着将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不利。

于是，他难下决心，再次举棋不定。

毛泽东站在延河水边，平静的水面倒映着西北灰浑的天际。他凝视着河水，仿佛看到蒋介石在向德国日本“手挥五弦目送飞鸿”，此刻，他做了最坏设想。

他深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此时错一着将遗尔后无穷之患。”他久久地望着迷蒙的远方。

军事行动会给政治带来极大的不利吗？战争是什么？毛泽东有着自己的战争观，他曾反复告诫过全党：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当政治在前进道路上遇有障碍，用和平的方式不能解决，于是出现了战争。战争是用来扫除政治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的特殊工具。

眼下，国民党已步步逼进，生存便是政治。尽管毛泽东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的时候，向国民党发动局部战争是一种冒险，但比较被国民党军队赶过黄河，“置我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到底是危险性较小的一种冒险。

毛泽东善于把战争诗化，也有着“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气概。此时，他也许想起一、二、三次反“围剿”那种硝烟中的浪漫，也许想起克劳塞维茨“防御中应有进攻的利剑”这句他颇为赞赏的名言，也许看到一支浩荡的大军在创造着人间的奇迹……

11月3日，毛泽东不再徘徊，他在取得了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毅然决定：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准备示以团结姿态，并指示皖南新四军军部“答应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军事行动的时间；一方面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15万精兵分几路深入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地，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同时，毛泽东拟就“炸弹宣言”，并通知重庆办事处等中共在国民党区域的机关即刻开始作紧急布置。

弓举弩张，一切引弦待发。

然而，这毕竟是孤注一掷的重大冒险步骤。毛泽东十分清楚，这一重大决定必须取得共产国际和苏联的理解和支持，才有备而无患，并有利于在内战形式的民族革命战争爆发后长期作战。于是，毛泽东向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发出了请示函。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作战室。

参谋处长岳星明来回踱着，他这种机械反复的动作已经从早晨6点持续到下午4点。尽管如此，他的目光似乎一时也没有离开皖南地区的军事沙盘，沙盘在告诉他：

新四军皖南部队万余人，正面抗击着芜湖、繁昌一带的日军第15师团和116师团，其余三面受到蒋介石军队4个师4万兵力的防范和监视、右有

第 25 军的 52 师和 108 师，左有新 7 师，后有川军的 144 师。

岳星明不愧为是训练有素的参谋处长，随着那长时间机械反复动作的停止，一份完整的“防堵计划”也跃然胸中。

傍晚，《防堵皖南新四军作战计划》端端正正地摆放在顾祝同的办公桌上。

莫斯科。

斯大林第五次拿起毛泽东的请示函：

……蒋介石计划是驱逐我们至华北，修筑重层纵深封锁线（正在大规模修筑）置我们于日蒋夹击之中而消灭之，反共有战争一触即发之势；在我们取让步态度而彼仍坚决进攻之时，我们拟举行自卫的反攻。在日蒋夹击中，如不采取此种军事步骤，打破进攻与封锁是不可能的，我之地位是很危险的；但此举有可能使蒋介石与我们最后大破裂，故在政治上是不利的。因此，我们如处置不当，可遗将来无穷之祸。我们最后决心还没下，请求你们给予指示。

斯大林习惯性地拿起那支硕大的烟斗，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却明显地说明，他不赞成毛泽东的计划。

斯大林认为，中国共产党还显得太孱弱，其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蒋介石可以轻而易举地联合日本人来反对共产党。因此，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中国共产党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而由此把蒋介石逼到日本那边去，不论对中国革命还是苏联的安全，都是一种严重的危险。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明显地表示，不赞同毛泽东的形势估计和战略方针。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拉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并无全面剿共和投降日本的决心。而亲日派的目的，正是要设法挑起国共战争，逼蒋介石降日，共产党切不可中此诡计，在政治上军事上只应做防御准备。

11 月 23 日，季米特洛夫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回信：

……在没有详细弄清情况之前，中国共产党不

要对国民党采取任何行动。举行自卫反攻，有可能使蒋介石在人民面前把你们说成是抗日斗争团结的破坏者，并利用你们的行动来为自己同日本人缔结妥协性和平的企图辩解。当前的任务，是要消除抗

日民主统一战线中的分歧，首先需要停止中共武装力量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冲突。

毛泽东放下季米特洛夫的来信，良久没有说话。此刻，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位爱吃辣子的湖南农民的儿子在想什么。

他有着自己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他喜爱革命战争，喜爱用革命战争去消灭反革命战争。他懂得，“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以 15 万精兵千里跃进敌后，变敌后为前线，这的确展示出一位军事战略家险中求胜的胆识。如果是这样，历史又将如何写？毛泽东为后人留下了一个严肃而活泼的课题。

也许，他在下决心，总有一天毛泽东会导演出一幕敌进我进的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此刻，有谁能料想到，7 年以后，当蒋介石军队重兵进攻陕北和山东的时候，刘邓大军竟中线突破，千里跃进大别山，三军配合、两翼箝制、逐鹿中原，在也许不该反攻的时刻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史载：

194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佳”电，申明中国共产党为顾全抗战大局，相忍为国，挽救危亡，决定新四军皖南部队“遵令北移”，但须宽限时限。15日，毛泽东在向全党发出的《关于击退蒋介石反共高潮的措施》中，进一步指出：“对于蒋介石这次反共进攻，决定对皖南取让步政策（即北移），对华中取自卫政策，而在全国则发动大规模反投降、反内战运动，用以争取中间势力，打击何应钦亲日派的阴谋挑衅和蒋介石反共进军，拖延抗日与国共合作时间，争取我在全国之有利地位。”

蒋介石得意地笑了。他在1:500000的中国大地图前笑了。

他曾有过梦想，要像希特勒统一德国那样统一中国。为此，他曾亲自挂帅围剿江西一隅的中共中央苏区。第一、二、三次围剿，他败在毛泽东的手下，第四、五次围剿，他胜了，可惜败的却是别人，而不是毛泽东。为此，他失眠过。他深知，在中国是不能有两个领袖的，胜者乃为王。于是，他等待着。终于等来了中国共产党的“佳”电，毛泽东让步了，毛泽东在关键时刻还是怕破裂的。如果在此时不一鼓作气压服共产党，恐怕将来就无办法了。

油灯下，毛泽东在奋笔疾书，在起草电报。这几天，经他起草的电报像雪片般飘向各地，这纷飞的雪片贯穿着一个基本思想：

……蒋介石的一切作法都是逼我让步，许多中

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词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其它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

只有软硬兼施，双管齐下，才能打破蒋介石的诡计，制止何应钦的投降，争取中间派的向我，单是一个软或单是一个硬，都达不到目的。

我之方针是表面缓和，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

毛泽东在给蒋介石留面子。

然而，蒋介石却不要这个面子。

中共“佳”电之后，国民党由“皓”电所鼓起来的反共热情，到11月上旬便开始演变为华中局部规模的具体军事行动：

李品仙电令桂系在皖南的部队，具体部署准备击灭新四军渡江部队……  
桂军第138师莫德宏部开进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向皖东新四军张云逸部第四支队挑衅……

鲁苏战区东北军第112师霍守义部2个团越陇海路南进至苏北淮阴地区以东苏家嘴一带，与八路军黄克诚部对峙，企图以“武装调停磨擦”为由，打通苏鲁联系……

韩德勤虽然兵败黄桥，但余勇犹存、拥兵数万，此刻已按捺不住，扬言要“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苏北，有个不大的镇子，名叫曹甸。今天，它像一朵小小的浪花，融汇在祖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滚滚浪潮之中，像祖国千万个小镇一样平凡。然而在史学界，这座不起眼的小镇却裹着一层浓浓的迷雾。

黄桥战役脍炙人口，可是知道曹甸战役者甚寡。据说，对战役的打法，当年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与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兼华中总指挥部政委刘少奇有不同看法。对这场战役的评价，至今史学界众说纷纭。1963年编写的《新四军抗日战争史》在提到曹甸战役时，对黄克诚持批判态度，

指责他“右倾保守，致使战役目的没能圆满达到”。彼时黄克诚已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这种新账老账一起算的作法本不足为奇，问题是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一些军战史载体仍以“不宜”等种种原因，对曹甸战役的介绍若明若暗、欲言还休……

苏北阜宁且东沟镇，八路军第五纵队黄克诚部驻地。

刘少奇放下刚刚阅读几遍的“军情通报”，以敏捷的思维速度将几千文字浓缩为一句话：霍守义师南下和莫德宏师东进，苏北形势逆转。

刘少奇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焦急和烦躁。11月4日，他曾与黄克诚长时间地分析了南下八路军与新四军在苏北会师后的形势。而后，他代表黄克诚向中央提出了“我们的建议”，明确提出“迅速消灭韩德勤，统一苏北于我手中”。孰料，这意见遭到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正、副指挥陈毅和粟裕的强烈反对。陈、粟二人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及刘少奇、黄克诚：“立即消灭韩德勤固然便利，恐先给蒋大举进攻的口实，于政治不利”。

想到这些，刘少奇不禁又凭添几分烦躁。他懂得，战争不是儿戏，战机稍纵即逝，容不得长时间地笔墨往来。昨天，他已致电中央，陈述利害：“如不迅速解决韩德勤部，巩固苏北阵地，不集中华中主力给反共军主力以痛击，消灭一二个主力师，则华中形势愈趋危险愈难对付。”可是，中共中央没作任何反应。

刘少奇越发着急。

1939年秋，他抵达华中后，朝思暮想的就是如何执行中央的战略决策，做好发展华中这篇大文章。经过在豫皖苏、皖东北等地区的实地考察，他最后认定只有苏北才是有最大发展的地区，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此后，他先后与项英的南进政策和彭雪枫、黄克诚的西进主张产生过严重分歧，但最终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

现在，他仍坚信，毛泽东会很快回电，毛泽东会支持他的。于是，他再次拟就电文，建议“首先消灭韩德勤，巩固苏北，确保津浦路以东地区，集中全力在皖东决战后再相机向西大发展。”

与刘少奇彻底解决苏北问题的急躁情绪相比，延安的态度比较冷静。

毛泽东在考虑：华中形势极其复杂，越是复杂越需要慎重。动哪一颗棋子都无疑会影响全局，更何况，消灭韩德勤决不是可有可无的一招棋。毛泽东清楚，只要这颗棋子一动，皖南新四军将承受更大的压力。叶挺、项英能否承受得住，毛泽东心里没底，中共中央心中没数。

11月11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复电陈毅、刘少奇、黄克诚等人：目前立即动手打韩德勤、霍守义、何国柱，在政治上极端不利。

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你们不得命令不得动手。

“第一次攻击令须由延安下”，说明毛泽东的忍耐已经到了相当的程度。苏北的形势严峻，这一点，毛泽东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刚刚得到情报：胡宗南重兵正虎视眈眈，准备进攻关中的八路军，陕北的形势亦趋紧张。于是，他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刘少奇、黄克诚进攻韩军提出了一个前提条件：须等胡宗南向关中动兵之后，如此才有理由向韩德勤和霍守义部发动局部战斗。

就在刘少奇向中共中央频频言兵的时候，皖南的项英也在同延安展开

了一场“蘑菇战”。

11月22日，毛、朱、王致电叶、项：

皖南邻队及军部以在动手解决韩德勤之前移至苏南为有利。准备情况如何，几天可以开完？盼告。

中共中央十分着急！

同日，项英复电延安：

我们意见极短时间内无法开动，如估计有战斗情况发生，反不如暂留皖南为好。

项英安稳如山。

11月24日，延安确认曹甸战役不可避免，对韩德勤攻击在即，急电指示叶挺、项英：

（一）你们必须准备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

（二）希夷率一部分须立即出发；

（三）一切问题须于20天内处理完毕。

中共中央万分焦急！！

11月27日，项英复电延安：

中央大计如何？究竟有何举动？

项英在装糊涂。

11月30日，延安致电叶、项：

苏北动作不碍大局，只在淮安、宝应间开一个

缺口，以便隔韩、霍，打通苏皖。顾、韩会叫几声的，你们敷衍一下就完了，……以大局判断，蒋、顾是不会为难你们的，现在开始分批转移，12月底以前移完不算太迟。

然而，毛泽东对蒋、顾的分析和判断却失算了。

蒋介石、顾祝同对孤悬苏北的韩德勤部的关注，绝不稍逊于延安对孤悬皖南之新四军的关注。

曹甸地区战云滚滚。

华中指挥部10个整团的兵力与韩德勤部展开激烈战斗。

韩德勤部遭受重大打击。

韩德勤瘫软在指挥所里。黄桥一役惊魂未散，眼下又遭如此打击，几天前那种勃勃雄心已荡然无存。一种求生的欲望，在强烈支撑着他口述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告急电文：

“我军疲惫之余，饷弹奇缺，长久消耗，断难维持。拟令89军主力及霍守义、李明扬、陈太运各部向盐城、海安出击，作死中求生之计。务恳钧座顾念苏北大局，速调大军驰援，并即日派飞机送款接济，以挽危局。”

他的口述渐渐变成哭诉，副官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韩德勤的告急电报到何应钦的办公桌上，已是12月3日。何应钦阅后，并没有过分为韩德勤上火着急，而是立即绷紧了一根十分敏感的神经。当他把苏北战事同皖南北移进行联想分析之后，发觉如果新四军经苏南北渡，势必增加对韩德勤的压力，遂提笔在此件上批道：

“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本案请照上意速呈委座核示。”无疑，叶挺、项英的心中又笼罩上一层阴影。

12月7日，蒋介石得知韩德勤受损。

他拿起军令部于上月14日拟定上报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沉思良久后提笔批道：“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日期当略暂缓，须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

12月8日，蒋介石令何应钦、白崇禧发出“齐”电，重申“皓”电立场。9日，蒋介石发出“佳”电：

“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2月31日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底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掏出手绢拭去额头上的汗珠，继续向蒋介石慎述己见：“委座，暂缓下令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恐为不妥，”他又擦了一把汗，见蒋介石微睁双眼并无愠怒之色，便继续说下去，“眼下已近12月中旬，如果命令迟迟下达，恐各部队准备不及。……韩德勤危在旦夕，为避免国军被各个击破和声援苏鲁，使我立于主动地位，实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

蒋介石抬了抬头，缓缓地说道：“你可以走了。”

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接受了徐永昌的献计，向上饶的顾祝同发出了特急电报：

（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

北渡，只准其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亦可。

（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勿再宽容”，一场精心策划的内战一触即发！

顾祝同接到蒋介石的特急电报后，立即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拟定进剿计划。

顾祝同限期赶修重庆至上饶长途载波电话，积极调兵遣将，并决定由上官云相担任前线总指挥。

白崇禧指挥李品仙在江北沿江布防，焚烧渡船，控制渡口，积极策应顾祝同部。

皖南上空，阴霾密布，雷声滚滚，腥风在前，血雨在即……

## 2

212月的皖南，寒风呼啸，一派肃杀。

项英的心情如同这气候一样，凄苦、寒冷。他感到孤独，孤独的心灵在寒风中摇曳。

12月26日晚9时，机要秘书送来了中共中央紧急电报。这电报挟带着窗外的寒意，毫不犹豫地吹进了项英本已寒凉的心胸：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示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



好一个“一年前”，好一个“不执行”。往事如烟，不堪回首。不堪回首的往事像着了魔一样，迫使项英的目光离开了电文。

一年前，中央指示新四军东进，进入宁、沪、杭三角洲；北移，进入两淮、苏北。然而，一向认为自己颇具战略头脑的项英却有着自己的独特见解。

他认为，东进、北移，有三大不利：

其一，宁、沪、杭三角洲乃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之大本营，日军占领上海、南京、杭州后，此处又成为日、蒋、汪的心脏地区，故进入此地区实为愚蠢之举。

其二，此地区为日、蒋、汪三雄必争的经济命脉区，新四军硬要挤进去，必将处于日、伪、顽三面夹击之中。须知经济利益冲突是一切战争的根本动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其三，北进之后，敌后 3 年游击战争所营造的江南革命根据地、战略支撑点，必将丧失。

项英想到这儿，认为这是以革命利益为重，以烈士的鲜血为贵。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中央的历次批评，只能使他愤慨，却不能使他愧疚。

他耐住性子，把目光重新收回到电文上：

……至于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想办法，有决心……如果动摇犹豫，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的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项英刚刚压住的火，被这不啻于训斥的语言重新点燃了！

什么“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

我项英早就提出了决心大、方法明的方略：新四军的真正出路不是东进，不是北移，而是向南！

1938 年 6 月，项英致函陈毅，提出了南进战略的雏型：“我们计划在皖南建立一个根据地，这在战略上非常重要。将来在战争形势变化时，我们即可以依靠这一支点向皖南各县发展，以及利用机会争取天目山脉和仙霞山脉……”1938 年 10 月，广州、武汉相继失守，第三战区落入日军南北夹击的铁钳之中。项英判断，势如破竹的日本侵略军，必然打通浙赣线和粤汉线，以沟通南北之联系；顾祝同的长官部和他的部队，必然向闽、赣、云、贵溃退；驻守皖南的新四军，便可乘势跟进，迅猛发展游击区，在新的敌后——黄山、天目山、武夷山地区大显身手，远征闽、浙、粤，甚至很快就可以恢复当年中央老苏区。长江之南，红旗漫卷，半壁山河，任我驰骋，一部气势恢宏的南进交响曲！

项英的思绪不止一次地在这雄浑的交响曲中激荡。

然而一年来，项英感到，自己像一位被扼住创作灵魂的伟大音乐家一样，去违心地为一些粗俗的歌手操琴伴奏。他感到很痛苦。

寒风呼呼，破窗而入，项英打了个寒战。

他不是因为寒风而战栗，而是在继续看着电文的过程中不寒而栗。

我们明白了你们要我们指示何项方针，究竟你

们自己有没有方针，现在又提出来拖或走的问题，究竟你们主张的是什么，主张拖还是主张走，似此毫

无定见，毫无方向，将来要吃大亏的。

语气之严厉，前所未有！

项英在阵颤中感到，没有办法再拖了。尽管他不愿意离开皖南，但是蒋介石不允许，中共中央不允许。他想起蒋介石的“皓电”、“齐电”、“佳电”，想起了中共中央一而再、再而三的催促电文。它们像十二道金牌一样，催他离开皖南。然而，去向何方？

上饶。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官邸。

客厅里，顾祝同在焦急地等待着叶挺的到来。

前几日，他接到蒋介石的特急密电后，几经考虑，决定把项英请来，当面宣布“委座”命新四军改道北移的新命令。

叶挺与顾祝同、上官云相，同为保定军校六期生。叶挺，广东惠阳人。顾祝同，江苏涟水人。上官云相，山东商河人。虽异地而生，但因当时同为革命派（当时，学生分为三派：革命派和趋向革命派，大多数为同盟会会员；中立派；北洋军阀的反革命派。斗争相当激烈），在同反革命派的斗争中成为密友。上官云相曾因嫖女人受到申斥，有人评价这位花花公子式的将领，一生有三好：好财、好色、好鸦片烟。顾祝同容忍他，叶挺疏远他。

叶挺每到长官部来，顾祝同总是待若上宾，宴请、恳谈、接送，视旧日友情为重，相处甚欢。

可是，今天，皖南上空战云密布，国民党对新四军的大包围已经形成。人虽依旧，但各事其主，顾祝同在盘算，如何与叶挺对话为好。他心里很明白，“委座”对新四军的态度很明朗：不走要打，走，也要打。看来叶挺是凶多吉少。

顾祝同的心情是复杂的，作为老同学，他为叶挺惋惜。一想到同学之间将要兵戎相见，他感到痛心。可是，他自觉无奈，他感激蒋介石对自己的器重，又惧怕蒋介石笑容后面那双阴沉的眼睛。他不禁想起不久前的一个夜晚。

夜幕中，重庆一架军用飞机徐徐降落在上饶的军用机场。机门打开，一位戴墨镜的青年军官步下舷梯。他叫宋白升，是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贴身副官。此行的目的是送蒋介石签发的《黄河以南剿共作战计划》的密令。

宋白升带来了徐永昌的绝密信一封：

墨三兄：

奉委座旨意，来函交待一二。此次剿匪要绝对

保密，此乃成功之保证。望你部做到：一、作战命令一律由可靠人员护送，禁止用电报、电话方式传

递；二、尽一切努力稳住叶、项；三、先做部署，围剿部队开进时间听候委座命令；四、为保密起见，此次作战命令部署、方案只传达到师长。泄密者可先

斩后奏。另外，抓紧严查潜入国军内部共党嫌疑分子，如发现，不论职务高低，坚决除之，决不手软。

“绝对保密”，“泄露者可先斩后奏”，“如发现，坚决除之，决不手软”，这阴森森的话语，令顾祝同不寒而栗。他顾不得许多，只是在心中默默地重复着：“老同学，我多次劝你不要跟共党走，可你一意孤行。事到如今也不能怪我了”。

“叶将军到”，随着侍卫兵的喊声，叶挺步入客厅。

叶挺身着笔挺的细呢中将军服，足登闪亮的高统军靴并配以银色马刺，

雄姿英发，神采腾飞。顾祝同迎了上去，握手寒暄。

“希夷，这次劳您前来，不为别事，”顾祝同开门见山，“贵军刘少奇、黄克诚部在曹甸又起事端，委座颇为恼火。为防韩德勤再遭不测，特令你部由江南原地北渡，不得由镇江北渡。不知希夷意下如何？”

叶挺听罢一惊，脱口说道：“目前日军已封锁江面，你们是要借刀杀人，把我9000人送到日军虎口中去，这未免太狠毒了吧。”顾祝同见叶挺动怒，连忙站起身来：“希夷兄请息怒，我这不是想问问你的意见嘛。”

“我们要求改道从宣城到苏南。”叶挺不假思索。

顾祝同面带难色：“希夷，依你我之交情什么都好说，可是这条路是委座定的，怕不好改吧？”见叶挺面有愠色，顾祝同又连忙改口，“委座定的这条路你们确有困难的话，我可以将你们的意见转呈何总长和委座，争取改道走苏南。不过有一点请希夷放心，不管贵军走哪条路，我自当确保你们安全。”他见叶挺露出疑虑目光，便把胸脯一挺，“我以政治人格担保！”

叶挺一惊：“用政治人格担保？你不是有意稳住我吧？”

“咳，你放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顾祝同满脸真诚。

“好，墨公，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叶挺话题一转，“另外，我此次来还得要些开拔费、弹药、粮食。”说着，拿出一份《申请军需补给报告》放在顾祝同面前。

顾祝同想起叶挺每次来，不是要经费就是要子弹，便笑道：“希夷，我看你不是军长，倒成了后勤部长了。”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他知道叶、项之间的矛盾，叶是有职无权。但由于叶挺不愿在他面前诉苦，他也就不便言明罢了。

顾祝同扫了一眼申请报告，不由倒吸一口冷气。

……职军每月经费请增至17万元，米贴费增至5万元，并请批准加发医院经费2万元，修械所及兵站经费1万元，共计25万元。

“希夷，眼下国共磨擦日趋严重，拨给新四军一枪一弹都得报告委座，徇不得私情。”顾祝同严肃地说，“我私下给你增拨2万元开拔费。听我一句劝告，赶快走吧，走得越远越好。”

不难看出，顾祝同的心情十分复杂。此刻，他想起了进剿皖南新四军总指挥上官云相所报告的徽州会议情况：

与会人员均为师以上军官。剿匪具体安排已定，会后即付诸行动。各路将领宣誓，牢记委座旨训：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一网打尽，生擒叶、项。”顾祝同望着叶挺远去的背影，一言未发。

清晨，项英带着满脸倦容，疲惫地点燃了一支烟。这一夜，他几乎没合眼。想起那“训令”般的电文，一丝寒意又袭上心头。他隐隐地感到，离开了皖南，放弃了南进，他就会永远地离开历史舞台。

他曾不断地反省过自我。他知道，他曾有过并且现在尚存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威严和自信，在一定程度上来自历史的地位和权力。

他1920年参加革命，1922年入党。在北伐战争开始3年之前，就率领工人武装跟北洋军阀吴佩孚、肖耀南较量过。在党内哪个比他的军事斗争历史更早更长？他担任过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在中国工人运动方面，他位尊至极。他担任过江苏省委书记、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在党内历任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

在项英看来，党、政、军、工、农，哪一行他都干过，哪一行他都颇具经验。然而，他的历史地位和权力已经和正在发生动摇。

他想起一个月前那封发自中央书记处的电报：

一、同意叶过江后，以叶挺为华中新四军、八

路军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在叶挺未过江之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并决定以胡服为政委。叶、陈、胡统一指挥所有陇海路以南之新四军、八路军。

二、对外交涉，仍以新四军军部名义。

二、项英同志在皖南部队移动事宜就绪后，经

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

人事变动，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十分微妙而又十分敏感的事情。

他十分清楚，东南局、新四军已经没有他的位置了。随着皖南部队的撤离，他将永远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感到委屈，感到愤慨。

“经重庆来延安参加七大”，鬼知道，这七大会在什么年月才能召开。即使召开了又怎样？

伟大抱负搁浅，崇高权力丧失。对于项英来说，无疑是一种永远灰暗的无期徒刑。

在人类所有力量之中，恐怕要数求生的力量最为无穷。此刻，项英心中的阵阵寒意，已被一种求生的力量所驱散。求得政治生命的存活，眼下唯一的希望就寄托在如何选择北移的路线上了。

他在中央来电的右上角批示：

项已阅。请国平、子昆传阅。明日召开军分会，讨论北移路线。

1940年12月27日叶挺端坐在办公椅上，凝视着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挂轴：

正直之姿，刚毅之色；

琴心剑胆，慧眼柔肠。

下面一行小字：

愿与希夷共勉，书于民国28年仲秋。

这是顾祝同送给他的。

“唉，”叶挺长叹了一口气，“慧眼柔肠，这也许是遗传吧。”他想起了自己的幼年。

他的祖父叶沛霖，父亲叶承恩极端重视他的道德教育。规范教材就是一本《崔氏家传座右铭》，基本教义就是：“休论人之短，莫夸己之长，施恩不望报，受惠慎勿忘，隐心而后动，谤议庸何伤，虚荣不足慕，古诫勿违抗。”这种幼年教诲犹如刻字在石，终身不忘。它们滋生出他的许多优长，也孕育了他性格的悲剧。

叶挺的目光又移向挂轴，心中在想：顾祝同，但愿你能有正直之姿。

“报告，”秘书走了进来，怯生生地望着叶挺，终于说出了叶挺不愿听又不得不听的话，“项副军长指示，请您列席明日的军分会会议。”

“列席”这个字眼，不止一次地深深刺痛着叶挺那根敏感的神经。军长列席会议！这有什么错？不错，他是军长，但是，他不是党员。这支钢铁军队从它初创时起，就有了一个钢铁的纪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决不允许枪指挥党。不错，项英是副军长，但是，他是党员，是党的军分会书记。党的军分会会议，非党员只能列席。这怪谁呢？

但是，叶挺确实感到不痛快。项英就是党吗？叶挺总觉得项英的许多主张与中央背道而驰，他，一个脱党已经13年的人，应该怎么办呢？

云岭远离中央，应该说机要科是联结中央与军部的纽带。然而，尽管机要科近在咫尺，一个国民党任命的军长却不能涉足半步。他不能去看一看用叶、项名义向中央发了哪些电报，也不能查一查，中央对新四军的工作有哪些批评和指示。他没有独自发过一份电报，也没有独自收到过一份电报，他不知哪些应该看的他没有看，也不知道中央听到的是否是他的真正声音。项英有时也同他谈中央的指示，但他弄不清其中有几分是中央的精神，有几分是项英的本意。

项英非但不尊重、不信任叶挺，而且在工作和生活上也疏远叶挺。项英开始同叶挺一起吃小灶，不久项英跑到大食堂吃饭，丢下叶挺一人吃小灶。军部的干部也有意无意疏远叶挺。

军部有没有他，一切工作照常进行。除了亲临战场指挥作战外，他变得可有可无。在项、袁、周忙得不可开交之时，他却有大量时间骑马、照像、看书、养狗、陪夫人散步。

按着项英的旨意，原和叶挺紧靠在一起的参谋处，移到了项英住处。一次，叶挺饭后散步路过参谋处门口，从里面传出项英的声音：“共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实际上就是延安与蒋介石搞统一战线，军部与三战区搞统一战线，我与叶挺搞统一战线，团结他一起抗日……”项英的这套统战理论深深地刺痛了叶挺的心。叶挺忽觉一阵眩晕，他感到压抑、苦恼、委屈、痛苦。

于是，岩浆终于喷发。于是，也就有了如前所述的叶军长辞职的历史一幕……

往事如昨，虽几多怨怒，叶挺此刻不再去想。他知道，此刻新四军已危在旦夕，身为一军之长，还是要在军分会会议上作最后的努力。

1940年12月28日。

上午8时，项英来到会场，人已到齐了。

这两天，他是在迷茫、绝望中挣扎过来的。但是，他毕竟是挣扎过来了。他意识到新四军危险重重，更意识到自己的权力、荣誉将丧失殆尽，他怀着一线希望走进了会议室。人们见他步履沉重，满脸怅惘忧虑，不禁投以同情的目光。

项英像被人窥见到内心深处的秘密一样，勉强笑了笑说：“现在开会，同志们，中央的电报大家已经传阅了。我认为，中央的批评非常及时，非常中肯。今天我们集中讨论一下，到底选择哪条北移路线。”

这个问题近二、三个月来，成了军部领导开会的保留项目。每每讨论起这个问题，总是各说各的，常常弄得不欢而散。然而今天不一样，中央已经提出严厉的批评，况且距蒋介石规定的北移期限仅剩3天。

“先请叶军长发言。”项英以尊重的口吻发出了邀请。

叶挺没有反应，端坐在椅子上，挺拔的身躯犹如松柏，严峻的脸上毫无表情。

项英见状，十分不悦。但考虑到这次会议重要，需要有个良好、和谐的气氛，不宜一开局就僵住，便强忍住火气，转过身来对袁国平说：“看来军长正在思考，国平，你先说说吧。”

“唉，”袁国平长叹一声，“蒋介石、顾祝同逼我们直接北渡，想借日军

之手将我们消灭。走其它路线，他们又以违抗命令为由向我们开火。怎么办呢？我想还是分批偷渡，能走多少走多少。”听起来袁国平的话悲观至极。

“这是下下策，”项英有些着急，“要能走早走了。”

“那为什么不走！”叶挺已按压不住满腔愤慨，大声说道，“早一、二个月就在铜陵、繁昌勘察好地形，筹集了船只，选好了渡口，完全有把握渡过去，为什么不走？现在，日军的舰艇游弋江中，这条路已经行不通了。我反复考虑，北移路线以向东为最佳路线。”

“蒋介石已下令，不准我们向东，”项英恢复了以往的神气，口气柔中有刚，“如果我们硬要走，他们可以借口我们抗命打我们，况且苏南日寇正在扫荡。”

看来，会议不到 30 分钟就进入了“临战状态”。为避免像以往那样毫无结果，不欢而散，周子昆站了起来，以平静的口吻向作战科长说道：“志高，这几天敌情有什么变化？”他想把话题暂时引开。

李志高正在考虑自己的想法，冷不防政治部主任点了名，便仓促地说道：“敌情方面没有什么变化，大家知道，北面是鬼子，东面有 25 师和 108 师，南面茂林、三溪、旌德一带未发现敌情，只有 40 师一个营兵力在星潭。”

“那就走这条路，”项英腾的站了起来，大声喊道。这声音仿佛充满希望，听起来就像一个久久跋涉在浩瀚沙漠的人，突然找到甘泉一样，兴奋中挟带着疯狂。

看到周围的人那种惊诧的目光，项英自觉过于失态，便点燃一支烟，以稍稍平静一下难以平静的心情。

他继续说道：“志高的话倒是提醒了我们。既然向东不让走，向北不能走，那么我们就应该向南走。”

“向南，向南！”项英如同受到电击一样，浑身在颤抖。两天来压在心头的愁云顿时消失。灵感竟是在绝望中产生的，这灵感如果发展、扩大，就会变成希望，就会成为现实。

灵感，是长期思索的结果，是长期积淀的能量喷发。

“同志们，向南走，向南绕道茂林、三溪、旌德，向苏南转移。”项英坚定地说着，出现这种念头，连他自己也觉得过分突然。

“这条路重庆、延安都不同意。”周子昆平静地提醒着项英。

“向南，这条路线我们曾经研究过。”项英继续说，“蒋介石逼我们向北，目的有二，一是避免我们增强对韩德勤的攻击力量，二是想让我们在日军的炮火之下葬身江底。可是，我们偏要向南，他不打，我们安全，他要打，我们就到黄山、天目山打游击去，开辟一个新天地。责任完全由蒋介石负。”项英仿佛看到黄山山脉中新四军健儿的战斗身影，仿佛看到自己仍以新四军政委的身份去出席党的七大。没想到“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南进计划竟在绝望中再生！

“向南，看起来安全主动，实际上危险最大。”叶挺铿锵的声音把项英从幻视中拉了回来，“去上饶找顾祝同谈判的时候，我和志高同志顺便勘察过这条路线，群山之中，要隘遍布，包围容易突围难……所以我考虑还是应该向东。”“对，”周子昆附和道，“我看军长的想法比较稳妥。”

人的情绪非常古怪。心理学分析表明，逆反心理不仅仅易产生于青少年，更容易产生于重权在握的高层领导人中，他们的任性与固执，是权力与尊严的象征。如果叶挺、周子昆一致同意向南，项英很可能提请大家，研究

一下不利的条件。然而现在，叶、周的反对，反而使项英下了决心。他看了一下手表，已近饭时，便宣布会议休会，下午继续进行。

南进计划峰回路转，曙光在前。项英带着无比的畅快离开了会场。他心里很清楚，项英决定的事情现在已经无人敢推翻了。能够和他直言相抗的陈毅走了，敢与他据理抗争的张云逸、邓子恢和谭震林也都走了。使他最为恼火的是叶挺，但叶挺有个弱点，不是共产党员，不具备与他抗衡的条件。

既然向南，就应该把南线的情况再进一步了解一下，项英懂得，情况越明，决心才能越大。于是，他拿起电话，接通了侦察科，询问南线茂林地区的敌情变化。一位侦察参谋回报：派出的侦察人员尚未归来。

三天前的夜晚，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使上官云相从梦中惊醒，第三战区参谋处长岳星明压低嗓音，十分简明地通报：据可靠消息，某方将有突然行动，为防不测，顾长官命令，速作准备，各防堵部队均进入临战状态。

上官云相感到事情非同小可，遂紧急部署，拟就电文，连夜发出：

宁国。第40师师长方日英：

特急密

长官电示：某方将有突然行动。特令你部，接电之时，立即于12月27日行动，12月31日抵胡乐司，开赴三溪、星潭一线，实施防堵。对部队可佯称回后方休整，加紧赶修工事，并迅速向云岭方向派出便衣侦察，早悉某方动向，务须迅速、机密，勿泄意图，以免给对方以口实。切切此今。执行情况，仰即遵办具报为要。

上官云相

世引

方日英接电后，清点人马，风雨兼程，沿青龙山脚，直奔星潭……

云岭。

下午，军分会会议复会。

项英脸上泛着红晕，清了清嗓子继续主持会议。看得出来，他的情绪比起清早来要好得多。

“同志们，现在继续开会，”项英环顾一下四周，发现周子昆没在会场，便转身询问李志高。李志高回答：“周副参谋长因病缺席，他有些发烧，回去休息了。”项英心里一沉，有些不悦，但转而又觉得轻松起来。周子昆病假缺席，更没有人兴风作浪了。于是，他稍稍提高了嗓音：“同志们，大家还有什么意见？如没有意见……”

“咚咚咚！”叶挺的手杖在敲击着地板，这敲击声打断了项英的话。叶挺站了起来，大声说道：“我不同意，向南取道茂林，是犯了兵家之大忌！《孙子兵法》说的好：‘凡兵，以正合，以奇胜’。顾祝同、上官云相，在东面屯兵严阵以待，而在南面却留一个营兵力。”

这是诱我们上钩。如果我们向南，他们的机动部队方日英部会出奇兵至茂林、星潭一线，打我们伏击。况且，南面山多河流多，军部机关目前病号增多，宣传部长朱镜我胃出血，组织部长李子芳刚动过手术，还有一些女兵没有经过严格的山地训练，走山地一定有很多困难。”

叶挺话音刚落，会场开始乱了起来。项英有些不耐烦，大声说道：“山多有什么不好，我们新四军就是靠‘山’起家的，现在怎么怕起‘山’来了。只要顾祝同朝我们开枪，我们立即分散打游击，再当几年山大王有什么了不起？！”他看了看手表继续说道，“中央要我们自己制定方针，一再批评我们

行动迟缓，同志们也说北移路线制定得越快越好。现在时间这么紧迫，会议不能开得太久。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我们就决定走南线。大家看什么时间出发为好？”与会者再一次领略了项英这种独断专行的作风，会场沉寂了。项英见大家不表态，便果断地说道：“我看，先让大家安心过个新年，元月2日、3日作出发准备，铜陵、繁昌前线各部队秘密集中到云岭、北贡里地区，元月4日出发，各部队由原地突然南进。”

“我想，是否先呈报中央，”袁国平提出建议，“待中央批准后……”

“给中央的报告晚上即可拟出，”项英打断了袁国平的话，“我看中央不会不同意的。”项英看上去胸有成竹，但心中却在盘算着如何向中央报告。

开了一整天的军分会会议结束了。

周子昆躺在床上。他感到头痛眼晕。军分会会议那种气氛仍在眼前萦绕。

参谋长走后，他实际上担负着参谋长的重担。可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尤其是重大军事问题上，他却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他曾感到过压抑，但又时常告诉自己，要全面地看待每一个同志。他觉得，项英同志的家长制作风是很严重的，这与项英同志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但是在中国这块有着几千年封建历史的国土上，家长制作风已经植根于很深的土壤之中。况且，家长制作风的形成也是有着许多因素的。项英同志在新四军中的崇高威望是人所共知的。他平易近人的群众工作作风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曾使许多战士感动。几年来，他把自己的薪水全部交了公。每天勤劳不倦地处理着繁杂琐碎的公务，事无巨细，每必躬亲，从未有过完整的睡眠。新四军组建以来，项英同志几乎拿出了全部的心血和精力，把那些来自八省的“山大王”们改造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的正规部队。战士们爱戴他，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这种爱戴，如果不能正确对待自己，就必然形成独断专行的领导作风。

周子昆尽量用公正的态度去评价项英，他希望项英在新四军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拿出一个极其负责任的北移计划。然而，当他了解到下午军分会会议情况及最后的决定时，不免生出几许失望。

12月29日晚，侦察参谋将一份侦察报告呈在项英面前：

星潭、三溪地区发现40师方日英部大量部队。

项英扫了一眼，不屑一顾：“一个小小的40师算得了什么，南线行动不变。”他在专心思考如何向中央报告。12月30日，李志高将拟好的行军路线图交给了项英，项英指示：请军分会成员及军长传阅，暂不报中央。

1941年1月1日，在千家万户辞旧岁的欢声笑语中，项英终于起草了给延安的电报。

毛、朱、王并胡、陈：

最近情况与我们的行动：

（一）自我抗议电后，顾即复电解释：并非改道，而是增辟道路；我又去电，要求主力经苏南，顾复

电只允许一个团主力，其余仍经江北。

（二）战区联参于31日晚，赶至军部，商量要求，意20万款10万子弹可办到，今又赶回泾县与顾商妥，明后日前来。

（三）现彼方军队正在调动部署，尚未完毕，并增79师40师到太平旌德一带，其计划为封锁围歼我军，估计彼怕我先动。故事缓和。

（四）铜繁江边增加两只兵舰汽艇，不断梭巡，少数人也不能偷渡。



（五）我们决定全部移苏南，乘其部署未定即突进，并采取作战姿态运动。发生战斗可能性极大，我们如遇阻击，即用战斗消灭之，遇强敌则采取游击绕圈，至万不得已时，分散游击。

（六）我们已不等其子弹款项，准备立即行动，一切准备完了。如中央有指示，请于明日（2号）最迟3号电告，否则，我们行动后，联络恐很困难。请转告周恩来、叶剑英。

电报以新四军名义发出，即没提28日军分会会议这样重大的问题，更没提最关键的路线问题！

项英在搞文字游戏，与中共中央开了个大玩笑！1941年1月3日，毛泽东、朱德联名致电叶挺、项英：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行动，是完全正确的。

项英阅后，欣然提笔，在电文右上角批道：项已阅。请军长阅后，将此报内容，下达各团、教导总队及军直各部处，叶挺终于看到了非常有限的中央来电，然而，他却非常失望。

中央复电已喻晓全军——军部的计划是完全正确的。

### 3

1941年1月4日。

清晨，项英比往日起得都早。在组织有关人员焚烧了一些文件后，他的目光又落在新四军《抗敌报》的长篇社论《临别之言》之上。就要离别这艰苦奋斗3年之久的皖南大地，他的心头别有一番滋味，不禁想起宋代婉约派代表词人柳永的名句：“自古多情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

窗外的苍穹，彤云密布，就要下雨了。这阴霾的天气给项英心头又笼罩了一层阴影。然而他来不及去整理此刻纷繁杂乱的思绪，也不想留连于“今霄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那种悲凉意境，只想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只想在这危机四伏的紧急关头，为全军带来一缕光明。

他重新审视了一下行军路线序列，然后下达了两项指令：一、各纵队必须在5日拂晓前到达指定位置；二、叶、项、袁、周联合署名的《告皖南同胞书》要尽量多印，广为散发。

下雨了，蒙蒙细雨中，成千上万的人从罗里、云岭、新村、白果树等地涌向新四军驻地，皖南人民以他们特有的方式来为新四军送行。群众杀鸡宰猪，家家摆开大小宴席，为即将离去的新四军战士饯行。一只小猪崽想躲过这场屠杀，但却没能幸免，它死在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汉的屠刀下。老汉流着泪水对阻拦他的战士们说道：“孩子们，你们走后，国民党军队就要来抢粮抢猪，不如把它杀了，表表我们的心意……”老汉哽咽了，泪水与雨水一同顺着布满皱纹的脸颊向下流淌。战士们再也抑制不住，风雨中，任凭泪水挥洒。战士拥着群众，群众拥着战士，千叮咛万嘱托，说不完的道别话，流不尽的离别泪，叙不完的军民情。

皖南风雨骤，山川同一哭……

下午6时许，皖南新四军部队告别了云岭的父老乡亲，低吟着“别了，

三年的皖南”，散发着《告皖南同胞书》，在风雨中踏上了征程。

军部将 9000 人马编成 3 个纵队，分三路进发。

第 1 纵队为左路，辖原新一支队老 1 团和新 1 团，约 3000 人。傅秋涛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赵凌波任副司令员，王槐生任参谋长，赵希仲任副参谋长，江渭清任政治部主任，由土塘到大康王集中，通过求岭向榔桥行动。

第 2 纵队为中路，辖原新 2 支队老 3 团和新 3 团，约 2000 人。周桂生任司令员，黄火星任政治委员，冯达正任副司令员，谢忠良任参谋长，钟德胜任政治部主任。由贡里到凤村集中，经高坦向星潭行动；第 3 纵队为右路，辖原第 3 支队之第 5 团和军部特务团，约 2000 人。张正坤任司令员，胡荣任政治委员，黄序周任参谋长，吴溪如任政治部主任。纵路部率第五团达章村、溪口和茂林附近地区集中，其特务团到铜山地区集中，准备控制樵山岭、大麻岭，佯攻太平，掩护大部队前进。

军直属队及教导总队约 1000 余人跟随第 2 纵队行进。跟随军部机关一起行动的，还有中共中央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

雨越下越大，风越刮越猛，天地浑然一体，漆黑一片。部队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抵达章家渡时，一向平静的青弋江却奔腾咆哮、浊浪滔滔，猛涨的江水使预先架设的浮桥变短了。万不得已，先头部队奋力加长了浮桥。然而，不同建制的部队拥挤在桥头，叫喊声、器械碰撞声伴着风声雨声乱成一片。刚刚通过千把人，浮桥便断了。战士们徒步过河，在寒风中战栗，在冰水中发抖。

风雨交加，天怒人怨……

与此同时，国民党 7 个整师、8 万余人，遵照第 3 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第 32 集团军总司令兼前线总指挥上官云相的命令，正日夜兼程向新四军皖南部队进逼。

1941 年 1 月 5 日。

经过一夜艰难跋涉，战士们又冷又饿，极度疲劳，40 公里竟走了 8 个小时。天明后，新四军军部抵达茂林以南的潘村，第 1 纵队抵达大康王，第 2 纵队的老 3 团和新 3 团到达凤村，第 3 纵队的特务团到达铜山，5 团到达章村、溪口和茂林附近。

项英望着疲惫的部队，脸上布满阴云，军部北移第一天就碰上如此恶劣的天气，出师不利。于是他决定在茂林附近地区休整一天。

茂林是个大集镇，这里的人民对新四军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当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7 军团长寻淮洲的遗骨就安葬在这里。1938 年 5 月，陈毅率领 1 支队去苏南路过此地，为寻淮洲修墓立碑。今天，当新四军疲惫的步履踏碎茂林清晨时，镇子被唤醒了，顿时热闹起来。人民为新四军的到来而忙碌着，街两旁的皖南小吃发出了诱人的香味：咸煮的花生、油炸糍粑，糖炒板栗、五香鸡蛋……应有尽有。

皖南新四军被茂林的热情融化了。军部决定晚上举行军民联欢会，一扫前一天的沮丧情绪，鼓舞士气，以便迎接以后的艰苦日夜。战士们走上街头，散发着《告皖南同胞书》，为乡亲们担水、挑柴。文化工作队的同志们将一张张宣传抗日的红绿标语贴满街头。

晚上，军民联欢会在茂林祠堂举行。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演出了精彩的节目。会场内外掌声、口号声、欢呼声浑然一片。茂林圣公会会长陆绍泉老人致欢迎词。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代表新四军致告别词：乡亲们，我们

新四军以民族利益为重，忍辱负重，委屈求全离开皖南，进军敌后，在前进的道路上，纵有千难万险，我们也誓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而斗争。乡亲们别难过，我们一定会回来的。

热烈的气氛中渗透着几分悲壮。

下午6时，国民党40师师长方日英接到上官云相电话命令：

即派有力部队，星夜向湾滩、章家渡、茂林一

带搜索，限明（6）日12时前具抵。

方日英放罢电话，立即命令118团一个连由巧峰镇出发，经湾滩向章家渡方向搜索前进；120团一个连由星潭出发，经丕岭向茂林搜索前进；119团驻观音桥之一营，在加强对左侧警戒的同时，派出侦察小组向通往茂林、铜山各道路搜索。国民党144师主力，则在龙门、天都山、厚岸一线构筑工事扼守。

同时，上官云相命令参战的7个师从不同方向继续向茂林一带逼近。

皖南新四军在茂林地区休整了一天，消除了疲劳。然而却给国民党进剿部队赢得了紧缩包围圈的时间……

1941年1月6日。

拂晓，军部到了潘村。

项英面前摆放着2份敌情通报：

一、先头部队老3团3营向高坦方向搜索的一

个排，与国民党军40师120团向茂林方向搜索的一个连，在高坦附近遭遇，激战约2小时，互有伤亡。

二、特务团在麻岭遭遇国民党40师119团搜索部队，激战时许，俘对方7人。据俘虏供称：新7师已占领云岭，52师、108师抵达巧峰镇沙河里，144师和70师已从南面向茂林逼近。

项英看罢，不禁一怔：前几天侦察，这里只有一个营，怎么枪一响竟出现了7个师？他回头对李志高说道：“恐怕情况有诈，应马上派出侦察人员进一步核实。”“现在已经来不及了”，周子昆看了一眼敌情通报。严肃地说道，“情况很明显，对方已经布下了口袋让我们钻，我们中计了，早知道这样……”周子昆想继续说下去，但又一想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于是缄默了。

项英知道周子昆要说什么，便争辩道：“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是迟了几天，没想到对方行动如此之快。”他看了一眼手表，然后对李志高说道：“现在情况十分紧急，敌情变化很大，立即通知各纵队司令政委来潘村开会，研究调整部署。”上饶。

顾祝同坐在太师椅上，听着副官在一字一句的念着蒋介石的最新手谕：查朱、叶各部，尚未遵命令向黄河以北转移，决强制执行之。第3、第5战区并用军政党综合力量迫其就范。

顾祝同站起身来，走到皖南军用地图旁。透过地图，他仿佛看到老同学叶挺在血雨腥风中涉足，在枪林弹雨中挣扎。顾祝同犹豫片刻，转过身来，向副官口授给上官云相的电文：

叶、项不遵守命令，以主力由皖南渡口就指定

位置，乃擅率驻皖南所部于4日晚开始移动，企图窜据苏南，勾结敌伪，挟制中央。似此违背命令，自由行动，破坏抗日阵线，殊堪痛恨，为整饬纪纲，贯彻军令，对该军擅自行动部队决予进剿，仰贵总司令迅速部署所部开始进剿，务期于原京赣铁路以西地区，彻底加以肃清，并严督党政方面

配合军事积极工作，俾绝根株。又对该军化整为零，企图流窜时之清剿，并希预为计划及准备为要。

下午，潘村。

新四军军部召开各纵队首长会议。

项英在通报了当前敌情之后，望着大家，以沉

重的口吻说道：“现在敌情突变，形势比较严峻。请大家来研究一下，重新部署，准备冲出重围。”

与会者面面相觑，闭口不语。叶挺站起身来。不满之情虽溢于言表，但还是极力控制着自己，以平

静的口吻说道：“眼下刚刚与对方接火，敌情还是比较明了的，我的意见，部署不需作大的变更。”

叶挺话音刚落，周子昆、张正坤、傅秋涛、谢

仲良等纷纷表态，表示赞同军长意见。项英见状，没再说什么。

于是会议决定，部队仍分头前进：

以第1纵队出求岭；第2纵队4个营出丕岭，2个营出博刀岭，军直属队（含教导总队）仍随第2纵队行进；第3纵队（欠5团）出高岭，5团为全军后卫。

会议同时决定，各部队于本日黄昏行动，7日拂晓占领各岭，正午前会攻星潭，攻下后分两路攻三

溪40师师部，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以摆脱对方，急进苏南。

上官云相接到顾祝同的急电后，于下午5时下

令：

集团军于苏南及宣城方面对敌暂取守势，即以主力于7日拂晓开始围剿茂林、铜山一带匪军。第2游击区应严阵守备，迅速扫除该防区内之残匪及其兵站设施与秘密工作人员。右翼军（包括108师、52师）应以有力部队担任宣城至南陵间原阵地守备，以主力展开后山、湾滩、李庄、溪里凤、东流山之线，与右翼军切取联系，7日拂晓向茂林方面匪军攻击。左翼军（包括40师、79师、144师、新7师之一旅）任进剿之主办，经一部（新7师）扫荡青弋江以西之匪区内残匪，进出于南陵、戴家会、何家湾之线而占领之，以主力与右翼军联系，展开于屯仓徐、杨家、麻岭、小山、丁家、阴谭、小河口之线，于7日拂晓向茂林、铜山方面匪军攻击，并以一部守备章家渡，并沿无名河对茂林方面警戒以防匪军窜回老巢。62师控制于东岸附近待命。

国民党务师接到命令后，立即分头行动。茂林危在旦夕。

1941年1月7日。

拂晓，新四军各纵队经过一夜激战分别实行了第一步计划。

第1纵队占领求岭，并向东往榔桥河地区行进。

第2纵队老3团3营占领丕岭，军部紧随第2纵队通过丕岭，进驻岭下百户村。

第3纵队特务团占领高岭，并向星潭方向前进。

下午，百户村临时指挥部在汇总着各纵队的进展情况。

午前，第1纵队作战参谋满身伤痕赶到军部报告：第1纵队在横渡徽水河时，后续部队遭40师118团阻击，首尾不能相顾，一部分部队被迫向北突围，另一部分部队则占领磅山防御，纵队电台与军部失去联系。

第2纵队老3团3营与新3团1营分别向百户村南方和东侧出击，直

达星潭附近。第2纵队出丕岭与出博刀岭的部队发生误会，互相激战2个小时……第3纵队特务团在牛栏岭一带与40师119团遭遇。经激战，毙敌甚多，对方退至金龙冈一线，现特务团距星潭还有15华里。

项英额头布满汗珠，他不停地看着手表，而手表又无情地告诉他：会攻星潭计划已经落空。项英心里十分清楚，星潭是丕岭的出口咽喉，此乃通向三溪的必经之道，星潭如果拿不下来，整个计划将付之东流。

这时，叶挺和周子昆赶了回来，他们是在新3团进攻星潭受阻时，赶到前线了解情况的。他们带回来的消息并没有打开项英那紧锁的眉头：国民党40师120团2个营，正凭借3个地堡和各山头工事，以猛烈的火力封锁星潭路口。新3团打到距星潭3里时，由于地形不利，被火力封锁，虽组织十几个突击组进行突击，但未奏效。现已伤亡100多人，与敌形成对峙局面。

下午3时，由项英提议并主持紧急会议，重点研究如何夺取星潭。军部军法处科长杨帆带着警卫员担任警戒，叶挺、周子昆、袁国平、饶漱石、李一氓及各纵队司令政委出席会议。

项英在概略地介绍了全局情况后，向大家提出了询问：“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大家研究一下，对于星潭是攻还是撤？”

叶挺首先发言：“守备星潭之敌为40师120团的2个营，人数不多。因此，应以新3团和5团一营攻下星潭，然后继续向三溪、旌德方向前进。只有夺取星潭才有出路，后退就是灭亡。”

叶挺话音刚落，项英便不耐烦地说道：“不行！不行！我们的部队没有打过硬仗，40师是三战区的主力部队，战斗力很强。如果硬打，恐怕代价太大，伤员多了就更加麻烦。再说，即使付出代价冲过星潭，前面仍然是重重阻力，要付出多大代价，无法估量。”

会场出现了习惯性的沉默。大家都低头吸烟，会场烟雾缭绕。

会议中途，机要秘书送来毛泽东、朱德致叶挺、项英的急电：

你们在茂林不宜久留，只要宣城、宁国一带情

况明了后，即宜东进，乘顽军布置未就，突过其包围线为有利。

项英看后，一股无名之火燃在心头，不禁脱口说道：“这就是北移的结果，‘突过其包围线’，谈何容易！”中央来电，在与会者中传阅，引来的却是焦急的催促声：这个会开得太长了，你们快下决心吧。但是谁也不清楚，到底是项英下决心，还是叶挺下决心。

时间已是晚间9点多钟。星潭还在流血，新3团1营在副营长的率领下曾一度攻进星潭，然而后继无援，情况十分危急。

会场内，一双双焦灼不安的眼睛在望着项英，叶挺。

项英一时也拿不出主意，他在犹豫、他在思考，僵局，又是僵局，会场内的空气凝固了。

这时，百户村四周响起了激烈的枪声。这枪声仿佛在提醒着每一个人：9000将士的生命将断送在这无休止的会议上，这个从3点钟开到10点钟的会议上。

项英坐不住了，他站起身来，环视一下同志们焦虑的脸庞，然后指着地图作出如下最后决定：“放弃进攻星潭，部队回原路，改向西南方向突围，经高岭、出太平，靠近黄山，待机从铜陵、繁昌之间的荻港渡口北上。五团由后卫改为前锋，直扑高岭。”

就在新四军百户村会议举棋不定的时候，上官云相向进剿各师发出命

令：我精兵 5 师业已合围，若不能予以歼灭，使匪漏逃，实为吾辈莫大之耻辱，无以对委座及上官。

根据上官云相命令，国民党军加紧进逼：

52 师一部急驰榔桥河，协助 40 师作战；

79 师、144 师速向屯仓徐、茂林一带攻击；97 师一部占领铜山、高山坪、麻岭等地，主力向麻岭以东攻击；

新 7 师推进至戴家会、大里丁、何家湾一带。

.....1941 年 1 月 8 日。

“1·8”，据说是一个吉祥的数字。然而，它却将醒目的“悲惨”二字写入了新四军的史册。

新四军皖南部队在后撤，秩序一片混乱。

清晨，项英率军部撤至丕岭以西的里潭仓。

在一个草棚里，项英铺开了军用地图。他在考虑里潭仓的位置及下一步的行动方案。里潭仓虽说不大，但向东可出丕岭，向南和东南可出高岭、濂岭，向西可出高坦达茂林。项英果断地决定：向南开进，突出高岭，向太平方向前进。

中午，按照项英的决定，军部率部队向南开动。然而，行军 2、3 小时后，因向导带错路，在岔道口误向濂岭走去。此时，特务团已撤回濂岭，正与敌 79 师对峙。面对这种情况，项英决定，全体向后转，改向高岭前进。

百户村会议后，叶挺来到了 5 团，向 5 团团长江锦树下达命令：5 团由后卫改为先锋，走里潭仓抢占高岭，无论如何要坚持 3 天，掩护军部经高岭出太平，经泾县突围。完成任务后，分散突围，北移或留皖南打游击。

徐锦树受命后率部队冒雨沿崎岖小路由高岭进攻。一场激烈的争夺战在高岭展开。

军部向高岭方向急驰。项英感到，眼下最好的出路是迅速通过高岭，向太平方向突进。

然而，高岭方向枪声大作。通信员报告，5 团正与敌 79 师一部激战于高岭，目前军部无法通过。项英感到心头又压上一块巨石，脸上布满愁云。眼下没有什么去路，他下令军部折回里潭仓。

折腾了大半天，军部又回到了原始起点。沮丧之情荡涤着军部机关，士气大伤。

下午，顾祝同致电上官云相：

匪军经我各部围剿穷蹙一点，消灭在即，为期能于预定时间彻底肃清，毋使漏网起见，希望督励所部协同友军切取联系，努力进剿，务严令包围于现地区，即电到 12 小时内一鼓而聚歼之，勿使逃窜分散为要。

上官云相接电后即下令：

集团军决定明（9）日拂晓再行全线总攻，务于明（9）日正午以前将匪包围于现地区而聚歼之。

天黑了，夜幕又为皖南新四军减去一缕光明。疲惫的新四军军部在里潭仓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决定集合队伍出发，抢先经高坦、茂林方向突围，由铜陵、繁昌之间北渡。

山路狭窄，骤雨不歇，部队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拖着疲惫的步伐向高坦方向走去。当新四军赶至高坦时，敌 144 师已经占领茂林，其 430 团正向高坦猛攻，与新四军新三团展开激烈的搏斗。

夜深了，项英平躺在一座低矮的草棚里，草棚外风疾雨骤，项英感到一阵悲凉、一阵恐怖。

百户村会议后，部队经高岭向太平突围失败，使7个小时换来的突围计划成为泡影，也使项英的情绪低落到极点。一天来，他一会焚烧文件，一会僵若木桩，茫然的目光显示着他内心万念俱灰的悲观情绪。

此刻，他翻来覆去无法入睡。会攻星潭失败、误入濂岭、高岭不克、高坦前景难卜，这使他感到大部队突围已无希望。他叫醒了身边的周子昆、袁国平，压低嗓音说道：“现在的情况已经没有设想的那样乐观了，看来集中突围已不可能，不如能走一个是一个，这样目标小，总比大家在一起死好。”周子昆、袁国平听罢一怔，在这种紧要关头放弃部队，那不成了……。

项英看出了他们的意思，便安慰道：“这是革命的需要，是保留革命的火种，只要活着，总有东山再起的时候。”周子昆、袁国平没再吱声。

黑暗中，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一行数人不辞而别，离开了军部，离开了危难中的新四军……

半小时后，叶挺接到了报告：项英等人擅离部队，去向不明。

“逃兵！可耻的逃兵！！”压抑了多年的愤懑如火山爆发，叶挺脸色铁青，嘴角在抽动，全身在颤抖。

叶挺用手杖支撑着自己、支撑着那颗支离破碎的心，没想到，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党的化身竟然……不！这不是共产党员。叶挺突然意识到，此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

他集合起教导总队和军直机关人员，以坚定的口吻说道：“当前形势万分危急，敌7个整师正向我们扑来。同志们，献身的时刻到了。关键时刻，决不当逃兵！如果我叶挺后退半步，你们可以随时打死我”

“决不当逃兵！决不当逃兵！”群情激奋，士气大振，口号声压倒了狂风，压倒了骤雨。

口号声中，教导总队迅速增援新3团，向高坦阵地奔去……

1941年1月9日高坦。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在高坦徐家祠堂北面高地蛇山设署的临时指挥所里，叶挺口述致中共中央和中原局的电文：

今（9）日晨北进，又受包围，现在集全力与敌激战，拟今晚分批突围北进。项英、国平……于今

晨率小部武装上程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电报发出后，叶挺感到极度疲劳，他靠在一块岩石上，微闭双眼，想极力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

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了第一纵队8日情况报告：

第一纵队与对方五十二师在磅山激战，由于纵

队副司令员赵凌波坚持不向东出击，致使部队陷入重围。赵凌波于当日晚叛逃离队，去向不明。现纵

队正与敌激战……

叶挺感到神经将要崩溃，项英、袁国平、赵凌波……一个个人影在他眼前晃动，一会清晰，一会模糊，他们都是共产党员，他们都曾慷慨激昂，然而在全军危亡之际，他们又都在哪里……，叶挺不再去想，他只感到天地在倒转。

“叶军长，中原局来电了。”饶漱石走了过来，将中原局书记胡服的回电

送到叶挺面前：

项、袁……不告而去，脱离部队，甚为不当，即在以前他们亦有许多处置不当，违反中央的指示，致造成目前困难局面。望你们极力支持，挽救危局，全力突围走苏南，并直令2支队接应。

叶挺看后，突然觉得自己双肩无形中增加了沉重的压力，同时又感受到一种十分陌生却渴望已久的东西：信任。此时，他没有过多的感慨，而是毅然走进了指挥所。

高坦阵地，敌对双方在激烈争夺。教导总队加强新3团之后，连续打退敌144师的数十次轮番进攻，自己的伤亡也十分严重。

黄昏时分，叶挺决定甩开茂林之敌，带领教导总队、新3团及军直机关，向石井坑大康王方向开进，想从丁家渡之间渡过青弋江至孤峰，从铜陵、繁昌之间北渡。事与愿违，转移途中，不断遭敌袭击，混战不止，一夜间只走了20里。突围一再无效，计划一变再变……

同日，磅山失守。第1纵队数百人在傅秋涛、江渭清等率领下，先后突围，但到达泾县、宁国、旌德交界的山区老虎坪一带后，又被国民党重兵打散。

第3纵队特务团被迫撤离濂岭，向高坦退却；5团从高岭向东流山方向转移。

1941年1月10日。

经过一夜混战后，叶挺率部进入横直不过数里的石井坑。这里四面环山，东西四、五里，南北七、八里，沟里只有几个零散的村子，一百多户人家。北口的两侧一边是狮形山，一边是象形山。军部指挥所设在狮形山脚下的民房里。

叶挺望着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心中充满了凄楚，只有5团伤亡较小，尚存1000余人，其余部队建制都不完整。于是，他下达了3条命令：

一、5团占领石井坑周围的有利地形，构筑工事坚守，掩护部队休整；  
二、各单位就地收容失散人员，进行整顿，恢复体力；

三、政治部协同后勤部与地方取得联系，做好群众工作，购买牛、羊、猪和粮食，使部队吃一次好饭，改善一下生活。经过收容整顿，部队总共还有5000人左右。叶挺、饶漱石一边研究调整守备部队任务，一边商量如何摆脱现在困境。饶漱石望着叶挺渐消瘦的脸庞，不禁感慨地说道：“你毕竟是蒋介石任命的军长，况且与顾祝同又是昔日的朋友。如果现在与蒋、顾谈判，也许能解救全军于危难之中。”

叶挺听罢，不禁勃然变色：“蒋介石与我旧怨甚多，志不同则道不合，与他谈判，决不可能！”想起当初顾祝同以政治人格相担保的诺言，叶挺更感胸中怒火难平：“至于顾祝同，实为鹰犬之流，不足与谋。”

经过再三考虑，为挽救危局，叶、饶二人向中共中央连发两电。

电文一：

支持4日夜之自卫战斗，今以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即斟酌实情，可否由中央或重庆向蒋介石交涉立即制止向皖南进攻，并按照原议

保证新四军安全移防江北及释放一切被俘人员。

电文二：

我全军被围于泾县、茂林以南，准备固守，可支持一星期。请党中央



以周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

上下一致，决打到最后一人一枪，我等不足惜。一周后如无转机，则将全部覆没。盼立示。

项英躺在荒野上，望着灰浑的天际。远处零星的枪声时隐时现。8日深夜离开军部后，由于夜色苍茫，道路不熟，他们只在2个小山头转来转去，没有突出包围。现在，他也弄不清到底在什么地方。周子昆和袁国平背靠背地坐在一起，各自想着心事。

远处，一哨人马急奔过来。警卫员大叫一声“有情况！”

拔出手枪，引导项英等人躲在一座土丘后面。

奔来的，是刚从高岭撤下来的5团残部，为首的是团长徐锦树。徐团长见到项英等人，不禁一阵惊喜：“项副军长，你们怎么在这儿？难道军部已经……”项英一阵慌乱，竟不知说什么好。袁国平抢过话头含糊地说道：“夜间突围时与军部失去了联系，我们正在寻找军部。”

徐团长疑惑地望着他们，喃喃地说：“我们也在找军部，我们一起找吧。”

项英迟疑片刻，然后下意识地地点了点头。

项英低着头，跟着徐团长一行回到了军部。叶挺得知这一消息，怒火难平，大声说道：“可耻的逃兵，我不想再见到他们！”

项英、周子昆、袁国平羞愧至极，遂电告中共中央：

今已归队……临时动摇，企图带小部队穿插绕

小道而出……至9日即感觉不对……今日闻5团在附近，及赶到时与军部会合。此次行动甚坏，听候

中央处罚。我坚决与部队共存亡。

在饶漱石的反复劝说下，叶挺还是给了项英等人面子。项英见到叶挺后说：“军长，在危急关头，我本是不能离开部队的。这是我的错误，我已向中央报告，请求处分，听候处理。”在得知中原局1月9日关于要叶、饶挽救危局的指示后，他表示：“既然中央有命令，那你们负责指挥吧。”

项英意识到，他是归来的逃兵，权力再不属于他。以后将无人来请示他，往日的威风已不复存在。他叹了口气，垂下了头：“一场恶梦。”

上官云相放下酒杯，望着杯中殷红的葡萄酒自言自语：“现在还不是喝酒的时候，穷寇必追，除恶务尽。”他来到了作战室，下达了分区清剿计划：

残匪亡过半，三日未食。自昨（9）日晚起，战志全失，匪首无法掌握，已分头窜逃，星散于我包围圈内。各进剿部队，务于本日黄昏前将本区残匪清扫完毕。

1941年1月11日。

拂晓，国民党第108师、52师逼近求岭一带，与新四军第1纵队新1团遭遇，发生激战。新1团在团长张侄秀率领下奋力拼杀，终因寡不敌众被打散。

叶挺在石井坑临时指挥部里，分别致电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人：一、顽敌40、144、79、52、108各师，已于今日合围，预计明晨会总攻。

二、顾已下生擒我等之命令。

四、我们方针：缩短防线，加强工事，以少数

五、箝制多数，控制一个团以上兵力，选择弱点，俟机突击，给以大

打击，再做第二步，能突破当更好。

四、现士气尚佳，惟粮弹不齐，不能持久。

本军五昼夜不停与五六倍之敌激战于重围，计

划又告失败，现将士疲劳过度，只好固死一拼。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当即致电刘少奇、叶挺等：

希夷、小姚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希望全党全军服从叶、姚指挥，执行北移任务。你们的环境虽困难，但以游击方式保存骨干，达到苏南是可能的。

叶挺在危难中又挑起了更重的担子。于是，他重新调整了守备部队的任务：第3纵队老3团2营固守石井坑西南东流山北高地，向西防御；3营坚守石井坑北香炉墩高地，向西北防御。新3团在石井东北，以1营坚守白山高地，向东防御；以2营坚守狮形山以北二里路高地，向北防御；3营随团部在白山西侧高地。纵队指挥所在狮形山的东山南侧。

第3纵队的5团坚守石井坑的东流山，1营在左边的主峰东头山，2营在右，3营在中间，各守一个山头。

夜幕中，各部队在加紧构筑工事，准备迎接更大的风暴……

1941年1月12日。

清晨5时30分，上官云相电话命令：

各部队即刻开始向当面之匪进行拂晓攻击。

于是国民党军队对新四军发动向心合击。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皖南新四军的处境十分关心。作出了《关于新四军由叶挺、饶漱石负责领导的决定》，指出：一、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二、中央此决定向部队干部宣布。

同时，中共中央致电在重庆的周恩来、叶剑英：

望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放我东进北上，并向各方面呼吁，证明国民党有意破裂，促国民党改变方针，否则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东流山在流血。

国民党40师凭借着精良的武器装备，整营整团地向新四军阵地轮番进攻。5团的战士在敌军的炮火下顽强地抵抗，鲜血已染红了阵地。有的阵地已被突破，双方展开殊死的肉搏战。有的战士拖着打断的双腿，拉响手榴弹，同敌人抱在一起同归于尽；有的负了重伤，抱着敌人一同滚下山崖……

在国民党40师的强烈攻势下，新四军东流山及其以北高地失守。接着，白山等阵地和军部南北各高地相继失守。

夜幕又降临了。

然而，石井坑上空曳光弹交错，将天空变成了白昼。借着火光，国民党军步步逼近。

叶挺意识到，最坏的结局就要来临。他开始焚烧文件，眼光不禁落在刚刚收到不久的毛、朱、王来电上：

你们当前情况是否许可突围，如有可能，似以突围出去分批东进或北进（指定目标，分作几个支队分道前进，不限时间，以保存实力，达到任务为原则）为有利，望考虑决定为盼。周在重庆交涉恐靠不住。同时应注意与

包围部队首长谈判，并盼将情形告之。

突围！叶挺一直在思考的问题。这支英雄的部队，3年游击战争造就的一批骨干，生死存亡都系在这个早已不是共产党员的军长身上。

枪声越来越密，越来越近。

“任光！任光”，一阵撕人心肺的呼唤声传了进来，叶挺感到心口一阵紧缩，急步冲出指挥所。

任光中了流弹，呼吸微弱，流血不止，他紧握着叶挺的双手，嘴角微微颤抖，似乎要说什么，可是什么也没能说出来。叶挺悲痛地吼道：“敌人就要冲上来了，你们还等什么？快抬走！”几个战士急忙抬起任光向安全地带跑去。

望着他们远去的身影，叶挺禁不住泪光莹莹。

任光，是与冼星海齐名的著名音乐家。抗战爆发后，他毅然抛弃优越的生活、工作条件，携夫人徐韧跟随叶挺加入了新四军。他创作的《渔光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等歌曲曾风靡中国大地。不论城市、农村、国民党军队、共产党军队，到处都有他的崇拜者。不久前，叶挺曾决定任光夫妇离开皖南，可任光执意不肯……

任光静静地躺在地上。国民党军包围上来。

几位新四军战士为保卫这位伟大的音乐家，与敌人进行了一场殊死的肉搏，然而，他们一个又一个地倒下去，敌人冲上来。

几个国民党兵端着刺刀围住任光，凶狠地问道：“你是什么官儿？”任光抬起微弱的头，十分艰难地回答：“我……我……是《渔光曲》……的……作者……任……”

凶狠的士兵愣住了。片刻，他们不约而同地脱下帽子，向任光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远去。

苍茫的夜色中，任光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鲜血染红了身下的一片土地……石井坑终于失守了。

叶挺指挥部队边打边撤，退到了狮形山，并召开团以上干部紧急会议。会上，叶挺决定立即分散突围。叶挺、饶漱石等为一路，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为一路。其它各部队向四面八方分散突围，总的目标一个是苏南，一个是江北无为。

最后，叶挺望着跟随自己几年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坚定而又不无悲伤地说道：“同志们，只要突出去就是胜利！留得火种在，不怕不燎原！祝同志们突围胜利！”

夜间零点。新、老3团十几个号兵以吹开饭号为突围信号，发出了分散突围的命令。

历史记住了这个时刻，被围困的皖南新四军，冒着枪林弹雨，开始了最后的突围……1941年1月13日。

袁国平从昏迷中醒了过来，他感到浑身剧痛，天旋地转。凌晨突围后，他先后4次负伤。由于失血过多，他已经很衰弱了。在他朦胧的记忆中，只有一些零零散散的画面：尸横遍野，血流如溪，枪弹呼啸，火光冲天……

几位战士抬着他，艰难地向前走着。他意识到自己生命的路程就要结束了。他微睁双眼，望着这些与自己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战士们，心里充满内疚和愧恨。“你们走你们的吧，赶快突围出去，不要管我了。”他真诚地说道，“你们冲出去一个，就是一颗革命的火种。”

“不！”战士们固执地回答，“袁主任，要死我们死在一起！”

多么好的战士，他们带着心灵的创伤和身躯的伤痕，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挣扎，而对领导指挥的失误却没有半句怨言。袁国平不禁感到心头一热，泪水模糊了视线。

此刻，他也许想用最后的力量回顾一生，也许想用最后的力量来总结这次事变的教训，也许想用最后的力量来向党中央作出检讨，也许想用最后的力量向身边可爱的战士鞠上一躬，然后真诚地说一声对不起，也许……

他努力使自己平静了片刻。然后，趁同志们不注意，用一生中最后的力量摸出手枪，向自己的头部扣动了扳机。

他死了，殷红的血从额头涓涓涌出，手中紧握着那支枪管微热的手枪……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要他们“向当局提出最严重交涉，如不立即解围，我们即刻出兵增助。

破裂之责由彼方担负。”

周恩来、叶剑英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重庆与蒋介石等人进行了交涉。

蒋介石表示：12、13日已2次令顾祝同撤围。

皖南大地仍然硝烟滚滚，鲜血如注……

中共中央又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抗议皖南包围通电：

我八路军新四军前受日寇，后受国军之攻击，奉命移防者，则遇聚歼，努力杀敌者，则被屠杀，是可忍、孰不可忍？特电奉达，敬恳中央立解皖南大军之包围，开放挺等北上之道路，撤退华中之剿共军，平毁西北之封锁线，停止全国之屠杀，制止黑暗之反动，以挽危局，以全国命。

叶挺率教导总队及军部工作人员，一路激战，连夜翻过火云尖，拂晓抵达大康附近的西坑。

一缕阳光透过浓密的云层洒向大地。山脚下，一个人高举着白旗边喊边走过来：“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自家人不打自家人啊！”来人走近后，自称是国民党108师644团2营的排长。他气喘吁吁地说：“我是108师的，请你们派一位代表出去商量办法。”

面对这种情况，大家面面相觑，将信将疑。教导总队决定派敌工部长林植夫代表前去接头。林植夫暗想：108师过去同新四军的关系处得比较好，也许他们会让一条路给新四军。

于是决定出去试一试。

半晌，不见林植夫返回。

饶漱石决定，再派军部秘书处长黄克诚前去谈判。……

1941年1月14日。

延安。

毛泽东在注视着皖南。

中共中央在注视着皖南。

毛泽东在焦急地等待着皖南的消息，他已经连续发出电文，向叶挺通报，向叶挺询问：接周恩来电称：“蒋12日、13日两次电令顾祝同撤围，并允走苏南”等语。特达。望你们再坚持二、三天就有办法

（一）蒋介石已令皖南停战撤围，究竟是否停战，望即告。

（二）如未停战，望鼓励全军，定有办法。

（三）我军死伤多少，被俘多少，死伤及被俘干部姓名、官级，望查明速报，以便向蒋交涉。

在毛泽东心急如焚的时候，传来了使他失望的消息：“上官云相 13 日未时（13 至 15 时）解决我 7000 余人，另有 1000 余人已命坚决解决。”

毛泽东仿佛看到在血泊中拼力挣扎的新四军，仿佛看到叶挺在绝境中向党中央伸出呼救的双手。他悲愤难平，立即致电周恩来、叶剑英：

……现在不是走何路线问题，而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攻击，即将全军覆没，请立即要蒋下命令停战撤围。

西坑。

弹痕累累的新四军军旗在寒风中抖动。

军旗下，伫立着一群同样累累伤痕的士兵。

士兵群中，挺立着叶挺那高大身躯。他的细呢中将军服上布满弹洞、泥浆和鲜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在憔悴的脸庞上闪着光芒。

他已经组织手枪队向 108 师 644 团阵地进行多次猛攻，但终未能冲出坑口。

“叶军长，”饶漱石走了过来，“你是否可以到三战区与顾祝同谈判，让我军指战员能下山回苏北？”

叶挺注视着远方，缓缓地说道：“我现在是败军之将，身无一卒，根本没有谈判的条件。我是坚决不能去的。大革命失败后，我离开党已经 10 年，这是个惨痛的教训，我是深刻记取的。”

饶漱石望了一眼疲惫的士兵，转过身来说道：“不是你自己要去，是党派你去的。我自应向党中央报告。现存的同志中，比如李一氓、钱俊瑞、余立金、张元寿、王聿先等同志，只要有一位能冲出去回到部队，都可以向党中央报告，证明是党派你去的。”

党，在叶挺心目中的形象是圣洁的。但叶挺也看到了一个个党的败类。他在犹豫，犹豫中想起了党中央的来电中曾有“应注意与包围部队首长谈判”的指示，于是果断地说：

“如果是党决定派我去，我就服从。”

叶挺派人带着他的名片下山去找 108 师联系。傍晚，山下来了约一排人，为首的打着白旗，自称是 108 师副官处主任，一边走一边喊：“我是 108 师的，是奉师长之命请叶军长下山谈判的。”

52 师的巡逻队也上来说：“我们是奉 52 师师长之命请军长下山谈判的。”

叶挺的耳边回荡着上官云相的声音：活捉叶挺，赏金十万……活捉叶挺，赏金十万。

夕阳西下，暮色苍茫。

苍茫的暮色中，叶挺带着一行 12 人向山下缓缓走去……

史载：

1941 年 1 月 14 日晚，战斗基本结束。皖南新四军 9000 余人，在国民党军 7 个整师、8 万余人的围歼下，除千余人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

4 重庆，黄山别墅。

蒋介石面前，摆放着刚刚送来的《皖南剿匪情况报告》：

……皖南剿匪于 6 日开始战斗，13 日战斗基本结束，14、15 日清扫战场。

皖南新四军 9000 人，被击毙 3500 人，俘虏 4276 人，逃窜 1000 余人。

军长叶挺被俘，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被击毙，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周子昆在逃……。

蒋介石看罢，心头一阵狂喜。

他抬起头，对着兴奋得发抖的何应钦说道：“皖南新四军被歼，是全党之大喜，要好好庆贺，重奖有功人员。”

“委座，”何应钦说道，“此事墨三已有考虑，40 师师长方日英晋升为副军长，52 师师长刘秉哲升为军长，唐明昭作战不力撤销副军长兼 144 师师长之职。”“很好，”蒋介石感到满意，“奖罚要明，军纪要严。对上官的 32 集团军要重重嘉奖。”

“另外，”蒋介石话锋急转，脸色沉了下来，“皖南的事情，共产党是要大作文章的。”

要立即把拟好的命令发布出去，先堵住毛泽东的嘴。同时要严格控制新闻机构，严格审查每一份稿件。”

1941 年 1 月 17 日，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名义颁布的解散新四军命令：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自上月以来，在江南地区集中全军，扰乱战局，阴谋不轨。

本月自泾县向南移，竟于 4 日胆敢明目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我前方被袭各部队，对此不测之叛变，若不忍痛还击，不仅前线各军之将士无心自卫，而且整个抗战之国策，亦被其破坏无余。

瞻望前途，痛愤不已。为应付危急，伸张纲纪，不得不为紧急处置……新编第四军抗命叛变，劣迹昭彰，若不严行惩处，何以完成国民之使命，着新编第四军番号立即撤销，该军军长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处。

重庆哗然。

中原哗然。

全国哗然。

世界哗然。

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立即找到国民党方面代表张冲，向他提出严重抗议，愤怒谴责国民党一手制造皖南惨案，警告他们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并组织《新华日报》工作人员撰写皖南事变真相的社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国民党元老柳亚子、民主党人士彭泽民、黄炎培、张君勱、冷遯、李璜、梁漱溟、沈钧儒、左舜生、邹韬奋等人先后见面蒋介石，愤怒指责他的罪恶行径，要求蒋介石慎守孙中山的遗训，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立即撤销命令，释放叶挺，恢复新四军名誉。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专门驱车至黄山别墅，愤怒指责蒋介石：“你在皖南大动干戈，置新四军于死地而后快，难道不怕戴上破

坏抗战的帽子，难道不怕全国人民大众唾骂？难道不怕失去民心……”

全国知名人士的抗议电，似雪片般飞到重庆，声讨蒋介石反共行径，奉劝蒋介石改变反共立场停止剿共。

蒋介石瘫软在沙发上，几天来他口干舌燥、疲于应付、食宿不宁。

“Darling，”宋美龄柔声地走过来，“不要过于恼火，大姐等人不太了解真相。这件事，新四军是有责任的！江北韩德勤在曹甸被新四军包围了18个日日夜夜，为韩解围，也是迫不得已吗。等过几天，我再出去向各方解释解释。不知现在叶挺的情况如何，如果他能回心转意，对我们是十分有利的。”蒋介石干咳两声，要通了通往上饶的载波电话：“墨三呵，你要想尽办法说服希夷。转告他，我是非常信任他的。只要他回心转意，战区副司令长官的位置是他的。”“是，请委座放心，墨三定当竭尽全力。”

宁国通往上饶的公路上，五台军用吉普车鱼贯急驰。

叶挺闭着双眼，坐在第2辆车的后座上。车窗外尘土飞扬。

1月14日夜晚，叶挺一行来到108师师部，该师设丰盛晚宴接待，并没进行任何谈判。15日，叶挺被送到国民党嫡系52师。16日，52师用卡车将叶挺一行送到宁国上官云相指挥部。17日晨，叶挺乘上军用吉普车，在其他四台车的监护下，向顾祝同官邸驰来。

叶挺睁开双眼，望着车窗外暴风雨洗涤过的皖南大地，郁懣的心头布上几缕悲凉和愤慨。

昨天，在上官云相指挥部里，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紧随左右，如临大敌，寸步不离。叶挺完全意识到，昔日的座上客，现在成为阶下囚。然而，上官云相却殷勤而周到，满脸堆积着笑容。在丰盛的宴席上，上官云相高举酒杯，频频祝酒，并以老同学的身份向叶挺劝降，而得到的却是冰冷的回答，败将并不等于降将。

叶挺望着车窗外，在这片土地上，他率新四军战斗了3年。然而，这3年中，他确实感到过压抑和痛苦。自己的才华不能施展，时常感到有一副沉重的十字架压在心头。他想起了项英，想起了项英那种孤傲的神情，想起了项英离队返回时那副羞愧的面容。不知道现在项英在哪里，是死是活？他与项英终于分开了，一切都结束了。但谁也不会料想到是这样的分手，这样的结局。

叶挺感到一种莫名的解脱和轻松，似乎那副沉重的十字架已经被打得粉碎。

他长吁了一口气，继续凝视着遥远的天际。

他，国民党中将军长，乘坐着国民党军用吉普车，却不知去向何方。

顾祝同兴奋异常，在客厅里踱步。

“围剿”新四军已大功告成。1月15日，颇有心计的顾祝同致电蒋介石、何应钦，炫耀战功：经紧急处置，“兹已将新编第四军全部解散，编遣完毕”，并称新四军“蓄意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明白进攻我前方抗日军队阵地，危害民族，为敌作伥，丧心病狂，莫此为甚……”

眼下，他看着1月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脸上堆满得意的笑容。他心里很清楚，自己致蒋、何的电报内容，几乎被全文引用进“解散新四军通电”之中。看得出来，委座相当满意。

顾祝同更加兴奋，他决定大奖特奖有功人员，尤其对上官云相及其32集团军要特别嘉奖。

他抓起电话机，直接要通上官云相。

在对老同学进行了一番夸奖之后，顾祝同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对皖南新四军余部要严加搜捕，各地国民党机关要密切配合。为抓获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泾县、南陵等县要发动全县乡保甲长，挨户搜查，毋使漏网，并悬赏大洋 5000 元。

当顾祝同洋洋自得的时候，又传来令他十分满意的消息：国民党中央政府已批准奖赏 32 集团军总部法币 5 万元，奖赏对新四军作战的主力部队 25 军法币 5 万元。同时，蒋介石又密授机宜：对被俘新四军人员要加强政治攻势，对“执迷不悟”者要严加罚处。

早在 1 月 11 日，顾祝同就致电皖南行署和安徽省党部皖南办事处，批准成立皖南特训处，专门收容打散被俘新四军政工人员及地方被捕之革命志士。

在接到蒋介石的密令后，顾祝同紧锣密鼓筹划对被俘新四军的整训工作。在他的策划下，皖南地区成立了 3 个训练大队，专门收容被俘的新四军士兵。他电请重庆派人接收新四军被俘人员到后方“管训”，受到军令部的赏识，并由他主持这项工作。顾祝同经过反复比较，决定派陈淡如等 3 人任 3 个训练大队的队长。为了统一管理，他又调第 67 师少将副师长唐肃前往皖南，成立了“第 3 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唐肃任总队长，陈淡如任副总队长。这个“训练总队”后来逐步演变为著名的“上饶集中营”。

在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的皖南新四军战俘，在战场外又遭受着国民党的严重迫害，展开了一场特殊的战斗。

随着一声尖厉的刹车声，军用吉普车停在了顾祝同官邸前。车门开处，叶挺缓缓地走了下来。

顾祝同满脸笑容迎了上去，连连说道：“希夷吃苦了。”

叶挺走进客厅，环顾四周，不久前来谈判的情形历历在目，他耳边仿佛又响起顾祝同的诺言：用政治人格担保。就是在这政治人格的担保下，新四军 9000 将士被炮火打得七零八落。叶挺的眼里充溢着悲愤的泪水。

顾祝同见状，感到十分尴尬，忙令侍卫官设酒备宴。席间，顾祝同劝道：“希夷，只要你能回心转意，什么都好说。委座非常器重你，只要你发表个声明，将责任推给项英，就立刻委任你为第 3 战区副司令长官。”

叶挺愤怒地回答：我叶挺堂堂正正的人，要我自首决不可能。

叶挺怒不可遏，当即给蒋介石发出了抗议电：

……当今生死存亡之秋，举国军民团结一致对外之际，皖南事变突然爆发，举国瞩目。

凡我军民无不痛心疾首，亲痛仇快莫不如此为甚。三战区在日伪配合下乘我军北撤泾县之机大打内战，全力向我围攻，我军被迫应战，以寡敌众，损失惨重，以同室操戈不（1）无条件释放我军全体官兵，因部下听我指挥与其无关。

（2）组织军事法庭，澄清事变真相，惩办祸首。

（3）经法庭判决如责任攸归，罪有应得，情愿坐穿牢底，著书写作，以渡余年。义无反顾，临电泰然。

叶挺慷慨激昂，一身正气。顾祝同反复劝说终未得计，只好将叶挺送上囚车，押往李村监狱。

顾祝同劝降未果，蒋介石恼火万分。他扔下叶挺的抗议电，渐渐感到



事态的发展并不像预想的那样乐观。这些天来，除国内各党派、各阶层纷纷指责、抗议外，国际舆论也使蒋介石坐卧不宁。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居里正式向蒋介石声明：

……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方面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英国政府通过其驻华大使卡尔正告蒋介石：中国如爆发内战，只会加强日军的进攻。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十分关注。

苏联外交次长洛佑夫斯基请中国驻苏联大使邵力子转告国民政府：“勿做使敌人快心之事。”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重庆面见蒋介石，请他注意：进攻新四军“损害了中国的抗战力量，有利于日本侵略者”。

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苏联军事使团团团长崔可夫相继会见何应钦、白崇禧及其它国民党官员，暗示国民党如不悬崖勒马，将导致苏方停止援助。

日本，东京。

陆军本部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中将发表演说：

……蒋政权内部打仗，固然不能抗战，但日本决不依赖国共纠纷，而是依靠自己力量解决中国事件……。华北是日本人的根据地，蒋介石要驱逐华共共产党去华北，将破坏日本的利益。

对于国民党军队围歼新四军，削弱抗日的力量，日本方面是非常赞赏的，但是对蒋介石要把八路军、新四军赶到黄河以北的企图，日本方面又是不能容忍的。于是日军本部决定对蒋介石要给以颜色。1月下旬，日军集中5个师团以上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路以东地区，发动了河南战役。

国民党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溃不成军，一份份告急电报直飞重庆。蒋介石更加坐卧不宁。他气愤，他恨日本人不讲交情。他感到内外交困，不得不闭门谢客，思考着下一步棋子如何走。

延安。

一曲皖南悲歌，撞击着毛泽东的心扉。也许，在某种程度上，这位伟人承受着比其他人更为沉重的内心压力。皖南事变之前，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作了心理准备，曾一度力主对国民党进行必要的反攻，以制止他所预感的那种蒋介石全面降日的企图。然而，这位伟人毕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判断失误，蒋介石并没有全面降日。于是，伟人也同普通人一样，犯了一个他曾反复告诫全党要避免的错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1940年12月，美英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苏联宣布继续大量援华，这种有利的国际气候显然为中国的抗日战场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面对这种新的情况，尽管何应钦、白崇禧8日“齐电”再提中共军队北移事，尽管蒋介石9日手令限期12月31日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但是，毛泽东还是估计蒋介石“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此次严重投降危险已被制止”，“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虽然毛泽东认为“还不能说反共的高潮已下降了”，他还特别致电共产国际，希望共产国际了解国共关系的严重性质，可是，他对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理解，有着自己独特之处。他格外重视蒋介石政策的外部环境。既然蒋介石已经受到反日的英美势力的包围，那么，当然蒋介石日前不会有联合日本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可能。因此，毛泽东又把蒋介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

信蒋介石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然而，历史并没有袒护伟人，而是以其公正的面目同伟人开着玩笑：在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下，皖南新四军 9000 人马几乎全军覆没……历史有时会以细雨清风滋润和轻拂伟人浪漫的心胸，有时又会狂飚骤起，在伟人的胸海里掀起波涛千重。

此刻，无情的历史事实毫不犹豫地塑造了一个愤怒的毛泽东。他面对蒋介石旨在解散新四军的“1·17”命令，决心回敬以颜色。

他与朱德、王稼祥联名发出《在政治上军事上准备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的电文：

彭左、贺关、聂彭、刘邓、吕程、朱、陈罗、胡陈、周叶：

（一）叶项率新四军万人遵令北移，被蒋介石派七万余人包围于泾以南之茂林一带，自鱼至元已血战八昼夜，他们决与全军存亡。文夜虽有傅秋涛一部突出包围，但主力仍未突围，有全军覆没危险。

（二）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作全面大反攻，援救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

（三）除已令苏北、山东迅即准备一切，待命消灭韩德勤、沈鸿烈，同时，发出最严重抗议通电，并向蒋介石直接谈判外，我华北各部队须遵前令提前准备机动部队，准备对付最严重事变。

他致电彭德怀：

蒋介石这样干，有与我党破裂的决心，一定有帝国主义的指使，这或者是英美、或者是德意，但背景似以日德为多。蒋介石的计划是各个击破我军，先打新四军，后打八路军……，因此，现在已不是打退反共高潮问题，而是根本破裂问题，一切好转的可能性已经没有了……

他致电周恩来：

……我们决不能再取游移态度，我们决不能再容忍，我们决不能怕破裂，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错误。应告诉苏联大使和苏联军事总顾问：蒋介石 1 月 17 日命令是中国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始，是全面投降全面破裂的开始。苏联应当立即停止接济，准备后事，不然要上当的……

如蒋介石业已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破裂对付破裂；如蒋介石并未准备全面破裂，我们便是以尖锐的对立求得暂时的缓和。

日前让步阶段已经结束，蒋以为我们怕破裂，我们需表示不怕破裂。

他专门给共产国际写了一份综合、分析性的长电，说明新四军的转移和重新部署，同国民党长期谈判的前后过程；说明蒋介石背信弃义、不择手段使新四军上圈套的过程；说明皖南事变对共产党，对抗战和对华中地区造成了较大困难；同时指出挽救危局的方针。

毛泽东直接了当地要求苏联停止接济重庆武器，立即准备公开援助中共，特别是援助中共夺取兰州，因为只有夺取兰州，才能打通与苏联的通道，接取援助。而八路军如果没有飞机及攻城部队，夺取兰州及甘凉陕三州是不可能的。

苏联、共产国际对皖南事变是密切关注的。

他们在对国民党提出批评和委婉警告的同时，对中共中央的方针也表现出十分审慎的态度。

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

要严格注意把握政策。中共中央不可主动破裂国共关系，不可另起炉

灶，应将矛头指向亲日派……

苏联驻重庆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向周恩来表示：

日本不会进攻蒋介石，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的中心，因此，要对蒋让步，要缓和态度……

毛泽东十分清楚：共产国际对中共中央很不放心，他们生怕破坏了统一战线。

毛泽东认为，十分有必要向苏联和共产国际做大量的解释工作。于是，他要周恩来向崔可夫解释：

在目前情况下，要我们对蒋让步，是危险的。统一战线内须以斗争求团结，一味消极退让是不能保持统一战线的。目前是逼蒋向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因为进攻和破裂是蒋先发动的。

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接连举行紧急会议。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是，对在军事上是否进行全面反攻则表示异议。

中共中央认为：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两面夹击下，陕甘宁边区也必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更有利的时机。更主要的是，如果立即采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倒底。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

然而，共产国际的态度已十分明确：要利用日蒋矛盾，对蒋要让步，要缓和。

不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政策有多少不满，但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意见这时对中共的政策仍然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毛泽东等明白，此时国共两党面临破裂的边缘，中共明显地需要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帮助。特别是，如果缺乏武器及使用武器的技术人员，就无法实现夺取西南西北几个重要省份的战略目的。

1941年1月下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表露出对共产国际的不满，并阐明对蒋介石的根本对策：

……蒋介石已将我们推到和他完全对立的地位，一切已无话可说……然因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3个月来几经反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采取猛烈攻势，而军事上暂时还只能采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4个月或6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

政治上取猛烈攻势，军事上取守势，但不放弃攻势准备，体现了毛泽东以斗争求团结的一贯立场，也表明：中国共产党没有因为共产国际是上级领导而接受其不合时宜的政策。

蒋介石握着电话听筒的手在颤抖，对方传来何应钦几乎哭诉的声音：“河南告急，河南告急！日本人太没良心，我们替他们打新四军，他们却乘机兵分四路，向周家口、涡阳、南阳、泌阳进攻。宿县的日军已过淮河，占领永城。与何国柱、李仙洲激战，信阳的鬼子与汤恩伯在午阳激战。国军已损失三万人马，被赶到平汉路以西，我的内弟陈英才壮烈殉国了。”

蒋介石缓缓放下电话，无人知晓他在想什么。

他随手拿起刚刚送来的《新华日报》，一幅黑体通栏标题映入眼帘：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向国民党提出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

他大略地扫了一眼基本内容：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二、取消 1 月 17 日反动命令；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四、恢复叶挺自由，使其继续担任新四军军长；五、交还皖南新四军人和枪；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七、撤退华中剿共军；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毛泽东的胃口太大了，”蒋介石的心头布上一片愁云。此时的蒋介石，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蒋介石了。想当年，轻而易举发动了“4·12”政变，唤来腥风，呼来血雨，共产党几乎被满门抄斩。那时，有谁敢提出废止一党专政？可是现在，中国共产党有自己的军队近百万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政治舞台上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其政治主张已深入人心……

蒋介石叹了口气。在策划皖南事变之前，他曾预想到会遭到中共的指责，甚至在国民党内也会出现反对派。但是，蒋介石有着自己的逻辑，指责归指责，他不在乎那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指责，更何况，现在国民党内很难再找到杨虎城、张学良那样敢于“兵谏”的军事将领。然而皖南事变硝烟未散，国际国内便波澜四起，苏联出面调解，美英不断指责，国内大多数民主党派和各小党派等中间势力明显地同情共产党，连国民党内部的一部分抗日将领，也纷纷表示不满……

所有这些，却是蒋介石始料未及的。

如果与中国共产党全面破裂，苏联、美国的军事援助将会中断。蒋介石思前虑后，如坐针毡。

延安。

一盏油灯下，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至各中央分局、工委和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的电报：

……蒋介石在我们表示强硬立场之后，又遇敌人大举进攻，乃向我们提出廉价的妥协办法，允许华中我军限期北移及新四军归入八路军增编一军等条件，已为恩来同志坚决拒绝，最后派叶剑英同志回延商洽，今日已从重庆起飞，明日可到，蒋在危急时求妥协之心，已可概见。我们必须坚持尖锐斗争立场，不达到我们必要条件决不与之妥协。各地应将解决时局办法十二条广为传播，使社会各界人人知道，造成有利解决的社会舆论，是为必要。

几天后，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分析了蒋介石的处境：

……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解决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与他不利。

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会场。

蒋介石拖着疲惫的步履走上了主席台，会场响起零零落落的掌声。蒋介石用憔悴的目光环视会场，脸上掠过一缕颓丧的表情：中共代表果然没来出席会议。

抗战初期，在全国民主进步势力的强烈呼吁下，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民党、共产党、职教社、救国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等十几个党派组成一个咨询、协调各党派之间关系的机构——国民参政会，定于每年 3 月召开一次会议。今天，由于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毛泽

东、陈绍禹、秦邦宪、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拒绝到会。蒋介石很清楚，中国共产党是全国一大党，从数量上讲不能缺席；从政治意义上讲，中共也不能缺席，否则将意味着国共两党关系破裂。因此，会前，他曾亲自驱车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请周恩来做好协调工作，能够促使中共参政员按时到会。但是，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蒋介石必须答应中共提出的十二条，否则不出席会议。

蒋介石再次环视会场，觉得应利用这个机会缓解一下全国上下的声讨浪潮，在四面楚歌的窘境下走一步缓兵之棋。

他干咳两声，用沉重的语气说道：“对皖南发生的事情，我表示极大的痛心。在这里，我向共产党道歉。我一定调查清楚，严惩凶手、保证以后不再有剿共军事……”皖南泾县南容乡的崇山密林之中，项英疲惫地躺在一个人迹罕至的山洞里。他听着洞顶滴滴答答的水滴声，烦躁地闭上了双眼。

叶挺被扣后，上官云相立即下达了分区清剿的命令：“……各部要细密清扫战场，特须注意遗弃械弹及化装潜匿之匪军要员，勿使漏逃。”于是，国民党军加紧了围剿和搜捕。

这时，皖南新四军残部三三两两地分散隐蔽在各个山村和丛林中。军部的一些领导也都失散。项英同警卫人员李德和、郑德胜、夏冬青等五、六人一起。周子昆同警卫员黄诚在一起。军部作战科长李志高、侦察科长谢忠良同张益平、王本元等在一起。几天后，项英等同李志高、刘厚总等先后相遇。又过几天，项英一行十多人又与周子昆、黄诚等相遇。

分别数日，如历沧桑。项英见到周子昆后，二人百感交集，异常激动，都流下愧恨的泪水。项英痛心地说：“部队遭受这么大的损失，责任在我。突围出去回到中央后，我要作检讨。”二人决定，在石井坑暂住几天，然后向濂坑方向转移。

初春的皖南，乍暖还寒。项英一行冒着霏霏细雨，向濂坑走去。由于路滑，项英、周子昆都曾掉到河里。烤衣服时，大家看到项、周二分别带有大笔经费。

在濂坑，又零散地遇到一些指战员。他们都是由当地群众掩护下来的。项英每见到一位失散人员，心里就增添一份内疚。他不止一次地沉痛表示：“新四军这次失败，我是负主要责任的，把你们搞成这样子。将来到延安以后，我会向中央检查自己的错误。不管指责我是什么主义，我都接受。”

从濂坑石牛坞村的地下党处了解到，村后的赤坑山上有个蜜蜂洞，十分隐蔽，可住三四个人，于是项英、周子昆等转移到洞中。

蜜蜂洞，既没有蜜也没有蜂。它呈椭圆形，长6米多，宽4米，最高处1.8米，最低处不到1米。项英、周子昆住进后，还可以住两个人。于是，项英决定，周子昆的警卫员黄诚和副官处第三科的副官刘厚总住进洞内，他的贴身警卫员夏冬青白天在洞口警卫，晚上回到半山腰的一个草棚里睡觉。

他们在蜜蜂洞生活了二十多天。这期间，项英的心情时好时坏。按照他的指示，李志高派人在老乡的向导下侦察突围路线，重点摸清三个问题：

1. 从大王庄到茂林，国民党沿途驻的什么部队，部队的番号、兵力，驻扎的村子，岗哨的位置，晚上有无部队出来巡逻？驻茂林的那个师有多少兵力？
2. 从小河口过渡，晚上有没有国民党军队守渡口、查渡船？渡河地点水的深度、流速怎样？
3. 河的两岸有没有森林？是大山还是小山？有无村庄？

距离河边有多远？过河后能不能隐蔽？

同时，他们通过地下党买了布，每人做了一套便衣。筹集了必要的口粮。

渡江转移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不知过了多久，项英睁开双眼。他顺着洞口向外望去，夜幕已经悄悄降临。

洞里点着蜡烛，周子昆、黄诚、刘厚总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回到了洞中。

“今天应该是3月13日吧？”项英转过头向大家问道，得到的是肯定的回答。

噢，13日，在西方，这是个不吉祥的日子。项英心里在暗暗嘀咕。

“天很晚了，首长睡觉吧。”警卫员黄诚边说边为首长铺好了被子。

周子昆看了一眼手表，已经10点多了。他对黄诚说：

“小黄，你先睡吧，我们等一下就睡。”

项英和周子昆的心情都比往日轻松。经过这段时间的努力，转移准备就绪，只等寻机出发了。

俩人一边下棋一边聊着：

“找到了地方组织，去江北就快了。”项英长长叹吁了一口气。“是呵，只要不死，总会突围出去的。”周子昆充满信心地说。

棋没下完。项英站起身来，若有所思地说：“这次我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帐算回来。”

“首长，天不早了，快休息吧。”副官刘厚总殷勤地说道。

“好，厚总，你也睡吧。”项英看了一眼刘厚总，非常满意地睡下了。

在突围路上，刘厚总与项英等人相遇后，对项副军长忠心耿耿。一路携扶项英，有时背着项英渡河涉水。项英对他很是感激和信任，途中让一个排长给刘厚总换了一支崭新的驳壳枪。来到蜜蜂洞后，项英把刘厚总留在了身边，而让贴身警卫住在洞外。

山洞的地势外高内低，里面石壁上不断有水滴下来，地很潮湿，靠洞口则较干燥。为照顾首长，忠实的警卫员黄诚挨着石壁睡下了。洞内四个人睡的位置，从里到外依次是：黄诚、周子昆、项英、刘厚总。

夜深了，群山一片沉寂。

黑暗中，一双眼睛圆睁着。

刘厚总没有睡。

他是湖南耒阳人，贫苦农民出身。大革命时期在家乡是农运的骨干。大革命失败后，在当地打游击。抗日战争爆发后，他领导的游击队被编入新四军。他于1938年到延安抗大学习，1939年转到新四军教导总队学习，后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副官处任副官。

刘厚总翻了个身，望着洞口外夜雨朦胧中的群山，一丝凄苦寒意涌上心头：革命失败了，新四军完了，前途一片迷茫，路漫漫，魂归何处？

刘厚总悲观极了，他感到自己正在向万丈深渊坠下去，他想抓住一条救生的绳索，哪怕悬在半空，也能暂缓一下死亡的进程。

黑暗中，他在抓攀着，摸索着……

他没有抓到梦幻中救生的绳索，却触摸到身旁一件硬物——那支在微亮中闪着寒光的崭新的驳壳枪。

夜色越来越暗，四周一片漆黑，刘厚总的眼睛越来越亮，射出恐怖的

光芒。

他缓缓而坚定地举起了驳壳枪，对准了熟睡中的首长和战友。

几声沉闷的枪声过后，项英、周子昆、黄诚倒卧在血泊中……

当第一声枪响过后，黄诚便在睡意朦胧中去摸枕下的手枪，然而，晚了，接着两声枪响，他昏了过去。

周子昆仰面朝天，头北脚南，心脏停止了跳动，殷红的鲜血从胸部弹洞中涌出。这滚烫的液体与岩洞中冰冷的滴水融在一起，缓缓地向四处扩散。

项英侧卧在地，头南脚北，子弹从太阳穴穿过。他的心脏没有作任何挣扎就从容地停止了跳动。

项英死了。他死在自己无比信赖的副官手里，死在按他旨意换来的崭新的驳壳枪枪口下。如同任何语言一样，驳壳枪本身并没有阶级性，它掌握在什么人手中就为什么人服务，可它偏偏掌握在刘厚总手中……

项英死了，他死在梦乡之中。也许，罪恶的枪声永远阻断了他南进的梦想；也许，无情的子弹摧毁了他的忏悔梦境……

项英死了，他死在毫无准备之中。他脑海中最后一幅景象，们吃了很大的亏，总有一天要把这个帐算回来……”

蜜蜂洞在哭泣，它目睹了黑暗中的一切。

蜜蜂洞在告诉后人：惨案发生的时间是1941年3月14日凌晨3时许。

蜜蜂洞在告诉后人：刘厚总收走了项、周、黄身上的枪支和金条、银元，在浑沌的夜幕中遁去……

蜜蜂洞也许还会告诉后人：

项英是中国早期工人运动的领袖之一，他的一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作出过很大贡献。他在皖南新四军工作的三年绝非毫无成绩可言。项英虽然在皖南事变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皖南新四军遭受严重损失负有重责，但在血的教训面前，他对自己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并勇于承担责任。他仍不失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凌晨4时许，教导队工兵连连长刘奎和军部警卫员郑德胜、李德和路遇刘厚总。

刘厚总惊慌地向敌军驻地跑去。

大家见状，联想起刚才听见的枪声，估计军首长出事了，于是叫醒谢忠良等同志，一齐奔向蜜蜂洞。

他们看到：项副军长、周副参谋长已牺牲在血泊中。警卫员黄诚身中三枪，一枪穿透右膀，一枪擦伤左臂，一枪击中后脖，子弹仍留在肉里。他已爬出洞口，身后留下一条血迹，抚摸他的胸部，发现心脏还在跳动。

在大家的惊呼中，黄诚慢慢地睁开双眼。他看到血泊中的军首长，痛不欲生，恳求大家再补给他一枪。

大家流着悲痛的泪水，用两条毛毯将项、周的遗体裹好，掩埋在蜜蜂洞西边的一块石崖下。为了便于辨认，项英的遗体埋在石崖的右半部，头西脚东，与石崖呈垂直状态。周子昆的遗体埋在石崖的左半部，头北脚南，与石崖呈平行状态。

据幸存者和当事人回忆，当时大雪纷飞。

阴沉沉的天空雪花飞舞，掩盖了烈士的血迹，赤坑山上的一草一木乃至整个大地都披上银装，天地间一派肃穆。这天，正好是清明节。

黄诚由刘奎护送到当地群众徐老家养伤、隐蔽。其他同志立即转移。黄诚伤愈后一直留在皖南，随同刘奎坚持游击战争，直至全国解放。

12年后，即1953年7月，正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刘奎，受南京军区的委派，与项英之子项学成等一起到皖南，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找到了项英、周子昆的遗骨（那条裹尸毛毯仍在，但已破烂），又找到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袁国平遗骨。

三位烈士遗骨移迁南京，后人在雨花台望江矶建造了项英、袁国平、周子昆三烈士墓。

1985年3月，周子昆遗孀，七十二岁高龄的何子友与已是六十有三的黄诚执意谒访蜜蜂洞。俩位老人拄着拐棍，相互搀扶，步履艰难地来到了这里。

四周静极了，石壁上滴水依然，恰似泪珠点点。

何子友迈着沉重的步子，缓缓走进洞中，站在周子昆当年睡卧的地方，悲声不已……

## 1

1941年1月18日，刘少奇、陈毅致电中共中央，提出皖南事变后的工作部署，建议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提议陈毅为代军长。

1月19日，中共中央复电：“蒋介石宣布新四军为叛逆，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采取必要步骤。”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

同日，中共中央又发出成立新四军军分会的任命通知，刘少奇为军分会书记。邓子恢在安徽工作，以饶漱石为代理政治根据中央军委命令，陇海路以南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

苏中地区部队编为第1师，师长粟裕，政委刘炎；

淮南地区部队编为第2师，师长张云逸，政委郑位三；

盐阜、皖东北地区部队编为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

淮北豫皖苏边区部队编为第4师，彭雪枫任师长兼政委；

鄂豫边区部队编为第5师，李先念任师长兼政委；

苏南地区部队编为第6师，谭震林任师长兼政委；

皖中、皖南地区部队编为第7师，张鼎丞任师长，曾希圣任政委。

全军共7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计9万余人。

苏北。

《江淮日报》发行量骤增，如雪片漫舞，散落江淮大地，飘向万里山河。通栏标题，大字醒目：陈毅代军长发表就职演说：

……1月25日应本军将士之推选，本人就任代理军长，克日于苏北盐城复建军部，统帅全军九万之众，誓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战斗到底……

陈毅站在华中地图前，眉头紧锁。新四军军部恢复了，而华中的形势也十分严峻。

敌中国派遣军总部为确保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城市和水陆交通线，巩固华中占领区，加强了在华中的作战力量。日军在华中的总兵力已达26万余



人，正面与新四军作战的有 11 万人。此外还有伪军 15 万人。

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后，反共气焰虽有所收敛，但消灭华中新四军的初衷未改。在蒋介石的旨意下，以第五战区指挥三个集团军分别进犯淮南、淮北和鄂豫边区等抗日根据地；以盘据苏北车桥、曹甸地区的鲁苏战区韩德勤部，伺机向淮海区进犯，以接应汤恩伯部由淮北津浦路以西东犯皖东北和盐阜等抗日根据地。同时，以第三战区一部，向苏南抗日根据地进犯，并准备渡江北上，配合汤恩伯部东犯。

陈毅心中很清楚，华中敌后抗战面临着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开始进入严重困难时期。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挑起统领新四军的重担，陈毅不禁想起诸葛亮《出师表》中的一句话：“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中”。

临危受命，收拾残局，对于陈毅来说已不止一次了：1927 年秋冬时节，南昌起义失败，他与朱德一起把这支英雄的起义部队带出了危险境地；1934 年至 1937 年，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他与项英一起坚持南方游击战争；现在，他又与刘少奇一起并肩携手，力挽危局。

他的目光融于华中地图里，仿佛看到新四军在敌顽夹击中奋力拼杀……“陈军长”，随着一声浓重的湖南口音，刘少奇走了进来，“中央来指示了，对我们新四军的任务作了明确规定。”说着，把一份文件递给了陈毅。

陈毅认真地看了起来：

中央军委明确，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打破敌顽夹击，着重巩固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津浦路以东的基本根据地，并大力经营苏南，发展皖中和鄂豫边区的游击战争……

陈毅放下文件，自言自语道：“看来，在敌顽夹击中奋斗，将是华中我党我军今后斗争的特点。一切军事上、工作上的计划，都须根据这一特点来布置。”

“我的意见，立即召开会议。”刘少奇说，“研究一下如何贯彻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战略方针。”

经过研究，新四军各师的具体任务为：

2 师、4 师分别在淮河南北，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国民党军的进攻。

5 师独立坚持鄂豫皖边阵地，并以一部沿江而下，与 7 师打通联系。

7 师发展皖中，坚持皖南敌后游击战争，积极打通与 2 师、5 师、6 师的联系。

6 师坚持苏南，打击敌伪并阻止国民党顽固派北渡，保卫军部的南侧安全。

1 师、3 师坚持苏北，建设巩固好苏北根据地，建立强大的地方武装，以便作为主力机动作战。

泰州。

国民党军鲁苏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斜靠在太师椅上，从他醉意朦胧的双眼中不难看出其内心深处在进行着激烈的矛盾斗争。

……黄桥战役打得正猛时，李明扬和李长江隔岸观火、按兵不动，眼睁睁地看着韩德勤被打得狼狈不堪。兵败黄桥后，韩德勤密告蒋介石，言黄桥之败，罪归“二李”，并言“二李”私通新四军。蒋介石遂下令调“二李”去襄西与日军作战。李明扬耍了个滑头，撇开李长江，打着中立旗号去打游

击。李长江仗着手下一支劲旅，拒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赖在泰州不走。韩德勤无奈，只好巧立各种名目，压缩李长江部编制，克扣军饷。李长江忍气吞声，在艰难中渡日。

恰在这时，日军独立混成第 12 旅团南浦所部由泰兴进占黄桥，看准了李长江的实力，加紧威逼利诱，劝其投日……李长江在犹豫。

他很清楚，投日后就成了货真价实的汉奸，新四军是不会放过他的。在他艰苦度日的时候，新四军的粟裕慷慨解囊，多次送钱送粮，并多次做工作劝李长江投奔新四军。

李长江在徘徊。

如果投降新四军，自己花天酒地、妻妾成群的日子就到了头。况且日本人、蒋介石都不会饶了他。

李长江烦躁地大口喝起酒来。

这时，王副官悄悄地溜了进来。他见四处无人，便压低嗓音说道：“副总指挥，扬州日军南浦大佐派人捎信来了。”说完从怀里掏出一封信交给了李长江。

李长江顿觉脑门上冒汗，醉意骤减。

南浦大佐在信中说，李副总指挥人才难得，现在却在受闲气。如果能投奔皇军，前途无量。并许诺两个条件：一、李长江部改编为和平军第 1 集团军，由李长江任中将总司令，一切费用武器装备由日方供给；二、在日军解决苏北新四军及韩德勤后，由李长江任江苏省主席。

李长江看罢，心中大喜。他仿佛看到自己率领一支清一色日式装备的集团军在苏皖大地耀武扬威……1941 年 2 月 13 日，李长江在泰州率部公开降日。

“无耻！”新四军第 1 师师长粟裕得知李长江公开投敌后，怒不可遏，“他最困难的时候，是新四军救济了他，可他现在却投靠了日本人，真是无耻！”

粟裕话音未落，作战参谋送来了情报：

日军陆军独立混成第 12 旅团南浦旅，拟攻击我新四军军部及中原局机关。其作战部署为：分兵两路，一路从泰州向兴化进攻；一路从黄桥向如皋、东台进攻，然后合击盐城。李长江率伪第 1 集团军配合行动。

“来得正好，”粟裕决定乘机教训一下李长江，于是拿起电话，向军部请示。

军部对李长江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一贯坚持两手准备：对李长江大力进行争取工作，争取团结其共同抗日；同时，在军事上也强调做好充分准备，一旦李长江公开投敌，即抓住时机，予以歼灭。

得知李长江投敌后，新四军军部立即决定予以严惩。刘少奇指出：此贼不除，后患无穷，望集全力迅速解决之。陈毅亲赴东台，与粟裕一起研究讨逆作战方案。

2 月 17 日，陈毅在讨逆战役誓师大会上作了战斗动员，并正式颁发军长、政委签发的《讨伐李逆长江命令》，任命粟裕（当时为苏北指挥官）为讨逆总指挥，叶飞为副总指挥，刘炎为政治委员。叶飞的一旅为左路军，王必成的二旅为中路军，陶勇的三旅为右路军。

2 月 18 日，新四军战史上著名的讨李战役拉开帷幕。

1 师主力沿海（安）泰（州）公路向西进攻。在取得姜堰和苏陈庄等战斗胜利后，19 日拂晓，三路大军向泰州猛进，傍晚直逼泰州城下。

枪声大作，火光冲天，泰州的夜空如同白昼。李长江惊魂四散，急令部队凭借工事拼死抵抗，等待皇军增援。

第二天凌晨 3 时许，王必成的中路军破东门而入泰州，陶勇的右路军从西门突入城内。

锋芒直逼李长江司令部。李长江见大势已去，急忙换上便衣，潜出泰州，落荒而去。拂晓，战斗结束。是役共俘李部官兵 5000 余人，并争取李部两个支队战场起义。

上午，陈毅、粟裕得到情报：日军为援救李长江部，分别由扬州、高邮、如皋等地出动，乘虚侵占海安、东台，并向泰州急进，准备对新四军一师进行“扫荡”。

为争取主动，陈毅、粟裕决定全师于 21 日撤离泰州，转入敌后进行反扫荡。3 月中旬，陈毅返回军部。

延安。毛泽东得知讨李战役的胜利消息后，即于 2 月 24 日致电重庆的周恩来：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20 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李率数百人西窜，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

南京，日军中国派遣军司令部。

号称“中国通”的日军总司令畑俊六大将把目光聚焦在华中版图上。

在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西两侧，东濒大海的苏北、苏中、皖北、皖中地区，活动着新四军的粟裕第 1 师、罗炳辉的第 2 师、黄克诚的第 3 师和彭雪枫的第 4 师。这一地区是日军华北、华中两大战略集团的结合部。纵贯其间的津浦路与大运河是日军的交通命脉。新四军四个师像一把大铁钳，紧紧地掐住日本帝国军队的脉管。苏中、苏北、皖东、皖北，形成犄角之势，虎视江陵，扼控长江，威胁徐（州）蚌（埠）。对于这一地区的共产党军队来说，北与山东毗连，背靠八路军 115 师；西北与鲁西南接壤，和八路军 129 师呼应；南面有苏南、皖中根据地，与新四军第 6、第 7 师携手。在这一地区中，苏北至关重要，它是联结八路军和新四军的纽带，是中共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战场的走廊。同时，苏北又是皖北、皖东、苏中三区的侧背依托，成为全区的支撑点和战略后方，新四军军部就设在这一地区。

畑俊六眉头紧锁。这时又传来令他十分气愤的情报：

新四军第 1 师灭李长江一部，继而连克古溪、蒋垛、苏陈庄、大四庄、孤山及老庄头据点。在泰兴姚家岱战斗中，泰兴伪警备司令孙德旺毙命；

新四军第 2 师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连克谢家集、全家集据点，在金牛山战斗中歼日伪军 700 余人……

畑俊六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扫荡苏北，一举歼灭新四军军部。遂命令：独立混成第 12 旅团南浦旅全部、15 师团、17 师团各一大队，刚扩充的李长江部、江苏保安第 8 旅杨仲华部，计 18000 人，以 250 架战斗机掩护，直捣盐城。

盐城。

新四军军部作战会议。

陈毅表情严肃，语句铿锵：“同志们，这次敌人扫荡，是几年来最大的一次。总指挥是南浦，他采用闪电战，水陆空立体进攻，并口出狂言，在一个月內彻底消灭盐城新四军军部。我们的部署……”陈毅的话未说完，机要参谋送来了新的情报：在日军大举进攻的同时，韩德勤暗中调整兵力，已出动 10000 余人扑向盐城。蒋介石密令顾祝同前往苏北，接替韩德勤，同时令

上官云相率主力第 40 师进兵苏北。

刘少奇愤慨地说道：“这些中华民族的败类。顾祝同和上官云相是反共急先锋。他们曾向蒋介石表示：寻找机会完成皖南事变未竟之功。”

他在征得陈毅同意后，对作战参谋说道：“立即命令谭震林的第 6 师，坚决阻击上官云相部，确保军部侧翼安全。”

“看来要打大仗了，”陈毅继续说道，“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的口号是坚决保卫苏北根据地，坚决保卫盐城！具体部署为：各师分头把关，机动作战，确保盐城。”

陈毅的话得到同志们的赞同，大家表示，盐城是华中根据地大本营，也是我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必须誓死保卫，一定全力以赴，打出新军部的军威。

“我不同意！”一个平静而又坚定的声音。这声音，引来大家惊诧的目光。说话者是第 3 师师长黄克诚，他缓缓地站起来，继续说道：“我觉得陈军长提出的口号和军部的兵力部署不够妥当。此次敌人来势凶猛，装备好，兵力强，而我军武器装备差，兵力少，况且盐城周围无坚固工事坚守，盐城恐怕难以保住。所以，不宜提保卫盐城的口号，只提坚持苏北抗战。”

大家窃窃私语，会场有些乱。陈毅耐心地听着黄克诚继续说着。

“另外，在兵力部署上，分兵把守是消极的。我军历次胜利，都是靠集中兵力，灵活机动。因此，我的意见是先放弃盐城，军部机关及主力跳到外线作战，然后寻机各个击破敌人。”

会场越来越活跃，大家议论纷纷。

“同志们，同志们，”陈毅努力使大家平静下来，然后说道，“我看克诚同志的话有道理，敌重兵压境，我们暂避其锋芒，不失为上策。现在敌情很紧，大家分头回去去动员准备，军部和主力先跳出包围圈……。”

会议进行了作战部署：

以第 3 师第 7 旅于建阳、湖垛和秦南仓之线，打击由射阳、兴化方向来犯之敌；以第 8 旅主力于东

沟、益林和盐城以北地区，牵制由陈家洋南下之敌，并监视顽军韩德勤部的行动；以第 1 师第 2 旅位于

盐城以南地区，阻止敌由东台北犯；以第 1 师主力在苏中地区牵制当面之敌，配合盐阜区军民进行作战。

7 月 10 日，新四军军部撤离盐城，向阜宁以西的陈家集转移。

7 月 20 日，日伪军 17000 千余人由东台、兴化、射阳和陈家洋出动，闪击盐城。攻进城内后，发现是一座空城。

南浦气急败坏，遂下令对盐城周围地区进行“清剿”，控制水陆交通要道，实行分割、封锁。在水网地区使用特制装甲汽艇搜索，寻歼新四军军部和主力部队。

经过十几天连续搜索，南浦连新四军的影子都没找到，自己的部队却疲惫不堪，消耗日增。他非常气恼。

“捉迷藏”，“兜圈子”，打游击，是陈毅的拿手好戏，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新四军已经获得了一整套经验。各部遵照军部命令，实施机动作战，大量歼灭和消耗敌人，并利用自制触发式和引发式水雷，击毁敌装甲汽艇多艘。

为配合盐阜区军民反“扫荡”作战，新四军 1 师主力在苏中地区向来犯之敌发动攻势，10 天内连克黄桥、姜堰、古溪、季家市、三垛、蒋垛等 7

个据点，并攻克泰兴城，歼敌千余人。

面对大好形势，陈毅、刘少奇召开军部作战会议，决定进行总反攻，彻底粉碎敌“扫荡”计划。

新四军军部机关在忙碌着，这时，一份急电送到陈毅和刘少奇面前：韩德勤率6个团兵力向益体黄克诚3师发动进攻，同时派出300名便衣，深入我后方袭扰。

陈毅勃然变色：值此反攻前夕，韩德勤竟在背后捅上一刀。于是他和刘少奇联名电令黄克诚，坚决打退韩德勤进攻，守住益林。

8月9日晚，按照新四军军部统一部署，1师、2师、3师各部，从仪征、六合、扬州、泰州、泰兴、如皋、南通、东台、射阳、东沟等纵横几千里的战场全线反击。锋芒直指各日伪军据点。各部密切配合、互相策应，使敌顾此失彼。至8月底，敌之“扫荡”被彻底粹碎。

在一个多月的反“扫荡”中，新四军共作战130余次，歼敌3800余人，击沉敌汽艇30余艘。新四军伤亡1000余人。

炮火连天，硝烟弥漫。

彭雪枫站在指挥所里，眼里布满了血丝，他已经七天七夜没有合眼了。

正前方，汤恩伯手下的骑兵挥舞战刀，蜂拥而来。尘土伴随着一阵阵叫喊声：“活捉彭雪枫，活捉……”。

彭雪枫眼中在冒着火，他大声命令道：“集中火力打马，坚决打退敌人！”枪炮声，叫喊声混成一片……

1月下旬，驻淮河以北的第三战区司令长官汤恩伯，奉蒋介石密令，指挥第92军、第12军、第85军的第23师、骑2军、骑8师共9个师12万人马，向豫皖边的永城等地区进犯，妄图以7倍的兵力一举歼灭新四军4师主力。

就在这时，日军发动了豫南战役。在日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汤恩伯部狼狈溃散。中共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即令豫皖苏部队进攻日军侧背，援助国民党军，保卫中原。同时，出于战略思考，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刘少奇、陈毅：“应令彭雪枫准备几支精干支队，待汤李何大部向西应战淮西空虚时渡过淮河，向淮河、平汉间发展。如此着成功，则是战略上绝大胜利，替我华北部队开辟了一条南进出路。”2月上旬，新四军4师奉令尾敌西进。

然而，日军见汤恩伯部后有新四军跟踪，便停止对汤恩伯部的进攻。日军派出人员与汤恩伯部暗中联系，恩威并施，以图借刀杀人。汤恩伯遂指挥部队掉转枪口，以12万人马向新四军杀来。彭雪枫部措手不及，防不胜防，部队遭到重创，损失极其严重，10旅28团伤亡过半；11旅31团伤亡两个营；

抗大四分校50余名学员壮烈牺牲……

眼下，彭雪枫已红了眼。在他的战斗历程中，还没有打过这样的败仗。红军第一次攻长沙，他率部首先攻入城内，直抵湘江；一次战斗，他得悉师长郭炳生率部投敌，他仅带10名战士，日夜兼程，将部队追回；红军攻打江西抚州八角亭，他以一个通信排击退敌军一个师的多次冲锋，挽回了战局；红军长征，他在彭德怀三军团任师政委，屡攻难关，勇救险情，被周恩来誉为打不倒的“二彭”。

师参谋长张震双手握着望远镜，冷静地观察着敌情。他心里十分清楚，

部队虽然顽强拼杀，但从指挥角度来看，没能及时调整部署、集中兵力歼灭敌军一部，而是兵力分散，在宽正面上分兵把口，以至陷入目前这种被动地步。他转向彭雪枫说道：“师长，我看先把部队撤下去，调整一下再说。”

彭雪枫稍稍平静片刻，然后对 32 团团团长命令道：“你们先掩护张参谋长撤退！部队交替掩护后撤，总有一天要和汤恩伯算这个帐！”在敌军的炮火下，部队渐渐撤出战场……

4 月下旬，汤恩伯部进攻更为猖狂。同时，日军也乘机不断对新四军 4 师进行大规模“扫荡”，4 师处境日趋困难。25 日，中原局、新四军军部指示 4 师：除留 3 个团及地方武装在津浦路西继续坚持游击外，主力转入皖东北地区。此后，形势进一步恶化，所留部队无法坚持，于 5 月间也撤至皖东北地区。至此，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大部被顽军所占。

南京。

一辆黑色轿车绕过鼓楼，沿山西路急驶。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端坐在后座上，身旁坐着他的警政部长兼江苏省省长周佛海。

汪精卫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不禁回想起同日本人谈判的情形。

皖南事变后，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觉得，彻底消灭新四军的时机到了。于是，他向汪精卫提出以长江下游为起点，逐次清乡的方案，计划一年之内消灭新四军。可是，在与日本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汪精卫已学得狡猾起来，与日本人进行了一场讨价还价的谈判。

他对畑俊六叫苦：“清剿新四军是我和皇军的共同目的，我自当效力。但我的部队装备差、经费缺，还得皇军做后盾呵。”畑俊六为了让汪精卫早些动手，便满口答应。可过了几个月，汪精卫仍不见经费的影儿，便迟迟不出兵。6 月初，汪精卫为试探日本政府对他的态度，以访日为名，带着周佛海等人到东京，日本天皇见汪精卫亲自来日敦促经费，推托不了，便派军政要员与汪精卫一行密谈了三天，签订了《中日清乡协定》，这个协定确定了“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清剿总方针，由日方负责清剿的军事任务，汪精卫负责政治任务，清乡经费由日方支付，先拨款五亿日元。

在日本，汪精卫俨然一副民族豪杰的气派，受到日方高层人士的隆重款待。日本外相松冈洋、首相近卫文麿、陆军大臣东条英机、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等人对汪大为赏识，汪精卫感到飘飘然。在他心中，蒋介石算什么，不过是个政治婊子。汪精卫想起自己的童年，从那时起他就立志当天下第一人，而且在同学们中间他也表现出了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一种强烈的领袖欲在他胸中燃烧，他要当中国的领袖。可是在重庆政府中，他只是混了个国民党副总裁，他不甘心，于是，冒着生命危险跑了出来，在南京树起一个与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的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兼行政院长……

黑色轿车缓缓停在马台街清乡委员会门前，汪精卫走下车，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会议室，在这里，他要亲自主持大规模清乡会议。

汪精卫宣布了第一期清乡计划：

以苏常太地区为重点，常熟则是重点中的重点。清乡兵力，由日军的第 13 军团之第 5 师团 4 个大队、第 15 师团 4 个大队、第 116 师团 6 个大队，共 5000 余人。另加汪部和平建国军第一方面军 6 个师及苏州宪兵警察 13000 人。总共 18000 余人。时间预计 40 天，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军事清剿，第二阶段为训民时期，第三阶段为感化时期，第四阶段为建立税收制度、发

展经济时期。

会后，清乡委员会从南京迁到苏州。清乡第一阶段，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人亲临苏州督战。

7月初，日伪军 18000 余人从苏州出发，兵分三路向常熟扑来。

新四军 6 师战斗在东起上海、西止南京、南抵天目山、北连长江的苏南地区，作战任务非常艰巨。师长谭震林此时正在常熟一带，面对敌清乡的滚滚恶浪，他做了一个基本作战部署：将在常熟的 4 个团撤至外线地区，留下 52 团 2 营和侦察队及警卫第 2 团 4 个连，一共 7 个连兵力由政治部主任张英负责组成内线反清乡部队，同苏常太地区地方工作人员坚持原地斗争。同时，对党政机关中不适合原地斗争的干部和伤病员，作了化整为零的安排，以班排为战斗小组。

然而，敌情非常紧急，所有交通要道已被敌控制，包围圈已越来越小。6 师的处境十分危急，谭震林指挥部队边打边撤，向外突围。

硝烟滚滚，弹片横飞。

“同志们，快掩护谭师长向外冲！”52 团团长沙光带人冲了过来，他一边指挥部队，一边对谭震林说道：“看来我们太轻敌了，对敌情判断有失误。”谭震林看着这位猛将，沉重的心情有了一点小小的安慰。夏光原为叶飞的老 6 团作战参谋，1939 年下半年，他跟随叶飞到常熟一带开辟新战场。夏光负了伤，便率 34 名伤病员留在阳澄湖一带的芦苇荡里养伤（现代京剧《沙家浜》就是以此为背景，剧中的指导员郭建光即以夏光为原型）。在养伤后期，夏光在阳澄湖重新建立了江南抗日义勇军的组织，成立了“江抗东路司令部”。后来，谭震林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将“江抗东路司令部”改为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兼政委，任天石为副司令，夏光为参谋长。此后，“江抗”接连打胜仗，威名远扬。一次，夏光率一支 150 人的大刀队闯入敌阵，杀出了威风，被谭震林誉为“大刀猛将”。

此刻，在夏光 52 团奋力掩护下，谭震林及师部撤出了战场，向无锡一带退去。按预定方案留下的 7 个连兵力和一部分地方工作人员共 1500 多人被敌人各个击破，伤亡很大。

南京。

汪精卫在举杯庆贺。他决定，在前期取胜的基础上，立即进行第二期清乡。第二期清乡以澄锡虞地区为重点。9 月初，日伪军集中 4000 余人向新四军 6 师主力第 18 旅扑来。

新四军第 18 旅接受了苏常太地区反“清剿”的经验教训，采取以隐蔽斗争为主的方针，主力部队适时转至外线澄西地区，以少数兵力和地方武装，依靠群众掩护坚持了原地斗争。

至 12 月中旬，第 18 旅全部奉命转移至苏中江（都）高（应）地区。

在新四军 6 师第 18 旅进行反“清乡”斗争的过程中，第 16 旅在苏南茅山地区对敌发动攻势，连续攻克延陵镇和九里铺等据点 30 余处，恢复和扩大了抗日游击根据地。11 月，日军第 15 师团和伪军各一部共 3000 余人，向 16 旅猛扑过来。第 16 旅旅部在马塘地区陷入重围。28 日上午，日军发现马塘新四军兵力较少，便集中火力猛攻。硝烟中，一颗子弹击中旅长罗忠毅头部。他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就停止了呼吸。政委廖海涛也腹部中弹壮烈牺牲。留下坚持作战的 400 余人大部壮烈殉国。

马塘战斗后，16 旅进行了整顿。

新四军第 6 师认真总结了反“清乡”作战的经验教训，谭震林认为：作战失利的原因有三点，第一，开始对清乡缺乏足够的认识，认为清乡和扫荡是一回事，鬼子扰乱一下就走了。因此采用了主力转移，留少数兵力分散作战的方针，结果中了敌人的计，我们一分散正好便于敌人各个击破；第二，已发现敌众我寡不能坚持，没作彻底转移，留少数人硬着头皮打，结果吃了亏；第三，在执行统一战线政策上过‘左’，如苏常地区的锄奸工作扩大化，被错误地打过的人及其家属，这次都成了敌人的利用力量。

寒风阵阵，雪花飘飘。

刘少奇望着银白的世界，长长地吁了一口气：“1941 年转眼过去了，这一年是新四军的多事之秋，发生了皖南事变，4 师、6 师反顽失利。应当坐下来认真总结一下了。”

“是呵，”陈毅附合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决定了我们的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中央已经来了指示，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仍然是：长期坚持游击战争，准备将来反攻。

1942 年将是更为艰苦的一年，我看召开一次大的会议吧。趁你离开华中之前，我们把工作总结一下。”1 月 13 日，中共中央曾来电通知：……中央决定少奇同志回延安参加七次大会。

少奇同志来时，由饶漱石同志代理中原局书记并代理新四军政委，望少奇同志即将工作交待，携带电台，动身回延。何日可起程，望告。

这项通知已经是第二次了。刘少奇望着陈毅恋恋不舍的神情说道：“我先给中央发个电报，如果七大不能马上召开，我就晚一些时间走。”

“这样最好，华中局其他同志也是这个意见。”陈毅说道。

华中局回电中共中央：

……倘七大会期仍未最后确定或大会于短期内

事实上仍不能举行则我们仍主张少奇同志不急返延安而留在华中领导工作。倘大会已确定举行，则少奇同志须于华中局扩大会后于 2 月底或 3 月初始能动身。

1942 年 1 月 20 日至 3 月 5 日江苏省阜宁县单家港。

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

华中局书记刘少奇端坐在主席台上，作《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

……1941 年，新四军作战 3200 次。缴获步枪 26000 支，轻重机枪 600 挺，各种炮 41 门，歼日伪军 33000 余人。新四军伤亡 13900 余人，根据地面积已发展到 18 万平方公里，主力部队发展到 86721 人，地方部队发展到 41000 人。民兵为 51.5 万人。

1941 年工作的缺点和错误：

第一，反顽斗争不彻底，苏北问题还留了尾巴，以韩德勤为中心的反共势力，与土匪、伪军勾结对我军东进起着相当的牵制破坏作用；屯集在津浦路西的汤恩伯、李品仙，与韩德勤遥相呼应，伺机向东进攻；顾祝同竭力与新四军在苏南争夺地盘，并伺机北渡援韩。华中敌后仍然是三角斗争。

第二，个别领导犯了严重的错误，根据地不巩固，4 师在反顽斗争中丢掉了豫苏皖边根据地。6 师在反清乡中，判断失误，处置失当，丢掉了苏常太和澄锡虞根据地。

第三，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在残酷斗争面前，经验不足，思想水平和工



作水平跟不上形势。尤其是华中局领导能力不能满足各方面的发展。

刘少奇根据国际形势和中央的指示，提出了华中敌后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和人民的彻底解放。”最后，为实现总任务，刘少奇提出了对军事斗争、统一战线、武装建设、政权建设、群众工作、财经建设、文化教育、防奸工作、党的建设等九项措施。

在报告结束时，刘少奇深情地说：“……中央有电报来，调我回延安，以后华中局书记由饶漱石同志来代理，军分会书记由军长代理，我恐怕不久就要动身。跟同志们工作很久，这次会议是总结了工作，同时也即是办交待。饶漱石同志、陈军长是党内很好的领导者，我走了没有问题，在饶漱石同志、陈军长领导下，许多同志一定能团结一致，努力工作。”

刘少奇就要走了，就要离开工作了 3 年的新四军，同志们不禁回想起他在华中这几年的一幕幕：

1939 年初，他肩负发展华中的重任，离开延安到华中，第一站到河南竹沟，在那听取了湖北省委、鄂西北地区党委有关鄂中、鄂西北情况汇报，根据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发展敌后抗战作了具体部署，组建了李先念的独立游击大队，向豫鄂边发展。这支部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迅速发展为拥有 6 个主力团的游击兵团。这支游击大队后改为新四军 5 师，拥有 15000 千人，已在黄山、应山、京山、天门、荆门等广大农村立足生根，部队发展数量多质量高。此时的淮南和淮北，已有 4 支队、5 支队、6 支队和黄克诚的第 5 纵队。由于项英的错误影响，这四支部队步调不一致，各有各的主张，刘少奇在定远县召开中原局扩大会议，提出了“东进，东进，再东进”的战斗口号，把发展苏北作为战略任务完成。今天，苏北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

刘少奇提出反摩擦斗争的思想，巩固和发展了华中根据地。刘少奇曾提出，国民党顽固派是新四军东进的障碍，要东进就要反摩擦。1940 年 5 月，他领导江北指挥部在定远和半塔，一举击败李品仙和韩德勤的夹攻，坚持了津浦路东、西两侧阵地，为建立苏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刘少奇提出了正确处理皖南事变的斗争策略。1 月 9 日，当收到叶挺来电称项、袁、周逃跑的时候，刘少奇立即向中央建议：撤掉项英一切职务，政治上由饶漱石负责，军事上由叶挺负责，以挽危局。中央接受了这项建议。中央为了挽救军部，提出要山东八路军包围沈鸿烈、苏北新四军包围韩德勤，以交换的筹码逼迫蒋介石在皖南撤兵。刘少奇冷静地分析了全局，感到此事重大，处理不当，全局被动。当时的形势是皖南新四军军部已经遭损失，我军总体上反击力量不够，根据地不巩固，有限的军事动作不一定能够挽救皖南危局。同时，国民党也未正式投降，仍在抗战，国共关系未全破裂。如果我军大举反攻，一是军事上不利，二是政治上被动。刘少奇建议中央：撤销包围韩、沈计划，军事上处守势，政治上取攻势。党中央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稳妥地处理了皖南事变，即从政治上打击了蒋介石，又在军事上发展了新四军、八路军的力量。

刘少奇用先进的理论武装了华中党组织。刘少奇担任华中党校校长，倾注全部心血于党的教育事业上。他写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人的阶级性》、《论党内斗争》等著作，并在党校演讲，用马列主义提高了党员的思想理论水平。

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在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欢送下离开了华中。

## 2

1942年5月，华中局和新四军军分会决定，由饶漱石带工作组到淮南去检查2师的工作。

在5月10日饶漱石动身之前，陈毅、饶漱石致电各师及各区党委：饶灰日赴2师及路东地区巡视工作，预计3个月后方能返部，华中局书记兼政委职务由陈代理。

陈毅坐在办公桌前，桌上堆满大量文件。自从饶漱石走后，华中的党、政、军领导工作全部集于陈毅一身。

区党委工作，军区工作，党校、抗大的工作，后勤卫生工作等，他都亲自安排。高级领导干部的调配他尤为重视。在他的提议下，通过华中局决定，派肖望东去2师工作，吴芝圃为4师主任，将6师划归1师领导，任命谭震林为1师政委……陈毅揉揉疲倦的眼睛，目光又落在刚收到刘少奇寄来的一些讲话稿上。这些讲话稿是刘少奇在华中工作时所写。刘少奇希望能将其汇集成册，先在华中出版。

陈毅翻阅着这些讲话稿，回想起与刘少奇一起工作的日日夜夜，想起了刘少奇为华中的工作所付出的心血。他决定将这些讲话稿出版。并提笔给刘少奇写了回信：

……大文《论党内斗争》业已收读，即在《真理》第8期发表，另印单行本。我们拟定将你历年所作关系党内的文章印一合集，题为《刘少奇论党》，作为干部精读的文件，这个命名对不对？请告，或由你另想一个名字，在7月初即付印……

机要秘书送来了新的情报，陈毅的眉头不禁紧锁起来：

5月，日军为加强对中国的海上封锁，确保浙江沿海地区，切断浙赣铁路，消灭美国空军利用浙江衢州等地机场对日本本土空袭的威胁，发起了浙赣战役。浙赣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纷纷溃退……

陈毅想起中央军委在《关于今后华中战略任务的指示》中，曾对浙东地区有关明确指示：

关于浙东方面，即沪、杭、甬三角地区，我们的力量素来薄弱，总指挥部应增辟这一战略基地，经过上海党在该地区创立游击根据地（以松江等处原有少数武装作基础），中原局应注意指导上海党……

于是，陈毅与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等研究决定，火速派干部南下浙东，抓住有利时机，进一步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展壮大武装力量，建立和巩固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并要新四军组织部长曾山赶快物色一批去浙东的干部名单。

几天以后，曾山将去浙东的干部何克希、张浪、罗白华、张季伦、戈阳等营、团级干部带到了军部。

陈毅与几位同志寒暄后，指出：中央军委多次指示我们，待时机成熟要向浙东发展，创立游击根据地，单独成立一个战略单位。现在日军打到那

里，我们就以打鬼子的名义发展浙东。你们去浙东要记住四条：第一，要依靠群众开创新局面，对外可提出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的口号，广泛开展统一战线，采用各种各样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以达到发展队伍的目的；第二，你们组织起来的武装开始不要打着新四军的旗帜，要套上灰色的外衣，或者就以三战区某某部队名义，等有相当力量能站稳脚跟后，再打出新四军旗帜；第三，浙江地方党组织要尽快恢复起来，但要秘密转入地下，不宜公开；第四，浙东的党组织和武装力量，将由军部去的人，浦东工委去的人，还有浙东地方党组成，这三股力量可要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曾山补充说道：“你们先到 1 师去，向粟裕、陈丕显要几个人，他们会支援你们的。谭启龙是你们的领导人之一，他已从上海到浙东，在那儿等你们呢。”第二天，何克希等人踏上南下征途。抵达浙东后，与先期到达的谭启龙等人汇合。7 月，中共浙东区委正式成立。后经华中局批准，成立浙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浙东抗日武装力量，并成立“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并将部队统一整编为第三、第四、第五 3 个支队，作为坚持“三北”（余姚、慈溪、镇海三县的姚江以北地区）地区和发展四明山、会稽山地区的基本力量，并组成一支精干的武装回浦东地区继续坚持斗争，以保持中共在上海外围的抗战阵地。

“第三战区三北游击司令部”后来经新四军军部批准改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何克希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刘亨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

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的成立，结束了长期灰色隐蔽的面目，公开树起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号。下辖第三、第四、第五支队和金萧支队、浦东支队、三北自卫总队、四明自卫总队，主力共 6000 人，地方武装 6000 人，建立了三北、四明、会稽、浦东等 4 个行政区和 14 个县级政府，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建立浙东抗战战略支点的任务。

1942 年 11 月 7 日，苏联十月革命节。

洪泽湖西岸姚庄抗大四分校大操场上，新四军 4 师正在召开庆祝大会。

淮北地区党、政、军首长坐在主席台上，师长彭雪枫做完纪念报告演说，主持会议的师政治委员邓子恢宣布文艺演出开始。

这时，侦察科长将一份敌情通报递在彭雪枫面前：日军第 17 师团、独立混成第 13 旅团各一部及伪军共 6000 余人，附以骑兵、坦克，在航空兵支援下，以淮北中心区的青阳、半城为主要目标，进行大规模的分区扫荡，企图歼灭新四军第 4 师主力，摧毁淮北抗日根据地。

彭雪枫将通报递给身边的师参谋长张震，然后命令通知团以上干部到司令部开作战会议。

作战会议上，首先由张震介绍敌情。

张震认为，敌此次扫荡采取的是分进合击战术，来势凶猛，装备精良，我军不宜正面抵抗。

彭雪枫同意张震的看法，认为应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先让日军逞凶一阵，看其弱点，再反击。在兵力部署上，主力跳到外线，迂回到敌人侧后，集中兵力寻找机会，歼其一部。

作战会议决定：以主力一部协同地方武装就地坚持游击，袭扰、疲惫敌人；师主力大部跳出敌之合围圈，向泗县、灵璧方向转移，袭击敌侧后据点及交通线，迫敌回援；在敌回援或撤退时，则集中兵力，相机歼敌一路或

数路，粉碎敌之“扫荡”。

会后，彭雪枫、邓子恢率师部机关转移到淮河和女山湖之间的郭家村。

11月15日，日伪军分五路向以新四军4师驻地半城为中心的地区进行扫荡，于11月27日会师泗县城。他们除杀害500多群众，一个新四军也没抓到。即使这样，日伪军还是召开了“祝捷大会”，并宣布洪泽湖10000余名新四军被皇军一网打尽，无一漏网。

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天皇下令举行提灯晚会，庆祝淮北扫荡大捷。

彭雪枫、邓子恢在认真分析敌情后，认为日伪军筑据点，分兵把守，是我们逐个歼灭据点的战机。于是下达命令：留在内线的26团，开始集中兵力拔据点。外线部队，一部分打击敌后方据点，一部分配合26团向内线进攻。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从12月1日起进行大规模的拔据点战斗。

日军淮北大扫荡，除了屠杀一些手无寸铁的农民，烧毁一些房屋外，没有任何收获。其所筑的据点反而大部分都被拔掉了。因此不得不于12月8日草草收兵，结束扫荡。新四军第4师在历时33天的反“扫荡”中，共作战37次，歼敌800余人，打破了敌聚歼第4师主力和摧毁淮北根据地的企图，保存了主力，锻炼和加强了地方武装，并使根据地面积略有扩大，对坚持淮北敌后抗战起了重要作用。

鄂豫皖边区。

新四军5师师部。

师长兼政委李先念刚刚放下第15旅粉碎日军对鄂东、鄂中区“扫荡”的报告，侦察科长又送来新的情报：国民党军第五战区乘武汉地区日军抽调兵力参加浙赣战役之机，以10个师兵力，对鄂豫皖边区的新四军5师发动全面进攻，现已进占鄂中、信南、襄西等根据地中心区……

李先念英俊的脸庞掠过愤怒的烟云。刚刚击退日本人的进攻，国民党又扑了上来。回想1942年，新四军5师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情况下进行战斗的：日军第11军为确保九江、信阳、宜昌、岳阳、南昌之间的占领区及岳阳至湖口的长江航运，不断对鄂豫皖边区和新四军5师进行“扫荡”；国民党军也不断发动军事进攻，均力图消灭新四军第5师。同时，新四军军部与第5师之间的通信联络经常中断，因而第5师在敌顽夹击的严重形势下，处于独立坚持鄂豫皖边区敌后抗战的境地……

李先念放下情报，立刻决定召开作战会议，并命令将情况立即报告军部。

经研究决定，5师以主力一部配合各军分区地方武装，采取伏击、袭击战术，打击深入各根据地的顽军。同时，将主力大部隐蔽集结于机动位置，寻机歼敌。

作战会议刚结束，作战科报告，与新四军军部通信联络无法沟通。李先念果断地决定，5师独立作战，独立指挥，务歼入侵之敌。

这时，进犯鄂中的顽军暂编第1师推进至随县南的古城、刘店、圣场一线，由于孤军深入，处于孤立、突击地位。新四军5师主力乘机奋起反击，予以沉重打击，有效地制止了顽军的进犯。

6月下旬，日、伪军2000余人，由团凤、新洲出动，向黄陂、黄安南地区进兵扫荡。

新四军5师第14旅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经三天英勇作战，歼敌400余

人，粉碎了敌之扫荡。

鉴于新四军军部与第 5 师通信联络经常中断，不便实施指挥，7 月 21 日，中央军委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建议，决定第 5 师暂归中央军委直接指挥，但仍属新四军建制。

日军淮北扫荡被新四军 4 师挫败后，又从开封调来第 35 师团，加上原来的日伪军一共 12000 余人，在上有机侦察，下有坦克开路的情况下，如决堤洪水，向淮海、盐阜根据地滚滚而来，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早在 1941 年秋盐阜区第一次反“扫荡”结束后，刘少奇和陈毅就报告中共中央：“利用水网以建立相当巩固的根据地已不可能，因此，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在无法达到。”数日后，又向中共中央报告：向东发展的任务已完结，“目前是巩固已得阵地，……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军部与华中局秘密移至皖东为好。”对此，中共中央于 8 月 17 日复示：“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此议经过将近一年半的时间，终因眼下日伪军对盐阜区发动大“扫荡”而落实下来。

淮海、盐阜地区乌云密布，黑云翻滚，面对敌军重兵压境，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决定迁移到地处苏皖边界的盱眙县黄花塘。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队转移，是一次重大行动，途中不仅要经过十几道封锁线，还可能与扫荡的 12000 多名日军遭遇。陈毅经过反复思考，决定军部要精简机关，轻装前进。年老病残的安排发给路费回原籍，有的女同志或者孕妇就地安排打埋伏，暂时隐蔽在可靠的群众家中。

“哇……”一声幼儿的啼哭，陈毅循声望去，只见张茜抱着不满周岁的儿子走了过来。

陈毅望着妻子和儿子，百感交集。

5 月的一天，张茜在侉周村生了个男孩。中年得子，陈毅十分高兴。便在百忙中抽时间从淮南战场赶回军部。刚一进门，军部卫生部长崔义田就赶来祝贺：“军长，恭喜你当爸爸了。”

陈毅的眉毛一扬，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说：“是呵，我当爸爸了。”

他先向张茜慰问了一番，然后抱起孩子看了又看，亲了又亲。

“军长，张茜让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崔义田在一旁说道。

陈毅稍加思索后说道：“这年头战事这么频繁，还没有当爸爸的思想准备呢！叫什么名字呢？我看这样吧，我们住在停翅港的侉周，孩子的小名就叫小侉吧。”这小侉就是陈毅的长子陈昊苏。

陈毅放下孩子，看看手表，便告别张茜，转身出门。来去匆匆的探视，把陪同他的奥地利医生罗生特弄得莫明其妙：

“你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没有感情！就这样走了？！”在场的崔义田笑了笑，对罗生特说：“不走又怎么样？”

陈毅望着张茜和小侉，心中一阵酸楚。这次转移非同小可。在转移途中划一根火柴，一支点着的烟头，都可能在穿过封锁线时暴露目标，发生不可想象的意外。

陈毅不禁想起了一段往事：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有位游击队长叫方海天。爱人生了孩子，因为没有奶水，孩子不分昼夜地哭，部队转移到哪里，孩子哭到哪里，敌人就寻着哭声追到哪里。周围村庄的群众都被迫移民并村了，不肯并村的上了山，

想把孩子送走没有地方送。为了部队的安全，方海天与爱人商量，不得不铁了心肠，把孩子活活地掐死……

陈毅望着妻子，缓缓地说道：“这次转移情况复杂，军部要求轻装行动，我身为军长，要首先从自己做起，为了部队的安全，咱们把小佟寄养在停翅港张大娘家里吧。”

张茜非常尊敬陈毅，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含着眼泪点了点头。

安顿好孩子，张茜毅然跟随陈毅踏上了转移的路途。她的耳旁时时萦绕着分别时小佟裂人心肝的哭声……

12月25日晨，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机关及直属队分三个梯队开始秘密向淮南转移。他们夜里行军，拂晓宿营，巧妙地穿过敌人一道又一道封锁线，经过淮阴、淮安，于1943年1月10日，安全到达目的地——洪泽湖南岸盱眙县黄花塘。

1943年2月23日，日伪军7000余人，在空军和骑兵配合下，向曹甸、凤谷村等地扑来。

新四军3师指挥所。

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参谋长洪学智正在军用地图前研究反扫荡方案。这时，忽报韩德勤、霍守义派人求见黄师长。

来人惊魂未定，气喘吁吁，称在日军强大攻势面前，韩德勤、霍守义部已经顶不住，向新四军3师紧急救援。

黄克诚听罢，一阵沉默。韩德勤、霍守义对新四军犯下了面前，应该怎么办？黄克诚想起了他与韩德勤之间订的那份临时协约……三个月前，鉴于国共关系趋于缓和，黄克诚部便与东北军112师霍守义部恢复了通讯联系。1943年元月，韩德勤暗派其特务营长到黄克诚部要求在阜宁县益林镇设立商业机构。

为打开苏北地方谈判局面，进而影响全国国共合作的局面，黄克诚根据陈毅等人的指示，同意了韩德勤的要求。元月24日，韩德勤派了三个代表来到新四军3师，说他们得到敌伪即将扫荡曹甸、车桥的情报，此次想先取得新四军的谅解，如果敌人扫荡，韩德勤可以转移到新四军的防区。于是，双方商拟了临时协约：

韩总部及省府机关在困难时，可向新四军规定的地区转移，但对地方抗日民主政府、群众团体不加侵害，并予保护，“扫荡”过后即返原防，敌“扫荡”新四军时，韩方应原地不动。

想到这里，黄克诚决定派部队掩护韩、霍两部退入3师的淮海根据地。并实践诺言，积极向日、伪军出击。

在新四军3师的掩护下，韩德勤溃散的部队大部脱离危境，并退入3师淮北根据地进行休整。

韩德勤见到黄克诚后，感激涕零，连连称赞新四军是坦荡君子。黄克诚对韩德勤说，在民族矛盾面前，应该一致对外，希望以后韩德勤能对得起新四军，多做有利于民族和人民的事情。

见到韩部官兵狼狈不堪，惊魂四散，新四军3师决定调拨一批粮草和经费救济韩德勤部。韩部官兵倍加感激。同时，在黄克诚等人的倡议下，淮北根据地军民热情款待和慰劳了经淮北过津浦路西的霍守义部。师长霍守义率伤亡了1000余人的112师感激万分。后来，他们愉快地退出了苏北反共阵地。

日军占领韩德勤、霍守义的阵地后，继续向湖垛、益林、苏家嘴、陈家洋等地进攻，然后向旧黄河，南自射阳河，沿三套、六套、北蔡桥、鲍家墩之线，对盐阜区形成一个弧形大包围圈，并以舰艇封锁沿海港口。

黄克诚和参谋长洪学智率领只有十几个人的指挥所，穿插于阜东、阜宁一带，了解第一线战况，掌握敌人动态。2月26日，黄克诚根据各方面的情况，得知日伪军在淮海区和盐阜区打通了主要交通线，安设了数十个据点，并准备进行分区扫荡，便和洪学智研究决定，下达了局部反击的命令。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在东起黄海边、西止洪泽湖，北起新沂河，南止兴化纵横数百里的广阔战场上，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击战。

3月15日，日军得悉新四军在六塘河地区反击，便集合1000多人向淮海区党委和军分区领导机关驻地张圩子扑来。两小时后，合围圈越来越小，区党委和军分区处于万分紧急之中。

在通往张圩子的道路上，有一个不大的村庄，叫作刘老庄。7旅19团2营4连驻守在这里。他们只要一个急冲锋就可以冲出包围圈。但是，连长白思才和指导员李云鹏决定，把其他几路敌人吸引过来，以便区党委和军分区机关安全突围。

全连包括炊事员只有82人，同数千名敌人相比，无论数量上还是武器装备上都处于绝对劣势。

82名勇士从早打到晚，坚持了12个小时，终因敌我力量悬殊，全部壮烈牺牲。

战后3天，淮阴人民在刘老庄南头田野上对82位英雄举行了公葬，为他们立了高5丈的纪念碑，碑上刻上了他们的名字。淮海区党委书记李一氓写了一副挽联刻在墓碑上：

由陕西，到苏北，敌后英名传八路从拂晓，达黄昏，全连勇战刘老庄深夜，黄克诚得知4连全部牺牲的消息，万分悲痛。为继承烈士遗志，他命令7旅3天之内重建4连，并命名为“刘老庄连”。

为了粉碎日军的扫荡，新四军3师各部于3月25日展开了全面反击。各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紧密配合，内外线部队互相策应，以“围点打援”、伏击和袭击等手段，先后攻克和收复了东沟、花墩头（盐城西北）、八滩、钦工（淮阴东）和湖垛等据点10余处。

至4月14日，反“扫荡”作战结束。

黄克诚等人正在为反“扫荡”胜利而高兴，机要参谋送来一份急电。电报是八路军115师政委罗荣桓打来的：黄克诚师长：3师赴延安干部，在小沙东海面遭日军袭击，激战12小时，彭雄、田守尧不幸殉难。

罗荣桓黄克诚读罢电文，悲痛万分。

1943年2月初，中共中央通知，要求抽调一部分年轻有为、有培养前途的团以上干部，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保存力量，准备迎接全国性大反攻。

接到通知后，黄克诚、张爱萍、洪学智等人研究决定，精简10旅部队，抽调3师参谋长彭雄、8旅旅长田守尧任干部学习队正副队长，率10名团以上干部赴延安学习。

谁知这一去竟成了永别。黄克诚不禁回想起人称“白马英雄”彭雄的一幕幕。

彭雄出身于江西的一个农民家庭，1929年红军打到他家乡时，他只有15岁，便毅然参加了红军。历任战士、通讯员、班长、排长、连长。长征

途中任团参谋长，在攻占腊子口、遵义城、金沙江的战斗中，曾7次负伤。抗战后，任旅长参加平型关作战，后率部南下华中。1940年复，八路军进军苏鲁豫地区，彭雄任鲁西南黄河支队司令，经常与敌发生战斗，每当敌众我寡时，彭雄都镇定自若。一次，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被日军包围，敌人凭借数十辆汽车猛扑过来。敌人7次冲锋被打退后，又有9辆汽车冲进了村子。彭雄命令其他同志先撤，他自己最后一个撤离村子。他跨上一匹白色战马，闪电般向村外飞奔，左右两支驳壳枪连连击中敌人，很多敌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就饮弹倒下。等敌人醒悟时，彭雄已冲出包围圈。敌人9辆汽车开足马力猛追，马达声、枪声大作，子弹从彭雄身边飞过，彭雄忽左忽右，忽高忽低，向前飞奔，凭着他对地形的熟悉，专挑田埂、塘边奔驰，而汽车却在窄小的道路上无法行驶，眼巴巴地望着彭雄消失在天地之间的远方。从此，大家给彭雄送了一个“白马将军”的美称。

几天后，为怀念在战斗中牺牲的新四军3师将士，苏中人民在阜宁县修建了一座纪念塔。塔的正面是陈毅军长题写的碑名：

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盐阜区抗日阵亡纪念碑

塔的左面是黄克诚题词：

为国为民，奋不顾身，精神不死，浩气长存。

塔的右面是张爱萍的题词：

为国为民，转战南北，杀敌制胜，虽死犹荣，  
壮志未成，后继有人，建塔立碑，永表忠烈。

在塔的东北角，为纪念彭雄和田守尧，还建了两块半人高的纪念碑，分别写着二人的名字。黄克诚为彭、田二位敬写了挽联：

彭雄、守尧千古

十余年甘苦共尝患难相处破浪矢志遥望云天哭战友  
数万里山河犹碎水火益深卧薪期素誓除贼寇慰英魂

黄克诚

敬挽

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黄克诚只要经过纪念塔，总要下马，在塔前伫立良久，然后绕塔三周，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早春3月，韩德勤站在明媚的阳光里，脸上泛着红光。在新四军4师的掩护和救济下，韩德勤部得到了充分休整，元气日渐恢复。

这天，他接到蒋介石密令，要求他按照统一部署进攻淮北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

接到密令后，韩德勤立即派队接应国民党第31集团军王仲廉部东进，同时准备亲自率部由东向西，企图两面夹击刚与日伪军连续作战33天的彭雪枫4师。

副官走了过来，悄悄提醒韩德勤：“我们曾与新四军订过互不侵犯的协议，况且新四军救了我们，眼下这样做恐怕对新四军不好交待吧。”韩德勤听罢不屑一顾地说：“什么协议，见鬼去吧，我那时是迫于形势，不得不做的姿态。”彭雪枫坐在油灯下，津津有味地读着《尼赫鲁自传》。他喜欢读书，喜欢研究军事理论，在频繁的战斗期间，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他都不放过。他喜欢阅读《孙子兵法》、《柏林回忆录》、《法兰西历史》等中外著作。有时还偷闲写写论文和读书体会。他一生勤奋攻读理论书籍和浏览古典、现代文学名著，从中汲取营养，写了500多篇论文和读书体会。



侦察科长走了进来，将一份敌情通报放在彭雪枫面前：

韩德勤背信弃义，亲率 89 军和李仲环的独立第 3 旅、王光夏的保安第 3 纵队，偷渡运河，现已占领山子头、盛圩一线。

彭雪枫对韩德勤的反共企图，已有察觉。他看罢通报，立即将韩部情况向军部报告。

陈毅拍着桌子大叫：“韩德勤这个龟孙子，如果没有新四军，他的狗命早没了。现在却恩将仇报！”

他立即召开作战会议。经研究决定，坚决痛击韩德勤。于是，下达了命令：2 师、3 师、4 师：

韩顽率部占山子头，盛圩一线，图与西路王部

合击我彭部，若韩、王企图实现，淮南、淮北局势严重，对我华中斗争任务影响极大。

在韩、王未会合之前，首先集中兵力全歼韩部。此次战役以四师为主，2 师 5 旅、3 师 7 旅参战，由彭雪枫、邓子恢统一指挥。

各部接电后，主动与 4 师联络，听从彭、邓指挥。为给韩德勤最后一次机会，淮海军区派员，劝说并警告韩、王，希望他遵守协议，顾全大局，退返原防，如不受劝告或故意拖延，一切后果咎由自取。

陈、饶、张、赖 3 月 5 日几天后，陈毅接到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刘震、政委金明的报告：已派员去劝说韩德勤，但韩毫无收敛之意，气焰十分嚣张。

陈毅得知后，沉思良久。从目前情况看，国共合作没有破裂，如果全歼韩部，是否会为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制造借口呢？因此，对韩等部的打击，应该掌握到什么程度呢？

就在陈毅冥思苦想的时候，又传来情报：韩德勤侵入淮北中心区后，扣留共产党麻桥区区长，将区队全部缴械，公然叫嚣要在洪泽湖畔建立新的反共基地。

陈毅听罢，饭没顾得上吃便策马直奔新四军 4 师驻地。

4 师正在开紧急作战会议。

彭雪枫主持会议。邓子恢、张震、吴芝圃，淮北行署主任刘瑞龙，9 旅旅长韦国清、政委康志强，11 旅旅长滕海清、政委赖毅，骑兵团团长周纯林等人正在七嘴八舌议论如何严惩韩德勤。

陈毅赶到后，与大家一起研究了作战方案，最后向大家提出了三点要求：

一、消灭韩德勤部队；

二、韩德勤要活的。韩德勤身为国民党上将，江苏省主席，如杀了他会直接影响国共关系，蒋介石很可能借机反共；

三、王光夏、李仲环要死的。以灭韩德勤的嚣张气焰。

作战会议后，4 师主力及 2 师 5 旅、3 师 7 旅、淮海分区部队于 16 日开始运动，17 日晚发起攻击。

在攻击之前，彭雪枫命令各部队：如在俘虏中发现韩德勤，便为其提供空隙，让他逃跑。

晚 12 时，各部向韩德勤部发起攻击。担任主攻的韦国清 9 旅，兵分两路，一路由南向北，一路由北向南，向山子头韩总部及王光夏的保安第 3 纵队发起猛攻；滕海清的 11 旅围歼独立 6 旅；彭明治的 7 旅在姜王庄、胡圩、陈楼一线阻击 89 军。30 分钟过后，保安第 3 纵队和独立 6 旅被全歼，李仲

环被击毙。

4 师主力直逼韩德勤指挥部。几分钟后，王光夏被击毙。韩德勤见大势已去，便举着双手走出指挥部，向新四军投降。

韩德勤随着俘虏队伍缓缓地向前行进。两旁是端着刺刀的新四军士兵。韩德勤感到阵阵寒气袭上心头，如今落到新四军手里，恐怕命是保不住了。

“你的姓名，职务？”一位新四军军官在盘问。韩德勤抬起了头，胡乱地编造了一个姓名。

“你认识韩德勤吗？”新四军军官继续问道。

“不认识，不认识。”韩德勤惊恐地否定着。

“你可以被释放，但以后不许做伤天害理的事情，你可以走了。”新四军军官挥挥手，示意韩德勤可以离去。

韩德勤惊喜万分，转身离去。可没走多远又停了下来。他在盘算，去向何方，眼下自己已成了光杆司令，身边无一兵一卒，生命安全没有任何保障。况且去哪儿呢？怎么向上峰交待呢？想到这里，他又折了回来。

“我是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他战战兢兢地向那位新四军军官承认了身份，“我要见你们的彭雪枫师长和邓子恢政委。”

新四军军官听说眼前这位就是韩德勤，立即派人将韩德勤送往师部。

在新四军 4 师师部，韩德勤感到万念俱灰，一个堂堂的国民党上将、独霸一方的省主席，如今成了阶下囚。他渐渐失去了继续活下去的勇气。

他企图吞食火柴头自杀，但未遂。

他要写遗嘱，可又不知从何下笔。

他开始绝食，表示要“杀身成仁”。

新四军 4 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闻讯后，赶来同韩德勤谈话。韩德勤痛哭流涕，倾诉着到苏北 5 年来的衷曲。说对新四军作战实出无奈，自己虽然为蒋介石卖命，但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得不到重用……

吴芝圃对他进行了教育：“现在日本人在我们国土上横行，战火连天，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拿起武器，对付日本的侵略。而你们却不断破坏国共合作，和新四军搞摩擦，你是个民族的罪人。”韩德勤听罢，连连点头称是。可是他心里却在盘算能否生还，能否继续当省主席。于是，他要求见彭雪枫师长，并且继续绝食。

3 月 19 日晨，彭雪枫同韩德勤谈话。

经过几天绝食，韩德勤已经气力不足，说话无力。他用呆滞的目光望着彭雪枫，以微弱的声音询问：新四军优待俘虏，像我这样的人能否得到优待，如果要杀我，请求让我绝食自尽。

彭雪枫明确表示，可以不杀你，但你必须悔过自新，退出反共阵营。

韩德勤听说可以保全性命，眼睛里逐渐出现了光芒。他心头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于是停止了绝食，并要求面见陈毅军长。

延安。

毛泽东正与朱德等人研究如何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第一个回合已经取胜：粉碎了顽军东进夺占淮北地区建立反共阵地的计划。俘韩德勤以下官兵 1000 余人，迫使已经越过津浦铁路东进至灵璧以北地区的王仲廉部以及韩部第 89 军仓皇退至津浦铁路以西。然而，苏北反顽枪声刚停，又得到新的情报：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部乘日伪军对新四军茅山根据地进行“清乡”之机，企图调动其第 23 集团军之第 28 军的两个师向新四军溧阳、

溧水地区进犯。

这时，机要参谋又送来了陈毅的电报：

……韩德勤的力量已歼灭殆尽。彭、邓近日与韩会谈，韩站在其本身的利益上，已愿与我私合。韩本人估计，若能迅速得到我之谅解，则仍能保持其省主席地位。韩为其本身利益，可能与我靠近，不积极策动蒋派部队东进。因部队小，东进便无用；部队大则不可能东进。即令东进韩将因控制不住而自危。韩此时最忧虑者，即为期日久问题扩大，本人虽然自由，其前途终被牺牲。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协定，进行私合，应迅速释放。如韩背约再行反共，彼力量既小，又在我掌握中，易于制服。同时王仲廉等东进决心必更动摇，蒋虽坚持也无能为力，故我们主张与韩成立妥协，释韩要快。

看完电报，毛泽东等人在思考。

苏北，新四军 4 师师部。

给中共中央发完电报后，陈毅匆匆赶到这里。

在听完彭雪枫、邓子恢的详尽汇报后，陈毅指出：韩德勤被俘，最怕杀他，其后见我不杀，则力谋保持其江苏省主席地位，故多方哀求央说。此点可以利用。因此可以答应他在今明两日内在我控制下先行恢复电台。这样，一面便于侦察重庆态度，一面因韩未下台，则重庆方面就不便以汤恩伯取而代之，而汤因未得江苏省主席位置就不愿用自己的主力东进。这样对我更为有利。韩在我掌握之中，文章更好做。

彭雪枫、邓子恢完全赞同陈毅的意见。

延安。

毛泽东收到陈毅的又一封电报：

……韩求我以巩固其地位之动机露骨而明显。

我们已恢复其电台先与顾祝同通报，并将其真情告顾。第一、二两电已发出，尚未得复电。据军部通报，汤恩伯已将韩被俘消息报蒋，重庆反共集团正酝酿两种江苏地盘斗争，一是与我党之争，一是抢主席之争。据此，我们建议，应在蒋对韩决心未下之前，自动送韩出境，其好处可以进一步利用反共派内部冲突，使蒋感到棘手，或可改善何、顾、韩等对我之关系，对华中反共实力最大之汤以打击，维持着汤恩伯、韩德勤、李品仙三派的冲突，在华中对我亦有利，同时更可能使国民党军人及士绅阶层对我有好感。假如再不释放韩，将来释韩，徒增恶感。且蒋也不至于即将韩之主席撤掉，因有何、顾等之说情。且根据与我摩擦之孙启人等，于释放回去后即行复职，预料蒋似以韩在苏北敌后坚持，前年兴化之恢复，韩曾要求将省政府移苏南，蒋未准。因此，日内即送韩到王仲廉部中去似为上策，只着重对蒋、韩等采取分化争取，则不必附带释韩条件，更可表示我态度。如何，请示，以速为妙。

3 月 29 日，毛泽东等人经过认真研究，给陈毅等人发出复示电：……同意陈毅所提办法处理韩问题，如陈估计韩留苏北比较有利，韩去路西反而不利时，即可使韩留苏北。但不论如何，均必须与韩订立一个秘约方不上当，对王仲廉部须先礼后兵，不须急打！

3 月 31 日，刘少奇电告陈毅：

……29 日何应钦与周恩来、林彪谈话，提出韩德勤被俘事。周答，韩违约到运河西，并向我进攻，捕杀我人员，致引起冲突，不料累及韩本人，后即

发还人、枪，礼送韩出境，国民党方面对此事虽已模糊知道，但尚无向我提出稍微严重的交涉与条件的表示。你们让韩德勤与顾通电，此事可能向重庆方面敷衍过去，汤恩伯已令王仲廉部主力开回路西，留一部在路东收容韩散兵。

陈毅收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电报后，认为一切条件均已成熟，便决定约韩德勤谈话。

当天晚上，陈毅与韩德勤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单独会面。

韩德勤见到陈毅后，羞愧难当，苦笑着说道：“陈军长能屈身见我这败军之将，我无地自容，深感荣幸。”言罢，提议共同摄影，成立文件以示互信。陈毅答应了他。

“韩主席，”陈毅款款说道，“中国有句俗语，叫做事不过三，我想我们以后可不要在这种情况下见面了吧。”

韩德勤一听，连连称是：“是啊，我韩某在陈将军面前屡战屡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一次是1931年4月4日，在安福城里，我损兵折将一个整师，我也成了您的俘虏；同年9月，在方石岭，我又做了您的俘虏；眼下这是第三次了。韩某真是愧对陈将军呵。古有诸葛亮七擒孟获，今有陈毅三捉我韩德勤，要给后人当笑柄了。”

韩德勤滔滔不绝地检讨了自黄桥战役、曹甸战役直至山子头被俘等事，诉说听命于人、身不由己的苦衷。

陈毅以民族大义和具体事实对韩德勤进行开导和批评，然后说道：“你的苦衷我们知道，只要你放弃反共立场，为抗日尽心尽职就可以了。这次我们释放你回去，你还有什么要求吗？”

韩德勤面带难色：“我有两个要求，不知陈军长能否答应。第一，我只身一人返回，恐怕难以交待，能否还我一部分枪支和人员；第二，能否借给我一些钱，以便回去生存。”

陈毅答应了他的要求。送给他8万元，并送还了他的手表、皮包和手枪。

时，其参谋长代表韩德勤部，彭雪枫代表新四军进行会商，成立协定，议定事项，分交陈、韩核准，并由陈毅、韩德勤交换一封信，以示同意，即付实施。

4月1日，韩德勤的代表吕汉劲与彭雪枫签订了《新四军军长陈毅与韩德勤会谈备忘录十条》。由于韩德勤身体不适，新四军4师备了牛车为其代步。

陈毅、彭雪枫设宴为韩德勤饯行。宴后，韩德勤愉快地上了路……

送走韩德勤后，陈毅、彭雪枫、邓子恢联名致电中共中央和华中局：

……从国共双方大局及韩德勤的表现出发，仍本友好合作态度，进行政治争取，一面提高警惕，不被麻痹，作有力控制，则可能争取韩为有利时局之一员。对其立足地，拟划众兴以东、淮阴属来翁集以西、老张集八集以南、运河盐河以北地区给韩，以衔接到曹甸原防，但不能危害我之战略利益。……

韩在苏北计5年，最初辖有1个军、3个师、10个常备旅，10个保安旅，迄今总崩溃，转而求我，不能不是反共专家的切身教训。只有力量可以制服反共，也是一个证明。今后韩或积极寻我报复，或转而带一些觉悟，听

韩自择。力量与政治争取必须双管齐下。

韩德勤返回后不久，便把他的副总部和江苏省府搬到了安徽阜阳，而蒋介石的反共大军未敢东进。

### 3

1944年3月，延安沐浴在一片春光之中。

毛泽东放下新四军1师发来的电报，心中无比痛快。他走出窑洞，在明媚的阳光下，开始思考华中大地新四军战略反攻问题。

粟裕等人在电报中说：新四军1师胜利地结束了车桥战役，共歼灭日军大佐以下500多名、伪军600余名……

车桥是淮安县城东南20公里的一个大镇，位于淮安城、泾河镇、泾口镇、曹甸镇之间。明朝末年建筑时，因镇边无桥，以水车代桥，故名车桥。1940年2月，在日军凌厉的攻势下，韩德勤狼狈溃退到车桥，在这里安营扎寨，筑起深沟高垒。1943年春，日伪军大举扫荡，韩德勤不战自溃，使几十个村镇，数十万同胞沦于日军铁蹄之下。从此，日军盘踞在这里，又加筑据点50多个。日军曾叫嚣：车桥防御固若金汤，新四军若打下车桥，日军则自动退出华中。

粟裕站在地图前，反复研究着车桥的战略地位：它位于苏中（新四军1师战斗地域）、苏北（新四军3师作战地域）、淮南（新四军2师作战地域）、淮北（新四军4师作战地域）交界的战略机动位置。日伪占据车桥，分割我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根据地。如果拿下车桥，四块根据地将连成一片。

粟裕的眉头紧锁，一个攻打车桥的作战构想悄悄地涌上心头。

师党委扩大会议上，与会人员都在兴致勃勃地议论着1944年的大好形势。副师长叶飞说道：“我们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度过了1943年。然而这一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盟军在意大利登陆，意大利宣布投降。尤其是冬季以来，苏联红军展开强大攻势，德国败局已定。”

“是呵，”粟裕接过话题，“小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也连吃败仗。从我们华中地区来看，目前，日军从第11、第13军所辖14个师团中抽出8个师团参加湘桂作战，以新编成的独立步兵旅团和伪军补充队接替调离师团的任务，总兵力由21万人减少到17万人。华中日军为弥补兵力不足，一方面收缩防区，另一方面大规模地扩充伪军，现在伪军的兵力已经增至35万人。中共中央曾有指示，新四军军部也已经决定，要进一步恢复原有地区，争取新的发展，主动地有重点地对敌展开攻势作战。同志们研究一下，我们下一步的反攻作战目标选择在哪里比较好？”

粟裕的话引来大家更为热烈的发言。

经过研究，大家认为，为进一步改变苏中的斗争局面，并为深入开展整风运动创造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应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以夺取车桥为目标的攻势作战。粟裕见大家的意见与自己的意见不谋而合，便说道：“车桥是联系苏中和苏北的枢纽，是日军第65、64师团的结合部，仅有日军1个小队和伪军1个大队据守，比较突出孤立。我们决定集中5个团兵力组成

3个纵队发起车桥战役。一个纵队攻坚，两个纵队打援，务必拿下车桥。”

会上决定成立车桥战役野战司令部。由于粟裕要主持苏中区党委扩大会议，便决定叶飞担任野战司令部司令员，刘先胜任副司令，夏光为参谋长。叶飞受命后，作了具体部署：陶勇率第3旅7团主攻车桥；廖政国、曾如清率第1旅1团，第三军分区及泰州独立团负责淮安方向打援；陈挺、李干辉率第18旅52团、江都高邮独立团负责对曹甸、宝应方向警戒；第四分区特务团及师教导团1营为预备队。

3月5日，车桥战役打响。主攻部队避开敌之外围据点直取车桥，在炮兵大队的火力掩护下，一举突入车桥镇内，经一夜激战，全歼伪军一个大队，并将日军包围于核心工事。新四军对车桥的进攻，惊动了周围的日军，淮阴、淮安、涟水等地的日军遂乘装甲车和汽车分五批驰援车桥。当第一批增援日军进至车桥以西时，遭新四军1师阻击部队的沉重打击，被迫退入新四军预设地雷区。新四军1师乘雷群爆炸奋勇出击，歼敌200余人。接着又给逐次增援的日军以歼灭性打击。6日晨，车桥之残余日军乘隙逃窜。新四军乘胜扩大战果，至13日相继收复泾口、曹甸等据点12处，战役遂告结束。

粟裕放下陈毅从延安发来的贺电，更加高兴。于是，他决定召开一个隆重而热烈的祝捷大会。这时传来一个悲痛的消息：在车桥战役过程中，“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盟员松野觉，勇敢地参加战场喊话，不幸牺牲。听到这一消息，粟裕不禁想起这位日本人从侵略者变为反侵略者的历程。

松野觉出生于日本的广岛，昭和15年入伍，为丸山旅团平间大队上等兵，在苏中丰利战斗中被新四军生俘。刚被俘时，松野觉对新四军持有强烈的敌意，曾以绝食自杀等方式进行对抗。一天，叶飞、陶勇等人专门来看望他，并同他一起吃午饭。当他得知来者是新四军的副师长和旅长时，不禁大吃一惊。他当兵3年，根本没有见过师长、旅长，更不用说一起吃饭了。于是，他向叶飞、陶勇深深鞠了一躬，恳切地要求参加新四军。征得同意后，他走上了新的战斗岗位，不久加入了苏中反战同盟支部。以后，每次战斗都活跃在最前方。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苏中新四军部队中的日本人逐渐增多，形成了一支重要的对敌斗争力量。

粟裕指示有关人员，要很好地处理松野觉的后事，并号召人们永远记住这位日本朋友。

几天后，新华社从延安发布消息：“苏北新四军大捷，收复车桥，攻入涟水。”高度赞扬新四军1师打了一个大歼灭战。八路军总部公布：“车桥战役，在抗日战争史上，是1944年以前我军在一次战役中俘敌最多的一次。”

东京，日军本部承认：“车桥战役，标志着新四军反攻的开始，日军从此向下坡滑行。”

春去夏来，转眼已是酷暑季节，世界反法西斯战场如同这天气一样，如火如荼。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苏联红军已将德军赶出国境，美、英军队攻占意大利。

墨索里尼被赶下台，特别是美军掌握了太平洋的控制权和制海权，形成对日本列岛的直接威胁。日本在太平洋地区节节失利，朝野上下一派惊恐。东条英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妄图弥补海上交通线的损失，制定了一号作战方案，即向中国平汉路进攻以恢复日本经东北、华北、华南和南洋的交通线。4月底，日军14万人马强渡黄河，沿平汉线南下，连克许昌、驻马店、确山、信阳等要点。驻河南的国民党汤恩伯部10万大军不战而溃，在短短

37 天内，丢掉了 38 个县城，整个河南处于敌军铁蹄之下。

7 月的江南，骄阳似火，热流袭卷着淮北平原。

新四军军部作战室里，气氛如同这天气一样火热。饶漱石、张云逸、赖传珠、彭雪枫等人正在紧张地思考着。一份中共中央来电在他们中间传来传去：华中局、新四军军部：

鉴于日军打通平汉路，只留一、二个师兵力控制陇海路、平汉路，国民党的汤部一溃千里，敌后空虚。八路军、新四军挺进河南敌后，从战略上我可将陕北、华北、华中三区联系起来。现命令：

(一) 北方局和八路军 129 师抽调太行、太岳两军区精干部队，尽快挺进豫西，开辟抗日根据地，以冀鲁豫水东区部队策应；(二) 新四军 5 师抽调精干部队，从平汉路北上配合行动；(三) 华中局以新四军 4 师 1 部西进豫皖苏边区，首先恢复肖(县)永(城)夏(邑)宿(县)地区根据地，然后打通与睢杞太地区联系，相机控制新黄河以东地区。另外还规定，入豫部队要善于插入日伪空隙，求得立足；积极发动群众，广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关于新四军 4 师一部西进的问题，军部已经有所考虑。赖传珠参谋长对彭雪枫传达了军部的设想：由彭雪枫、张震、吴芝圃组成西进总前委，率 4 师 11 旅两个团、9 旅 25 团和师部骑兵团西进；并调 3 师 7 旅和 1 师 52 团入淮北待机；4 师其余部队由邓子恢指挥留在泗洪县，继续发展和巩固抗日民主政权。

同时，新四军军部命令第 2、第 7 师钳制国民党顽军，策应 4 师西进。

彭雪枫受领任务后，策马扬鞭，向新四军 4 师驻地疾驰而去……

新四军 4 师驻扎在豫皖苏抗日根据地，在这里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浴血奋战了 4 个年头。皖南事变后，4 师在日伪顽的夹击下，丧失 5000 余人，忍痛撤至津浦路东的泗洪、泗阳一带。在以后的日子里，4 师广大指战员都把西路失利一事看作是自己的耻辱，下决心寻机收复失地。当听说要西进的消息后，全师沉浸在兴奋之中。

8 月 15 日，新四军 4 师举行了隆重的西进誓师大会。会上，彭雪枫作了动员。而后，西进大军冒着酷暑踏上征途。20 日在宿县以北越过津浦路。21 日于小朱庄歼灭顽军一部。

而后又粉碎了日伪军 2000 余人的“扫荡”，并对敌展开攻势，连克据点多处，迅速恢复了肖县、永城、宿县之间地区。

彭雪枫部西进连战连捷。与此同时，新四军 5 师李先念部游击兵团，沿平汉路北上，在确山、遂平、正阳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八路军皮定钧、徐子荣率领豫西支队，连克巩县、伊川等地。三路大军进逼河南。

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

汤恩伯连续接到蒋介石的急电，命他乘挺进河南的八路军、新四军立足未稳，迅速出击，重点攻击彭雪枫部。汤恩伯接电后，立即部署：以 3 个军投入战斗。其中 3 个师、4 个纵队渡涡河向北；以陇海路以北之苏北挺进军一部向南；以津浦路东之暂编第 1 军第 33 师段海洲、苏北挺进军苗秀林部向西，合击共军于肖、永地区。

汤恩伯部 3 个军投入作战后，中共中央立即电示新四军：应采取首歼段、苗顽军，再打渡涡(河)北犯之顽军的方针，以西进部队在肖、永、宿地区准备迎击涡南来犯的顽军，以淮北路东部队尾随段、苗，在西进部队配

合下歼灭该顽于肖、永地区。

根据中央指示，新四军军部决定，成立路东指挥部。7旅旅长彭明治为司令，9旅旅长韦国清为政委，统一指挥7、9旅和1师52团，尾随段、苗二部。

9月12日，段、苗二部遭重创，被歼4个团。与此同时，彭雪枫、张震正在指挥部队激战于夏邑县的八里庄。昨天清晨，彭雪枫部秘密接近八里庄，并迅速达成合围，十分钟内从东、北两个方向突入，攻破大圩子。眼下，敌正在小圩子拼命抵抗。彭雪枫正在最前沿指挥作战，子弹呼呼地从他头上掠过。身先士卒是他的一贯作风。他曾在给爱人林颖的信中写道：“在指挥阵地上，看到战士那样勇往直前、奋不顾身的雄姿，使我深为感动。为了执行命令而毫不吝惜生命。我从心里热爱他们，或许他们也在热爱着我吧！因为我离他们并不远，连望远镜都不需要，就是没有和他们一起冲锋而已。”

突然一颗子弹飞了过来，彭雪枫倒下了，鲜血从他左胸弹洞中涌出，心脏停止了跳动。

张震抱着彭雪枫，悲痛不已。他深感问题严重，便下令要严格保密。几位战士把彭雪枫的遗体抬到设在天主教堂的师指挥所里。

八里庄战斗结束，毙敌1000余名。中午，张震带着25团，护送彭雪枫的灵柩返回半城镇。走在这熟悉的土地上，张震想起与彭雪枫共同战斗的日日夜夜。1938年10月，彭雪枫和张震率领不足300人的兵力来到淮北。5年时间里发展到1个师，拥有主力17000人，地方部队10万人……。想到这些，张震禁不住流下了眼泪，心中默默地呼唤着彭雪枫的名字。

彭雪枫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中共中央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中央军委遂任命张爱萍为第4师师长、韦国清为副师长，并令韦国清先赴津浦路西指挥作战。

陈毅得知彭雪枫殉难的消息后，悲伤不已，遂提笔写下《哭彭雪枫同志》诗一首：吾党匡天下，得君亦俊才。壮哉身殉国，遗爱万人怀。

雄气压陇海，英雄断淮河。荣衰何有尽，万众泪滂沱。

11月下旬，新四军西进部队又开辟了商（丘）亳（县）永（城）等地区。至此，基本恢复了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并建立了淮北第二专署和8个县的抗日政权，成立了第二军分区，使豫皖苏边区得到了进一步巩固。

1944年6月6日，美英盟军在法国的诺曼底登陆，开辟了欧洲的第二战场，实现了苏、美、英三国在德黑兰会议上所确定的从东、西、南三面进攻德国的计划。

日本侵华军惊恐万状，为确保中国京沪杭三角地带和占领东南沿海要地，防止美军可能在该方向登陆，日军第13军于1944年9月9日攻占温州，并相继占领福州，控制了闽、浙沿海地区，迫使国民党军纷纷西撤。

延安。

中央军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陈毅等人正在研究新四军下一步的战略任务。

陈毅操着浓浓的四川话说道：“根据国际国内形势来看，我认为，必须将过去向东发展的方针改为向南发展的方针。从目前情况看，新四军南进的条件和时机已经成熟。”

陈毅的意见得到毛、朱等人的赞同。几位高层决策人认为：南进名义上是配合美军在沿海登陆，另一方面，又为以后向日军进行大反攻，为夺取



上海、杭州、苏州、南京等城市作好准备。

9月27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

以新四军主力一部渡江南下，发展豫浙皖边与浙江沿海，为以后收复南京、上海、杭州等各大城市创造条件。

接着，中共中央确定了新四军南下的部署：

以第1师第16旅担负南进任务，沿京杭公路发展太湖西南地区；浙江游击队除在四明山逐步发展外，着重加强金华、义乌、兰溪等地游击战争，接应由苏浙边南下的部队，并加强对浦东敌后斗争的领导；浙南游击队向浙、闽交界沿海敌后发展。同时还应从第1、第2、第3师抽组第2、第3批部队，待命南进。

中共中央强调：“新四军在西进、南下两个任务中，应以向南发展苏浙皖边地区为主要任务，江北兵力应尽可能抽调向南。”

粟裕接到中共中央令其南下的电报，同时，陈毅在电报中还特别强调：抗战之初，党中央在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定的游击战方针，现在必须调整。要迎接大反攻，必须把游击军变成正规军，把游击战变成正规战，南下苏浙要确立对日打游击战，对顽打运动战……

粟裕放下电报，心潮起伏。对党中央赋予的重任感到光荣，同时也感到任务十分艰巨，面临着重重困难。于是，他与叶飞、陈丕显、刘先胜、钟期光等人不断地研究南下方案，并命令部队做好南下准备。不到20天，南下的准备工作就绪。

南下大军兵分两路，浩浩荡荡地出发了。一路为西路大军，由粟裕率1师师部和3旅7团及300多名地方干部，从高邮出发，由仪征渡江；一路为东路大军，由刘先胜、钟期光、陶勇等人率特务1团、4团，由三仓河出发，从三江营渡江。

12月下旬，在地方党的配合下，南下大军渡过长江。粟裕率部队迅速越过赣船山，抵达韦岗。5年前，粟裕曾率领新四军抗日先遣队，在这里打响了新四军在江南的第一仗，震动了大江南北。当年粟裕曾赋诗一首：

新编第四军，先遣出江南。

韦岗斩土井，处女奏凯还。

粟裕重返昔日战场，心情格外激动。这时，华中局发来成立苏浙军区的命令：粟裕任司令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钟期光任政治部副主任，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部队。军区下辖3个纵队，第16旅改称第1纵队，王必成任司令员；浙东纵队改称为第2纵队，何克希任司令员；一师第3旅改为第3纵队，陶勇任司令员。

2月初，南下大军3个纵队向敌后挺进。第1纵队冒着纷飞的大雪，越过宣城至长兴公路，向莫干山区疾进，沿途打击日伪军，3天之内收复德清、武康两县，控制了莫干山区。

第3纵队越过宣城至长兴公路向西南发展，占领了泗安、上堡里、观音桥一线；第2纵队继续在四明山坚持，并逐步向西发展。第1、3纵队势如破竹，锋芒直指天目山地区。

重庆。

蒋介石站在窗前，望着沉浸在除夕夜中的山城。

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悄悄走了进来，他将一份电报呈在蒋介石面前：委座：据侦察，新四军粟裕部已渡江南下，现抵长兴、广德、德清一线，企

图不明。如何处置，盼立示。

三战区顾祝同

蒋介石缓缓地坐在沙发上，陈布雷心里清楚，委座对这一消息感到有些震惊。蒋介石在盘算，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把粟裕这个棋子下到此地，用意何在？他转身对陈布雷说道：“粟裕乃新四军的一员猛将，此次南下用心险恶。要电告墨三，集中所有兵力，务必将粟裕赶回苏北。”

陈布雷直接用电话将命令下达给顾祝同。

顾祝同接电后，不禁想起 10 年前与粟裕的一次交锋。1934 年夏，方志敏、寻淮洲、粟裕率抗日先遣队北上。蒋介石亲临南昌坐镇，督令顾祝同部在天目山、南华山、怀玉山一线堵截。顾祝同率 20 个师与抗日先遣队激战于古竹溪一带，结果方志敏被俘，寻淮洲阵亡，粟裕负伤撤至浙南山区。

想到这里，顾祝同得意地笑了起来。他找来上官云相和参谋处长岳星明，一起研究堵截方案。岳星明先汇报刚刚得到的情况：新四军南下部队共 3 个旅 9 个团，浙西只有 2 个旅 6 个团。这 6 个团分布很散，在上堡里一线只有一个团。

顾祝同看了一眼上官云相，然后说道：“我们先集中 5 个团的兵力围歼共匪的这个团。

然后按此法各个击破。”上官云相表示赞同：“我看立即给 28 军军长陶柳发报，令他亲率 62 师 3 个团和忠义救国军 2 个团，火速赶到上堡里，务必于 2 天之内结束战斗。”顾祝同补充说道：“其他部队也同时做好准备，全力以赴，再创第二个皖南奇迹。”

面对敌军重兵围堵，粟裕及时将情况电告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为增援南下部队，曾召集新四军 1、2、3、4 师领导会议，准备由叶飞率 1 师 4 个团，第二批南下苏浙，并由谭震林任苏浙军区政委、肖望东为政治部主任，率 2 师 5 旅准备第三批南下苏浙。但中央军委认为，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时间未定，此时我大量部队南下，易暴露我军战略意图，引起国共摩擦，况且，苏浙地区缺粮，不利于大部队集中。于是电告华中局。要叶、谭二部暂缓南下。

粟裕率部激战于重围，由于运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成功地打破了顾祝同的第一、第二次围堵。

顾祝同在遭到两次失败后，亲自率领从福建、江西调集来的 14 个师共 10 万兵力，向天目山猛扑过来。

粟裕仍然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法，新桥头一战，全歼顾祝同部 52 师，孝丰一战，又歼顾部两个师和一个突击纵队，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三次围堵。

第三次反顽战斗结束后，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说盟军登陆推至 8 月。考虑到三次与顽作战，虽歼敌 13000 余人，但我方伤亡也大，部队极度疲劳，粮食供应困难，不利于在天目山长期与敌对峙，决定部队分兵行动。王必成纵队回苏南休整，廖政国纵队在浙西，陶勇纵队开赴宁国与宣城的桥头地区休整，并派一个团到宣芜铁路以南筹粮，打通与皖南的联系。

1945 年春，日军为防止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确保华中占领区，特别是京、沪、杭三角地带和武汉周围地区，控制水陆主要交通线，大量增强了华中的守备兵力。除原有的两个军部、5 个师团和 6 个独立旅团之外，又将关东军第 6 军司令部调至杭州，并组建了 3 个师团，7 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

个独立警备大队、同时以 3 个师团的兵力，在北起连云港南至杭州湾的沿海重要地区，增筑防御工事。华中地区的伪军除原有的第一方面军和第四方面军一部及徐州、武汉、杭州绥靖军等部外，又将原驻河南开封的伪第二方面军孙良诚部调至苏北、苏中地区。此外，在津浦铁路以西的国民党第十战区部队，也阴谋向华中解放区发动进攻。在此情况下，华中局和新四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的指示，决定集中部分主力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展开进攻，以扩大解放区。

苏北新四军于 4 月下旬发动睢宁战役，毙伤伪军 400 余人，俘伪师长以下 2100 余人，攻克睢宁县城及其外围据点 22 处，切断了联结苏北与苏中的南通至赣榆的公路，给伪军孙良诚部以沉重打击，扩大了苏北根据地。

4 月下旬，苏中新四军发起三垛伏击战，歼灭伪军 1800 余人，其中毙亡日军 280 人。

与此同时，新四军鄂豫皖赣军区部队和皖江军区部队发起攻势作战，解放了部分地区。

1945 年夏，日军中国派遣军为防止美军在华中沿海登陆，进一步加强了华中地区的防备。除原有兵力外，又从华北和华南调来 8 个师团，这样，日军在华中地区的兵力增加至 15 个师团、13 个独立旅团和 1 个独立警备队，共 62 万人。此外，日军还将山东的伪第三方面军吴化文部调至安徽蚌埠和淮南一带。在此形势下，新四军军部除令苏浙军区继续粉碎敌顽军进攻，巩固苏浙皖边区外，同时令其他各部乘敌向沿海、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收缩之机，对敌守备空虚的城镇据点发起进攻。

新四军 4 师发起宿南战役，歼灭伪第 15 师两个团及一个团的一部，计 2100 人，开辟了宿南新区，使津浦路以西 8 个县城连成一片。

6 月中旬，新四军 4 师又发起睢宁战役歼敌 2200 余人，收复国土 300 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 20 万，直接威胁日军在苏北的战略要点徐州。

在进行宿南和睢宁战役的同时，苏北和苏中的新四军继续打击伪军孙良诚部。淮南、皖江、鄂豫皖湘赣新四军同时向正面之敌发起进攻，解放人口 100 多万，国土 2000 余平方公里……

德国战败，欧洲战争结束后。8 月 6 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在日本广岛。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 日，100 余万苏联红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进攻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中国战场出现了空前有利的形势。

8 月 9 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对日战争已处于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与此同时，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在美国大力支持下，加紧准备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积极扩充武装力量……

1945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指示华中局：“集中主力占领大城市和要点。”11 日，新四军将执行中共中央 10 日电的具体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同日，向华中各地日军发出通牒，令其停止一切抵抗，并将一切武器及所有物资，于 24 小时之内全部就近交给新四军，否则予以全部消灭。12 日，中共中央鉴于华中敌、顽兵力较大，新四军难于夺取大中城市，遂决定：新四军

在长江以南的部队就地向四周发展，收复敌占村和县城，长江以北的新四军部队力争占领津浦铁路及其以东的一切城市，并有力配合八路军攻歼陇海铁路之敌，同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华中局和新四军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以第2、第3师及第7师主力分别集结于津浦铁路以西，歼灭当面之敌，并准备抗击国民党军李品仙部的进攻；以第4师配合八路军歼灭陇海铁路之敌，并准备抗击国民党何柱国部的进攻；以各军区的武装迅速向本区内敌占领城镇进攻。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组建野战兵团的指示，迅速补充和扩编了主力兵团。各新四军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立即向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反攻。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了投降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历史阶段已经结束。但是，被解放区军民包围的日伪军，仍然继续抵抗，拒不投降。美国为了取代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全力支持蒋介石政府，以大批飞机和舰船帮助蒋介石运送军队进攻解放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重庆，黄山别墅。

蒋介石脸上堆满了笑容。在美国人的支持下，他的部队占领了全国各大城市。一时间，委任状满天飞，伪军头目摇身一变成了国军指挥官，伪军变成了国军，蒋介石转眼之间增加了200多万军队。然而，高兴之余，他亦心事重重。共产党的军队也在大量增加，如何消灭共产党仍是他的一块心病。于是，他决定立即召开军事会议。军事会议上决定：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以拖延时间，把有关部队调至各战略要地，等到战争准备工作就绪，来个出其不意，一举消灭共产党。

会后，蒋介石立即办了两件事：第一，发电报至延安，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第二，命令军令部部长何永昌，下达向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命令。同时，把江西剿共用的那个“剿匪手册”，突击印发300万份，士兵人手一册。

延安。

毛泽东等人接到蒋介石的邀请电，立即召开八路军、新四军负责人会议，就是否去重庆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决定，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愿望，为了教育中间力量和广大人民，必须去谈判。同时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以防蒋介石突然挑起战争。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对陈毅说道：“陈毅同志，昨天政治局会议，已经决定任命你为新四军军长、华中局副书记。你这个‘代’字去掉了。你对执行中央的方针有什么打算？”陈毅谈了他的打算：

放弃进攻上海、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的计划，立足于经营广大农村。第一，粟裕的苏浙军区有计划地分路进攻，占领吴兴、长兴、宜兴、句容等县城，以及太湖两岸各地和浙西敌后各县，造成一整片统一的苏南根据地；第二，管文蔚的苏中军区、罗炳辉的2师、淮南军区，在津浦路以东、长江以北、陇海路以南、运河两岸作战，占领这一带所有县城，建立苏北淮南根据地；第三，集中第2、第3、第4师主力，占领津浦路，并攻占徐州等城，阻止何柱国、李品仙部队北上；第四，第7师主力坚持皖南、皖江地区，适当时机向西，与5师相连；第五，第5师攻占许昌、信阳、武汉外围控制平汉路，阻止国民党军北上。

毛泽东听完陈毅的想法后，感到非常满意。让陈毅与刘少奇再商量一下后，将部署拟个电报发往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令他们立即行动。

8月28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飞往重庆……

新四军各部接到刘少奇、陈毅的电令后，立即发起声势浩大的全面反攻。长东以南，苏浙军区主力先后攻克金坛、溧水、溧阳、长兴、句容、高淳、安吉、郎溪、广德、宜兴等县城和河头、卜戈桥、丁蜀、和桥、梅溪、湖熟、小丹阳、奔牛、吕城等数十个市镇，控制了苏南广大农村局势；苏中军区攻占黄桥、姜堰、金沙、东台、启东；2师攻克盱眙、嘉山、来安、天长、六安、定远，占领津浦路沿线之张八岭、施家郢和淮南铁路，切断了津浦线，进逼滁县，威胁南京，迫使南京外围的警卫3师3000人投诚；3师攻克沐阳、涟水、淮阴、淮安；4师攻克五河、宿县、孙疃集、双沟、宿迁、永城、肖县、泗县、泗阳；5师攻克随县、宜都、西乡、南县，占领平汉路两侧乡村；7师攻克巢县以南、长江以北地区所有伪军据点，收复裕溪口、铜城闸、沈家港、淋头、东关。自8月22日至9月中旬的10多天中，新四军每战必胜，解放了大江南北200多座城镇，歼灭日伪军12500余人，基本上占领了南京、太湖、天目山之间的广大乡村和县城，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连成一片。

重庆。

毛泽东一行的到来，使蒋介石措手不及。他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会亲临重庆。由于毫无准备，谈判方案均由中共方面提出。在谈判桌上，双方斗争十分激烈，谈谈停停，针锋相对。9月中旬，为了达成和平协议，也为了粉碎蒋介石散布的共军就是为了争地盘的谎言，中国共产党准备作出让步，决定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等8个省区的根据地，到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中集中。毛泽东、周恩来对蒋介石十分了解，他们深知，如果中共方面宣布此事，国民党必定会围剿后撤的新四军。因此，在达成协议之前，必须先通知8省新四军、游击队迅速秘密撤离。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指示后，于9月19日急电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迅速撤到苏北。

新四军1师师长、苏浙军区司令员粟裕正在阅读国共重庆谈判的情况简报，这时机要参谋送来了新四军军部电令：

迅速北撤，越快越好。

粟裕稍稍感到有些意外，但立即清醒起来。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在会上他指出：浙江是蒋介石的老家，又是蒋介石返回南京的通路。蒋介石回南京后，苏南就在他的眼下，他不会安宁的。我军在浙东、苏南坚持下去是很困难的。同时，为了争取全国和平，避免内战，为了粉碎蒋介石“共军就是要争地盘”的谣言，我们必须撤出浙东和苏南，作出必要的让步。

会上研究了后撤的问题，叶飞认为，此次北撤是大部队行动，要做好保密工作。国民党是言而无信的。我们撤退时，顾祝同是不会袖手旁观的，一定会进行围堵。我们要汲取皖南事变的教训，高度保密，迅速后撤。

经研究，后撤方案为：长江以南的新四军有7万人。其中皖南部队直接从繁昌渡江，到巢县、无为，由新四军7师接应；苏浙军区王必成、江渭清的一纵与陶勇、阮英平的3纵从宜兴出发，越过沪宁线，由西桥渡江北上；廖国政的4纵与浙西地方武装从吴兴、长兴、太湖一线出发，经宜兴，随3纵渡江；何克希的2纵分批渡过杭州湾，经松江，在太仓与常熟之间渡江至南通、东台地区。

杭州。

顾祝同着装停当，正准备去参加宴会，他兴致勃勃地哼着小曲。

日本投降后，顾祝同奉蒋介石之命，带着三战区的部队来到杭州受降。一到杭州，顾祝同就忙得不可开交。白天忙于接收，与日本人、伪军会晤、洽谈；晚上，却不甘寂寞，在舞场上周旋。整日里忙得不亦乐乎。这天中午，他和上官云相、冷欣等人与伪军头目丁默邨会见完毕，便准备去参加楼外楼宴会。

这时，机要处长送来蒋介石的电报；

国共谈判中，共产党让出长江以南给国军，望各部展开猛烈攻势，务必将新四军消灭在长江以南，不让一兵一卒流窜江北。贻误战机者，杀！

顾祝同看完电报，急忙叫来上官云相和冷欣，研究围堵方案。上官云相叹了口气说道：“新四军分布在苏浙皖，地域广阔，我们兵力有限，要消灭他们是很困难的。只是何克希部位于四明山，在我们眼皮底下，如果让他们跑掉，我们对委座就不好交待了。”顾祝同沉思良久，然后说道：“立即集中兵力，南北夹击，务歼何克希部！命令 23 集团军陈沛率 1 个师的兵力直逼杭州湾；100 军周志道和 25 军陈士章率 4 个师的兵力部署在杭州至松江一线堵击。”何克希接到新四军军部“浙江纵队必须在 7 天之内将全体人员撤离浙江”的急电后，立即组织 15000 人后撤。当在溇头登陆时，遭遇国民党军堵击。经激战，新四军伤亡 200 余人，何克希率部突出重围，抵达上海郊外。

10 月 29 日，新四军江南部队 7 万余人分别冲破包围，胜利北撤至苏北。

黄克诚认真地看着刘少奇以中共中央名义向各战略区下达的《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电报：

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重点控制东北和热察两省。山东军区主力及大部分干部迅速向冀东及东北进发，华东新四军除 5 师外，调 8 万兵力到山东和冀东，保证发展山东和冀热辽地区。

黄克诚放下电报，准备向军部发电请示任务。这时机要处送来了军部转发的中共中央命令：黄克诚率三师火速兼程，开赴东北。

黄克诚受命后，立即部署，星夜兼程，进军东北。

当进军至山东临沂时，黄克诚部与陈毅、罗荣桓等人相遇。在这里碰见多时未见的军长，黄克诚感到格外惊奇。陈毅笑着说：我与林彪、肖华从延安出发，本打算他们到山东，我去淮阴。9 月 23 日，我们在途中接到中央电报，按照中央的新部署，他们二人改道去东北，我奉命来山东了。罗荣桓说：你们的老军长是来接替我的，过几天我也要去东北了。

黄克诚在临沂休整了 3 天后继续北上，后归东北局指挥。陈毅送走 3 师后，接到军委电报，说新四军 5 师在参加桐柏战役后，与河南军区和王震的南下支队合并为中原军区，新四军 5 师番号取消。

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导致了国共冲突日益加剧，并因此而引起了美国国内舆论的谴责和美国统治集团中某些代表人物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决定，派马歇尔为总统特使赴华调处。1946 年 1 月 5 日，国共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并于 1 月 10 日正式公布。同时国共双方根据协议下达了“停战令”，规定从 1 月 13 日起双方停止一切作战行动。

1946 年 1 月 13 日停战令生效之日起至 6 月中旬，华中、山东解放区开展了大练兵运动，进行解放区各项建设。6 月底，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

进行了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朝阳集战役、两淮保卫战、宿北战役、鲁南战役，歼灭国民党军 13 个半旅、一个快速纵队、五个交警大队，计 142000 人，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苏北解放区的进攻。1947 年 1 月下旬，经中共中央批准，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下辖 12 个纵队。同时，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改编为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委、张云逸任副司令。黎玉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下辖胶东、渤海、鲁南、鲁中、苏北、苏中 6 个军区。新四军番号取消。

新四军番号取消了。

在日军侵华的滚滚狼烟中诞生的新四军，伴随着腥风血雨终于走完了艰难困苦、光辉灿烂的战斗历程……1993 年春，北京人民大会堂。

近百名老人用苍哑的歌喉重复着一支充满青春活力的旋律：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孤军奋战罗霄山上，

千百里转战，穷山野营，

千百次抗争，风雪严寒，

……“爷爷，这是什么歌？”一个稚嫩的声音。

我转过头，去追寻这稚嫩的声音。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位白发老人，泪水顺着他那布满皱纹的脸颊缓缓地流淌，在舞台灯光的辉映下闪烁着晶莹的光。

似乎过了很久很久，他才慢慢地回答：

“好孩子，这是新四军军歌。”

“噢，新一—四—军—军—歌。”

稚嫩的声音在重复着、重复着……1994 年 10 月完稿于北京

## 后记

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我们应湖南出版社之约，撰写了《山河呼啸—新四军征战录》这本书，主要是歌颂新四军将士在抗日战争中的丰功伟绩。

为了真实生动地反映新四军将士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搏杀的光辉业绩，我们在撰写中参考了有关抗日战争的历史资料和著述。其主要书目附后，并对提供资料者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加本书撰写工作的还有：青木、诸石、沈军等。

在该书付梓之际，我们衷心感谢湖南出版社的领导和朱永红等同志，他们在该书的选题、体例、史实、文字等方面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帮助。

由于时间匆促，书中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各位专家批评指正。

作者 1994 年 10 月

